炎黄春秋

第8期
2015年

江平、郭道晖等谈依宪执政

李锐：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讲话”

田纪云：乔石推进法治建设

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

布罗茨基的坎坷人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特　稿

依宪执政五人谈

1 依法治国与保护不同意见 ……江　平
2 法治中国和思想中国 ……郭道晖
4 良法 良治 良序 ……张千帆
6 胳膊与脑袋 ……任剑涛
7 依宪治国离不开律师 ……孙国栋

春秋笔

8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
17 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讲话” ……李　锐

怀人篇

19 大刀阔斧推进法治——田纪云忆乔石 ……杜明明
24 周扬纪事 ……刘再复
30 本色韦君宜 ……李　昕

往事录

35 十三大报告酝酿中的二三事 ……郝怀明
39 胡耀邦就职中宣部的三次讲话 ……李　平
44 设在中国的马共电台 ……陈益南

沉思录

47 周有光的文化观 ……董　健

一家言

49 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 ……叶廷芳

亲历记

52 新乡“反右倾”旧事 ……千正旺
58 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 ……蔡家麒
62 曲阜1958年“大搬家”始末 ……张树亭 张玉昆
64 我亲历的苏州武斗 ……解顺庆

品书斋

69 殊途同归的共享社会——里夫金与马克思 ……陈启懋
73 我读《阎明复回忆录》 ……胡德平
76 中苏关系史的权威之作 ……李静杰

人物志

78 宋庆龄与新闻界 ……汪大波
81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张郎郎

访谈录

86 百岁老兵忆抗战 ……马士弘 口述 万本根 等采写

海外事

90 布罗茨基的坎坷人生 ……龙　飞

编读窗

94 读者来信摘登 ……薛小和 等

顾　问（参加社委会）
杜润生　李　锐　何　方　郭道晖
江　平　陶斯亮　胡德华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王海光　方　宁　方　实
卢跃刚　冯其庸　曲润海　苏双碧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大同
李冰封　李步云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　吴　象
吴明瑜　沈志华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北英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陆　德　陈　敏　邵燕祥　金冲及
周瑞金　赵德润　胡冀燕　钟沛璋
保育钧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徐庆全（副召集人）　贾磊磊　钱理群
徐小岩　凌　云　高　放　高尚全
资中筠　展　江　萧蔚彬　章诒和
董　健　韩　钢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委会　杜导正（主任）　徐庆全（副主任）
李　晨　胡竞成

总编辑　杜导正
副总编辑　徐庆全（常务）
执行主编　王彦君　冯立三　丁　东
杜明明
网络主编　王海印
编辑室主任　赵凡响

社　长　杜导正
副社长　徐庆全（常务）　李　晨
秘书长　杜明明

总经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行部主任　孔　屏
办公室主任　王海印

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l@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6853905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10元　全年定价　120元

本期：终审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杜明明　校对　乐　彤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依宪执政五人谈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依宪执政、依法治国，讲话的次数之频繁、态度之鲜明，为党的历史所罕见。然而，由于人治思维的惯性，我们的社会现实同世界通行的法治精神仍表现出很大的反差。某些人以陈旧理念来实施“法治”，势必远离宪法、法律的原意，违背习近平讲话的精髓。为此，我刊请有关文件的起草人和专家就此话题展开座谈以正本清源。

依法治国与保护不同意见

○　江　平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命题，就是怎么样依照法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来治国，不仅仅是靠制度。法律既有制度，也有理念，又有方法，又是文化。

如何处理好维稳和维权之间的关系，是治国理念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常谈“维稳压倒一切”，最近不怎么谈了。“维稳压倒一切”有片面性，也有危害性。应当提“法治压倒一切”。因为依法治国，当然法治压倒一切。

我觉得，法治包含了怎样处理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这应该在法治里面解决。维稳与维权，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怎么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涉及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当然不是杀人放火这些刑事犯罪的处理问题。比如说强制拆迁，这是现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怎么处理为好？强制拆迁引发了一些群众闹事。拆迁涉及人权，涉及千百万户人家的利益，这是一个维权的问题。所以在拆迁里面，就同时存在着维稳与维权的问题。过于强调拆迁里面闹事的一面，维稳显然是以压服为主。造成的后果怎么样？越压越不服。群众的权利没有得到维护，继续反抗，可能闹得越来越大，仅仅靠强力来压迫，靠公权力的压服，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不能仅仅以稳定来压倒一切，这是不行的。不提“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关心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处理社会矛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维稳和维权，一方面是权利，另一方面是权力；也可以说一个是私权，一个是公权。私权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这个不能被剥夺、被限制；公权要考虑到它行使的范围。四中全会特别提到“法无授权必须禁止”，这个当然是指公权而言。公权在法律上没有授权要禁止。私权呢，法无禁止即自由。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公权与私权的不同，公权绝对要限制！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授权就是应该禁止的，私权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自由的。从依法治国的根本精神来看，私权是基础，公权是管理的工具。把私权看作我们依法治国的基础来对待，这很有好处，能够解决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公权应当严格加以限制，没有权力清单，没有授权，这些权力是不能够随便行使的。

公权既然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最容易被滥用，尤其是维稳的地方化。稳定有全国性的概念，也有地方性的概念。什么是地方性的稳定？一个县的稳定，谁来决定啊？谁来说我这个县稳定还是不稳定啊？显然是由县政法委来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公权的基础。一个县的稳定由政法委员会来定，这就说明政法委员会的权限太大了，它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它可以决定这个县是处于稳定之中，还是不稳定之中，如果不稳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前不久曾经要制定一个突发事件处理的条例，当时征求意见，其中一条讲到，在突发事件处理的时候，新闻自由要受到一些限制。这个草案发布的时候，舆论哗然。怎么能因为你一个县里面发生了突发事件，新闻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呢？所以当时这个意见被否定了。为什么否定呢？它是以稳定的名义，用权力压倒了权利，使得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突发事件而受限制。突发事件跟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在主张“维稳压倒一切”的人看来，突发事件既然发生了，当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一切私人的权利、舆论的权利，都可以撇到一边，不重要了，在稳定面前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是次要的。在公权力滥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从维权方面来考虑，不能够因为突发事件，来限制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人权不能侵犯。人权是最基本的，这里面包括个人的权利，也包括新闻自由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权利，都应该得到维护。

在维权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护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当然指的是对政府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的一些不同意见。这些对于突发事件的不同意见，很可能被主管部门、政法部门认为是煽动闹事，所以怎么处理不同意见，是依法治国需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发表过高锴的一篇文章，谈他在全国人大工作时跟习仲勋同志交往的一些情况。习仲勋当时提出，应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对不同的意见用法律来保护，我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

我本人跟习仲勋同志也有一些来往，我是七届人大常委，仲勋同志是七届人大副委员长。每年开六次常委会，别的副委员长都不来参加小组会，而仲勋同志每一次必到四个小组参会。他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时候到一个组里面，也跟我们交谈。仲勋同志这个意见的关键就在于，一要保护不同意见；二要立法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为什么要保护不同的意见呢？因为如果片面强调维稳特别重要，掌握公权的人要滥用权力，必然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给予很大压力，使他们不敢说话。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那是不正常的。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作为政府机构，作为领导者，应该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保护不同的意见，而不能够打压，更不能以“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随便治罪。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考验。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非常重要，我希望认真考虑习仲勋同志当初提出的“不同意见保护法”。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法治中国和思想中国

○　郭道晖

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很好，也是法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追求的观念。但是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正确解读这个决定，有些部门是歪曲解读，或者不全面解读。二是怎样按照中

央的精神、宪法的精神来解读。

现在有些概念并不很清楚。比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我不太同意一体建设的说法。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是两个概念。法治社会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形式，就是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社会是与政府相对独立的主体。现在解释法治社会就是教育老百姓守法。法治社会有这个因素，法治社会当然要守法。但法治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自治，公民社会，它和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不是一体的。过去我们国家、社会是一体的，没有单独的社会，国家代表社会，社会是国家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社会本身掌握了一定资源，它对国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开始形成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有社会权力的社会，能够用社会的权力监督国家的权力。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首先是相对独立的，和国家是一个互补的、互控的、互监的关系，社会监督政府，也支持政府、控制政府。所以"一体建设"的提法有问题，又回到国家、社会不分了。应当是同步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同时并进，而不是和国家搞到一起。国家和社会，刚刚开始分化，又一体化，这不行。

座谈会场景

什么叫法治国家？在省就是依法治省，在市就是依法治市，在县就是依法治县，在村就是依法治村。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不是把老百姓的权利关进笼子里。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首先必须把公民的权利放出笼子，给公民松绑。放出笼子就是形成法治社会，让公民社会来监督国家权力，监督政府。

提出法治中国，同时也要建立法治国家。两个概念是不是重叠？我的解释是，法治中国和法治国家是两个范畴，或者说是两个相对概念。法治中国是面对法治世界而言的，是把中国摆在世界的大范畴里面来考虑问题。中国在世界范围里活动，首先必须是一个法治的中国，不是一个专制的中国。必须和世界的法治接轨，必须学习世界的先进的法治和文明。现在有人完全拒绝与世界的对接。说什么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点对点的渗透，还说不许学校里讲西方的价值观，不许和世界文明接触。中国梦应当是法治梦。我们提出法治中国，表明我们力求提高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良好的大国形象，承担大国的责任，参与世界制度和法治理念的制定。我们提出要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设立亚投行，有五十几个国家要参加。人民币还要成为国际货币，至少是一些国家之间的互通货币。我们力图在世界上发声，不是被动地参与，而是要积极发挥影响力。假如不讲世界的法治，动不动就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那怎么在世界上立足？所以我们要与世界法治文明接轨，要吸收人类的普世价值，要把我们中国建设成民主的、法治的国家，然后在世界发挥作用，参与进去，而不能重复过去闭关锁国的局面。

鲁迅说过，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鲁迅几十年前这段话，非常符合某些人的心理状态，看起来很强大、很厉害，其实内心很空

虚，没有自信。帝国主义搞颜色革命，这是敌人的本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问题是我们强大了，你怕什么！还是自己不行，才害怕别人。

法治国家是对内的，法治中国是对外的。建设法治中国，不破除某些旧的思维，不放开意见市场，还是那么一种所谓敌对势力的思维，法治思维就建立不了，法治社会也建设不起来。我曾参加一个会，主题是建设思想中国。建设思想中国必须开辟思想市场。应该有一个像自由经济市场那样的思想市场。现在思想市场越来越窄。

思想市场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来的，他活了一百岁，去世前对中国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中国现在没有出大科学家，关键就在于这些年，中国没有开放思想市场，不让讨论新鲜的思想。十八大已经确定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市场经济也应该影响到上层建筑，影响到思想。如果经济上由市场配置，而思想理论上没有一个自由的市场，没有一个供大家交换新鲜思想的市场，是不行的。言论自由是指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只讲“正确”言论，那不叫言论自由。有与宪法不同意见的自由，有助于宪法的修改，否则怎么会修改呀！只要是言论，不是行动，都应该允许。但是现在的环境下还不行。所以要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建设思想中国。而要建设思想中国，必须要有思想市场。

我并不认为思想可以绝对自由，造谣当然不行。个人的名誉是私权，私权不能侵犯。但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国家要有公信力，公信力由老百姓说了算。私人之间的关系，你损害了我的名誉权，可以由被损害者起诉，而不是动用公权。现在私人之间的事，也派公安抓人，这本身是违法的。思想市场不是绝对自由，它要受宪法的限制，也受宪法、法律的保护。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良法　良治　良序

○　张千帆

要依法治国，首先要确定宪法权威，宪法权威的一个核心就是党和法的关系问题。需要解释党如何制定宪法，党又如何首先遵守宪法；要讨论党制定宪法干什么，党制定宪法，就要首先遵守宪法。凸显宪法权威，可以达成某种共识。习近平强调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用当年彭真的说法，党率领人民制定了宪法，党应该首先遵守宪法。这实际上回答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不要把党置于一个制定宪法而不守宪法的尴尬位置。

确定了这个政治前提，有两个问题需要面对：一个问题是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要对它的规范状态做出描述。现代国家之所以要依宪治政，依法治国，说到底就是要维持一种非人为秩序，这就是宪法秩序。长期以来中国人熟络于心的是人为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治传统、德治传统，都是人为秩序。人在政在，人亡政息。我们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要确立现代非人为秩序的法律权威，而这种最高权威的体现就是宪法的权威。

怎样建立比较好的宪法秩序呢？依赖于三个支撑点：

第一，要有良法，许多法律专家重点伸张这一点。许多部门法，要到良法还是恶法的平台上

检验一下。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有一万四千部左右，究竟哪些是良法，哪些是恶法？良法应当实施，恶法必须废除。要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首先对我们的法律条规体系进行清理，使我们的法律真正属于良法。

良法基础上才可能有良治。在具体的治理上，首先要厘清政府的权力。法治国家应当是法治政府。政府的良治从何而来？要杜绝行政权力僭越为司法部门权力，比如随便出动警力，就是行政权力冒充司法权力，这是不行的。行政权力只能维护日常秩序，而不能僭越为执行法律裁决的权力。所以，良治要符合良法，良法之下才有良治，理顺了这个关系，就可以解决行政权的随意作为了。刚才江老师说的“维稳”，大多数都是行政权的僭越。地方政府、公安局觉得问题很严重，危机来了，就急忙抓人，抓人之后再搜集证据，再拿到检察院起诉，检察院无数次返回，再去搜集更多的证据，这是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一种僭越和颠覆，显然不是良治，也没有遵守良法。良治的建立非常关键，在党已经确立宪法的情况下，权力的制衡，立法、行政、司法必须各归其位。现在的行政权力抽象做大，具体做实，这是很麻烦的。

最后才有良序。良序最重要的是权力秩序。若权力不讲秩序，一旦受到威胁就乱来，就没有优良的政治秩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整个社会肯定陷入小暴君普遍增长，谁也不遵守规则的状态。所以，依法治国，依宪执政，就要厘清行政权，不能独大，一定要归位。

第二，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如何形成良性的状态。宪法最本质的规定，就是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我们的宪法多了一部分，是对公民义务的规定。本来公民义务不能由宪法规定，因为宪法是保障权利的，是公民让渡出去的权力才成立国家，因而只能保障公民的权利，不能由国家权力通过宪法形式对公民加以更多的义务。我们现在尽管有这个义务累赘，也不是要马上修改它。但首先要理顺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说到底就是两个关系：第一，要在保障宪法秩序的情况下，严格限制国家权力打压社会权利。就是刚才江老师强调的，维稳和维权的关系不能颠倒，不需要国家权力部门去恩惠性地承诺“国家尊重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天经地义的权利，不是你附加给他的权利。权为民所赋，反过来要限制国家权力。对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来说，这至为关键。

另一个问题是：在宪法秩序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来自两种力量分别呈现或合力呈现的时候怎么办？一种是国家权力本身违宪，这个问题不好谈，但是必须谈。国家权力违宪，等于撕毁了跟公民的宪法契约，因而国家权力是叛乱者，公民有权起来反抗你。就是说，你没有遵守宪法秩序，我们凭什么还承受你的权力压制？从权力必须守宪的角度来讲，权力首先具有示范性。社会中公民不守宪，寻衅滋事，首先是因为权力不守宪，权力寻衅滋事。第二，社会感受宪法秩序受到威胁，怎么办？我们现在法律救济上有空白，部门法有，但宪法没有司法化。要解决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公民要能够援引宪法条款自我保护，公民权才有根本法的保护。公民的宪法保障是一大缺口，必须要堵住这个缺口。

当权力和社会共同感受到宪法秩序受到威胁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宪法独裁如果以颠覆宪法秩序来维护社会秩序，就走向专制，权力就彻底丧失了公民承诺的权力合法性的理由。不能以高尚的道德理由来超越宪法。现在中国的治理，常常是抢占道德高地，来颠覆宪法权威。国家不能超越宪法，给社会更多更苛刻的规则。这些规则只能叫例外的规则，不应由国家来提供，只能由社会来约定。因此，国家不能侵入社会，而社会必须限定国家。这个关系理顺，宪法的生存有了保证。理顺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大家可以回归现代的、宪法政治的常识层面，不要动辄就用纪律来干预宪法，动辄就用道义来干预宪法。既然依宪执政，依法治国，那么大家共同回到宪法平台上，这就是结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胳膊与脑袋

○　任剑涛

《炎黄春秋》以温和和理性的基本格调，发表这么多对国家有积极作用的建设性文章，其实对谁都好，不仅是对社会，而且对于政府也是好事。没有必要因为环境的严峻，我们该坚守的底线不去坚守。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治国不能用胳膊管脑袋”。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跟人一样，它其实就是人的集体。理性的行为必须是脑袋管胳膊。一个人的胳膊管脑袋，那这个人很不正常，很危险。一个国家呢，一样也是要脑袋管胳膊，不能胳膊管脑袋。国家的胳膊是谁？就是公安、武警、军队这些强力机构。这些机构不能没有。没有就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国家之所以建立这些强力机构，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讲，国家是暴力的合法垄断，它最后的后盾是暴力。但是国家的暴力不是随便用的，它的唯一正当的用法就是以暴制暴。私人之间有暴力，健康的国家要来管。如果只是口头上的言论，国家就不应该管。

国家的脑袋是什么？国家的脑袋就是法，我们讲依法治国，国家要按照法来治理，法不能体现随便意志，人民意志也好，执政党意志也好，要通过法来治理。法是怎么产生的？法不是人大代表想怎么制定就怎么制定，而是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对需要决定的问题经过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形成一个多数意见，这才是建立在民主自由基础上的良法。

所以，法应当体现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前提是言论自由。当然，言论自由鱼龙混杂，其中有对的，也有错的。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就是：只要言论不会造成直接的严重的后果，言论就必须有自由。这个道理在英国思想家密尔的《论自由》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讲三种可能性，第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自封为一贯正确。为什么要保护不同意见呢？因为我们谁都不是上帝，谁都不能讲，只要你不同意我，你就是错的，我就是对的。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力和资格。第二，任何人的言论都有对的，也可能有错的。但是当我们封杀错误言论的时候，同时也封杀了他正确的言论，最后受损的还是社会。第三，即使是绝对错误的言论，也有发表的权利，因为它对社会也有贡献。如果没有这种错误言论的挑战，所谓的真理就失去了生命和价值。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看得最清楚。以前的儒学、马克思主义，任何东西，一旦国家把它奉为正统以后，就处于长期停滞的局面，最后丧失生命力。我们看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异端，但是非常有活力。所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通过国家这个强力机器去管制言论。今天一定要明确这个基本底线，不要用公安这种强力机构，也就是说用胳膊来管制我们的脑袋。

当然，言论不是绝对自由的，在某些时候，某些言论马上就会产生危害。美国最高法院也不承认言论是没有底线的。霍尔姆斯大法官举过一个例子，大家也在反复引用这个例子，就是在一个剧院中，漆黑一片，有人突然讲“失火了”！大家都很害怕，也来不及核实是不是失火，大家都冲向大门，造成踩踏挤压事件。这是不能用言论自由为他辩护的，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识别。在萨达姆被推翻以后，伊拉克的伊斯兰教举行活动，在一个桥上很拥挤，有人突然说，恐怖分子来了，大家一片慌乱地跑。最后照了一张照片，地上空无一人，满是拖鞋，造成了严重的踩踏事故。这种言论是不受保护的，它之所以不受保护，不是因为它错误，而是因为没有时间对这种言论去进行鉴别和辩论。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就提出一个基本原则，只有当言论会造成清楚的现实危险的时候，国家才能够去管制言论。必须是言论造成的危害是现成的，马上的，不能说挑战执政党的某些说法、某些既定的方针、立场、主

张，这个不算数，因为正是需要通过自由的辩论，才能把这个问题辩论清楚。任何立场都可能是错误的，如果毫无原则地去为它站台，就失去了很多自由选择的可能性——我们本来可以选择一种更好的国策。言论自由给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机会和权利。当然，言论如果不经过辩论、没有时间辩论，马上就会产生后果，就另当别论。所以，这种威胁必须是现存的很清楚的，而且必须是很严重的；这种威胁不会是很多的。有些时候有人发表一些非主流言论，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可能伤害了某些人的感情，这不算现实的、清楚的威胁。言论自由对这个国家太重要了，这种轻微的所谓伤害，不能被算在其中。它必须要让步，向更重要的权利让步。

我们拿这个基本标准，来衡量《炎黄春秋》以前所发表的言论和一切文章，都是没有问题的。都不会造成任何清楚的、现实的危险。而恰好相反，它能够澄清很多误解，澄清很多对历史、对当代认知上的严重的偏差。我希望我们能够坚守言论自由的基本底线。《炎黄春秋》是公共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是脑袋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它能够继续办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依宪治国离不开律师

○　孙国栋

依宪治国必须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律师制度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律师是天然的人权维护者，是制约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不可替代的力量。

近些年来陆续披露的系列冤假错案，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案等，震惊海内外。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没有认真听取和采纳律师的意见。上述各案被告人的律师当年都无一例外地提出过异议，有的干脆做过无罪辩护。可是，强大的国家机器硬是把错案办成了"铁案"。可见，没有律师，公、检、法形成合力，要想构陷一个异己分子、制造一起冤狱简直易如反掌，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一介草民聂树斌，均难以幸免。

一些公权力视律师为眼中钉、肉中刺，"麻烦制造者"，必欲除之而后快。前两年有"新黑五类"之谓，律师竟位居五类之首。殊不知，有了法治，有了律师，包括当权者在内的所有公民才有安全感，才不会人人自危，避免随时沦为阶下囚之虞。

有人指责律师"钻法律的空子"，其实这并不可怕，因为其前提是承认法律，并促使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修补漏洞。比起"钻法律的空子"来，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执法犯法，是公权力的恣意妄为。人类历史已证明，官府和警察干坏事的本事，要远远大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而律师的价值恰恰在于，站在公权力的对面，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反驳和抗辩，形成对公权力的制约甚至否定，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进而实现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权的最终目的。

（作者为《律师文摘》主编）

（本组图片由王海印拍摄）

（责任编辑　王彦君）

本刊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规定，结合我刊的实际情况，凡向本刊投稿，即视为作者将作品的数字化处理权、网络传播权、电子发行权、无线增值业务权授予本刊，同意本刊将以上权利转授予与本刊合作的第三方使用，稿件采用后即自动获得上述授权。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酬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稿酬。如作者对上述处理有不同意见，请在来稿中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 邓小平

编者按：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做了一篇极为重要的讲话，核心内容是要改革我国的政治体制。讲话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全文刊登。而在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做出了一个新闻史上不多见的举动，重新发表了这篇讲话。中共中央以此向全党全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与邓小平讲话时隔近7年，尽管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改革政治体制，没有改变，也绝不会改变。

时间过去了35年，离开党的十三大也已经28年，严峻的现实是，当初规划的党政分开、加强监督等一系列根本措施不仅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而且党的廉政建设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倒退。同时，旧的政治体制更加严重地羁绊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我们面临着与当年重发邓小平讲话甚为相似的形势。鉴于此，本刊再次发表这个讲话。我们相信，重温此文，能够加深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国家精神的理解。

同志们：

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

一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同志接替；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同志和我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过与有关各方协商，也准备建议做一些变动。以上这些变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反复研究过的。这次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

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中央的这些考虑，是为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中央已经迈出第一步。书记处成立以来，工作很有成效。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二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这里着重讲一下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大批干部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这就造成了现在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的状况。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我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要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一九七五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者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次我们提出减少兼职过多、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给中青年同志腾出台阶。台阶挤得满满的，他们怎么上来？台阶有了空位又不给他们，他们怎么上来？

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一般说来，年轻人经验少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应该承认，现在一些中青年同志的知识，比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少。经过的斗争考验少一点，领导经验少一点，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解放后大专、中专毕业的学生七八百万，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经过了十年以上的锻炼。没有受过大专、中专教育的中青年干部有实践经验，缺点是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只要有计划地训练和培养，很多人一定可以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此外还有一大批刻苦自学的中青年优秀人才。上山下乡的青年中，也有不少深入群众、用功学习、很有才干的人。实际上，现在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同那些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的干部来比，他们更了解群众，更了解实际。很多工作主要是依靠他们，只是因为没有提拔，他们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力，遇事只好不住地请示报告。这就成为我们的官僚主义现象的一大来源。总之，我们绝不要低估这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很多中青年干部政治本质很好，不是帮派分子，思想路子对，又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什么不去选拔和破格使用？有些企业和单位，群众自己选举出的干部，一些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任负责工作的干部，很快就作出了成绩，比单是从上面指定的干部合适得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猛省吗？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满，进行积极或消极抵制，政治表现好，又肯干，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各行各业、各地区、各单位都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和提拔他们。就是一度受过林彪、江青一伙的欺骗，犯过一些错误，后来确已觉悟转变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也不能抛开不用。不少同志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点人，总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不会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这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上半年能源生产全面增长效益提高
实现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
邓小平

1980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

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

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经过十多年的考验，中青年同志的政治面貌，领导和群众基本上都是清楚的。老同志还在，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是应当可以选好选准的。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三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

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

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四

现在说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

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不少。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对待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此外，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

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

总之，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

五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经过多次酝酿，有一些已经在五中全会以后开始实施，有一些即将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其他也将在条件成熟时陆续采取具体步骤。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以外，现在正在考虑逐步进行的还有如下重大改革：

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第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第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既不利于工厂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工厂里党的工作的健全。实

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这些单位的行政负责人要努力学习各种有关管理和技术专业，再不能长期泡在各种会议里，老是当外行，那样我们就永远实现不了现代化。这些同志大多数是党员，管理制度改变了，他们除了要受上级行政部门的行政领导以外，还要受上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同级党组织的监督。同级党组织的任务也没有减轻，而是真正加强了党的工作。工厂、公司、院、校、所的各级党组织，要管好所有的党员，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骨干，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考虑到这个改革对全国广大的基层组织影响很大，现在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到时机成熟时再作决定。

第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

第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

上述六条，都请同志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在中央制定并正式公布新的制度和条例以前，有关各方面的工作，仍照现行制度办事。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因此，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

同志们！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全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前进阵地。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

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8·18讲话”

○ 李　锐

几年来，我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多次提过这样的建议：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今年是这个讲话发表35周年，我再次提出了。《炎黄春秋》编辑部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希望我谈谈重新发表邓小平这个讲话的理由，我就谈几点看法。

“8·18讲话”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压制民主、贪赃枉法；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35年过去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现在有议论），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是几千年的人治传统），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反而将封建专制主义发展了。邓小平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了社会腐败。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歌功颂德，假政绩；买官卖官，贿赂成风，都是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以政府权力制衡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35年前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要求。

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4页）今天，改革攻坚进入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迫切性日益显现，邓小平这篇讲话的现实指导意义更加突出了。

我们对这篇讲话重视不够

邓小平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曾经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欢迎。但是，很快就没有了下文。这是因为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开始动摇。

“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我们党内的保守派

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阻止政治体制改革找到了借口。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的第三天，1980年9月24日，胡乔木就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中央要研究类似波兰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矛盾，可能达到的激烈程度和爆发形式；社会主义制度所未能解决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隔阂或对立，包括经济纠葛和政治纠葛；他强调，“从波兰事件中可以看到，外来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影响”对我们也是一大问题；如独立工会问题，“我们如不从速解决也并非不能造成这种局势，而且其他群众组织也可出现类似情况”。

后来，在胡乔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好像有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存在与波兰相类似的问题，发展下去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小平同志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传。”

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的这篇讲话被停止了宣传，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搁下了。

为了给十三大做思想准备，中央重新发表过“讲话”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邓小平的“讲话”曾经重新发表过一次。那是198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重新发表这个讲话，并配发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的社论。

这个社论说：“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着眼，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经验和十年动乱的教训，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改革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重新发表这篇讲话，组织全党同志认真学习，可以说是十三大的重要思想准备。”

当年的情况，我了解一些。

1987年年初，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巨大震荡，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党内一部分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反自由化”的运动席卷全国。年内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可能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

当时中央代理总书记的赵紫阳非常担心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冲击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冲击研讨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于是他利用各种机会，给“反自由化”运动降温。

但是，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部门却组织了一大批文章，又发表讲话，开讨论会，力图把“反自由化”扩展到各个领域。

4月28日上午，赵紫阳来到邓小平家，同小平做了一次长谈。他汇报了一些人以“左”反对改革开放，借反自由化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情况。他说，这种气氛与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从现在起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一面，为十三大的胜利召开做好舆论准备。邓小平赞同这个意见，要赵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于是，赵建议重新发表1980年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邓小平同意了。

于是，1987年7月1日在党的66周年生日时，《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邓小平的“讲话”，刹住了那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的主流。很快，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宣传也提上了日程。

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就又中断了。“价格闯关”和新的学潮转移了党的指导思想和整个社会的关注重点，我们丧失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邓小平这篇讲话很少有人再提起过。

现在的党中央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执政，要特别重视宪法，问题在于要排除万难真正实行起来。这就是我提议重新发表邓小平“讲话”的缘由。■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2014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40元。另：

2011年合订本为简装一册，定价110元。

2012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2013年合订本为简装（上、下册）两册，定价120元。

咨询电话：010-68532048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大刀阔斧推进法治

——田纪云忆乔石

○ 杜明明

2015年6月14日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1993年3月，乔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田纪云当选为常务副委员长，田纪云与乔石观点一致，思路相同，配合默契，各项工作开展顺利。为此，我们采访了田纪云，请他谈谈与乔石一起工作的日子，以怀念这位对中国法治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人。

用法制建设捍卫改革成果

杜明明（以下简称杜）：田老，感谢您在乔石去世的悲伤日子里还接受采访，请问您是什么时间认识乔石的？

田纪云（以下简称田）：我与乔石相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从四川调到国务院后。1983年，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6年4月，乔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政法工作。不过，乔石在国务院工作时间不长，且因分工不同，我与他个别接触不多。但他坚持改革开放的立场，严谨的工作作风，以诚待人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乔石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致力于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这在他出版的《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中有较多的体现。

田：这本书，乔石送给我了。我也仔细读过。乔石是1985年7月接替陈丕显主管政法工作的，这也正是改革开放起步的艰难阶段。当时政法战线面临着许多困难：从社会层面来说，文化大革命后社会治安问题异常严重，犯罪分子气焰十分嚣张。而公、检、法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彻底砸烂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后才逐渐恢复，有经验的领导骨干大都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这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及面临的社会治安状况很不适应。

在这种情势下，乔石将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1987年4月，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第一次全国政府法制工作会议召开，乔石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当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我们要学会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加强法律监督来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6月，乔石又提出要加强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他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政府转变管理经济的职能，逐步由过去那种主要采取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转变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间接控制和调节经济的运行，把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结合起来。我们要充分认识加强经济立法的重要性，运用法律手段推动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要学会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经济法律来管理经济活动。”

“要学会在改革的过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经济法律来管理经济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在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只有把探索的经验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够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

杜：从《乔石谈民主与法制》这本书来看，乔石的确是围绕着经济工作来进行法治建设的。

田：乔石说，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法工作要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更自觉、更主动地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对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都要依法加以保护和支持；对一切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

1992年2月16日田纪云看望乔石及夫人

田：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当年10月下旬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写进了党章。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1月决定成立以乔石为组长的宪法修改小组，草拟宪法修正案。距来年全国人大八届大会仅有三个月时间，乔石领导的宪法修改小组夜以继日地工作，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方案。

都要依法加以反对和限制；对一切破坏改革开放、破坏民主与法制、破坏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要依法加以打击和制裁，不能丝毫放松。依法打击一切犯罪活动、惩治犯罪分子的同时，必须大力强化依法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职能，强化依法管理社会、保障正常社会秩序的职能，强化依法维持经济秩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职能。你看他提了多少次依法！总之，要认真研究解决政法工作中的新问题，积极探索，不断创造，肩负起保卫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杜：我记得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4月，您在中央党校发表过一个讲话，坚决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引起巨大反响。那时，乔石是中央党校校长，是他邀请您去的吗？

田：不是。但邓小平“南巡谈话”发表后，乔石积极支持、大力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张。1992年中央党校新学期开学时，乔石以校长身份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多次引用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尤其强调“‘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乔石是政治局中公开出来响应邓小平“南巡谈话”比较早的人。

邓小平南巡后修宪提速

杜：邓小平“南巡谈话”后，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以修改宪法来保障改革开放的成果，乔石领受了修改宪法的重任，您是否也参与了这次修宪？

杜：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乔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您是常务副委员长。你们在一起工作了5年，这段时间，您可以说对乔石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田：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的5年，是我与乔石直接共事且个别接触比较多的时期。我们来往比较多，首先是我们观点一致，其次，我们配合默契，各项工作开展得顺利，在处理各方面关系上也比较协调和谐。

八届人大功绩：宪法修正案通过

杜：八届全国人大的重大功绩之一，是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次修宪，是在乔石主持下进行的。您也参与了这项工作。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方案形成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后，下发征求各地方、各部门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然后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田：我们八届人大常委会组成后，第一项任务就是主持审议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向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了审议意见。代表大会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共9条），包括“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等

内容。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改革开放成果固定下来，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的5年，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急需用法律来引导、推动和保障。乔石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常委会要把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以改革的精神对待和解决立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点，争取在本届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

杜：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些观点。

田：第一，立法要同改革开放进程相适应。立法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使改革开放的成果得以巩固。但仅仅这样做还不够，还必须充分认识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应当通过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改革开放的发展，依靠国家的力量排除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阻力，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制定法律后行动，避免立法滞后于改革需要的状况。

第二，起草法律一定要从全局出发，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避免不适当地强调局部利益和权力。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就会贻误法律出台，阻碍统一开放市场的形成。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打破行政权力划分的传统格局。立法，要有利于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管理制度。

第三，立法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吸收国外的经验。凡是国外立法中比较好的又适合我们目前情况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大胆吸收。有些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可以直接移植，在实践中充实、完善。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国际性经济，我国有关市场经济的一些法律，需要同国外的有关法律和国际惯例相衔接。

第四，有些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一时制定不出来，可以先请一些地方搞地方性法规。特别是改革开放搞得比较早的地区，积累的经验比较多，应当先行一步，成为经济立法的试验区，为制定法律提供经验。

第五，更好地发挥专家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今后，各部门起草法律，都要吸收有关方面的专家参加起草工作。

第六，在加快立法步伐的同时，注重提高立法质量。

按照上述精神，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起草法律的工作进行了改革。过去，绝大多数经济方面的法律是由国务院各部门起草的。这一届，除有些法律继续由它们起草外，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更多地牵头组织各方面力量特别是专家学者，来起草法律。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拟起草的115件法律中，有36件是由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承担的。这是法律起草工作的重大突破，对于改变人大立法工作的被动状态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前所未有的。

立法129个，通过118个

杜：翻阅一下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第八届人大立法的速度和数量是前所未有的。八届人大及其常委会任期内，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29个，通过118个。不仅立法速度前所未有的，立法质量也有了提高。

田：经过5年努力，在乔石带动下，在规范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和对外开放等方面，人大都出台了一批重要法律，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劳动法等等。本届任期内制定的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连同以前制定的有关经济法律，初步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制条件。同时，还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环保等方面也制定和修改了一批重要法律。

乔石认为："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如果我们制定的法律得不到实施，实际上等于没有法。"为此，他强调，八届人大常委会要强化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法制的统一；要下大力气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

田纪云与本文作者　　田承刚 摄

不允许任何组织或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加强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工作监督,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国家监督中最具有权威的有法律效力的监督,在加快改革开放、实现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更需要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最遗憾监督法没有出台

杜:有记载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后,你们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过一个聚会,乔石在会上总结你们这一届的工作时说:最遗憾的是监督法没有出台。

田:是的。乔石上任不久就提出:监督法还是要上,需要制定一个法律规范,对权力进行监督。权力如失去监督是非常危险的。后来乔石多次指出,监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制约,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持,也是一种服务。不仅需要立法,而且需要建立起对权力强有力的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体系。他说,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各种形式的监督,有人大的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有党组织的纪律检查监督,有政府的行政监察监督,有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政协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民主监督,还有新闻舆论监督,等等。为了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不受侵犯,各种监督都需要加强。要把这些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在乔石主持下,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完善人大监督职能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常委会坚持把法律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放在同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开局之年,就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使这项工作进一步程序化、制度化,更富有成效。5年内,常委会对21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向常委会做了报告,还向全国人大会议做了关于农业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这对于促进法律的实施、增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制观念,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工作监督方面,5年中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报告34个。从1996年起,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关于预算执行情况报告的同时,还安排听取审议审计署关于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开辟了对预算执行情况监督的新途径。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视支持和总结地方人大常委会开展监督工作的做法和经验,在向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中,一再肯定了代表评议和述职评议等形式。八届全国人大任期的那5年,是地方人大工作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

人大要增强立法功能

杜:乔石的部下在回忆文章中多次谈到,乔石在第八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力度很大,也具有开创性。您是怎么看的?

田:是的,乔石很重视常委会组织制度建设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我记得,换届不久,即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规范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行为,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还制定了一系列会议规则和工作规则,使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工作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乔石重视和关心人大机关干部的培养、提拔和使用。在他担任委员长期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内培养和提拔了一批德才兼备、懂法律的干部担任局级以上领导职务,其中部级干部8人。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乔石对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有许多深刻阐述。他认为,如何真正按照宪法规定对待人大和人大工作,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93年7月,乔石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如何看待人大和人大工作,

这个问题应该说早已从法律上解决了。从第一部宪法颁布到现在，关于人大的地位、性质和作用的规定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未必都解决了，因为实际工作中总是碰到人大没有被充分认识和尊重的现象，党内、党外还有一些对人大有各种议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今天我不说别的，只想强调两条：一是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人大地位、性质和作用的认识；二是要结合实际不断地进行宣传教育。”他说：“首先要从我们在人大工作的做起”，“如果我们自己就认为到人大工作没有什么事啦，是退居‘二线’啦，或者是什么‘一线’工作‘二线’干部啦，抱着这样的认识，就不容易把人大工作搞好”。同时，党内要统一认识。乔石1994年6月在贵州省考察时说：“大家都得依法办事。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领导制定的法律，党不遵守谁遵守？你如果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还能叫老百姓遵守法律吗？在进一步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很重要的。人大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杜：在《乔石谈民主与法制》一书中，他很多讲话中谈到推进民主进程的话题，他强调，推进民主进程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田：乔石认为，要十分注意研究怎样把人大搞得更民主一些，法制更完备一些。他指出：“过去，我们对法制讲得比较多，对民主讲得少一些。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问题，一讲民主就怕麻烦。要认真总结这次换届选举的经验，研究怎样使选举更民主一些，程序更完备一些。”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民主问题，多年来无论在什么场合，我始终认为一定要把民主的旗帜牢牢掌握在我们手里。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斗争，我们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有时甚至很残酷、很不容易，牺牲了几千万人，我们党一直高举起民主的旗帜，现在我们党执政了，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说到底，民主问题是人民当家做主的问题。”我很同意。

杜：我记得，乔石由衷希望我国民主法制和人大制度建设，能有一个较快的发展。1992年12月5日，他在首都纪念宪法颁布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贯彻实施宪法，就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他强调：“要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权利和自由，继续完善保护公民权利的各项法律，从制度上物质上为公民行使权利提供保证。对于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和制裁。”

田：1994年9月15日，乔石在首都纪念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按照宪法规定，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建设，使人大及其常委会成为有权威的国家权力机关，成为能够担负起宪法赋予的各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矛盾的为人民所充分依赖的代表机关。”。

杜：这些论述，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啊。乔石老去世后，媒体上很多怀念他的文章，您作为他的老朋友，能否对他做几句话的评价？

田：乔石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他工作稳重，为人厚道，光明磊落。在工作上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既坚持集体领导，又注意发挥每个领导成员的积极性。所以，我在八届人大常委会与乔石共事的5年，心情十分愉快、工作得心应手。乔石去世，我很难过。我永远忘不了我们一起工作的日子。■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周扬纪事

○ 刘再复

周扬与胡耀邦在一起

一

这几年，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想起周扬的名字。许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些所谓“学术权威”的名字，不值得我多想，想下去便觉得他们身上太多寒气，以致使我也冷了起来。而想念周扬时，心倒会热起来。因为这种直接的温暖的感觉，又使我确信，周扬是值得怀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周扬的晚年时期，在四五十岁的新一代人中，我应当是与他联系较多的一个。我为他起草过《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的报告等。还为他起草《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共同署名）。最后一次是第五次全国文代会的报告，那时胡耀邦和他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已决定仍然由周扬作为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负责人，由他做主题报告。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阳翰笙、冯牧等拟订了一个为他起草报告的候选人名单，交给周扬挑选。周扬已病重在床，但还是认真地看了名单，最后还是选择了我。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许觉民受委托告诉我此事并要我执笔起草全国文代会报告。我已下决心不再“代圣贤立言”，便竭力推辞。觉民所长见我执拗，先是拿起党的文件“吓唬”我，说文联党组给中央的报告已写上我的名字，而且中央已经批下来了。他怕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不信，居然把阳翰笙代表文联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原件放到我的手里，让我仔细看看。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读了下来：

启立同志并转中央书记处：

遵照本月17日您关于第五次文代会报告起草组名单，要“文联党组讨论，经周扬同志同意，报中央备案”的指示，我与夏衍同志商量后，文联党组于26日开会讨论，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建议：报告起草仍由夏衍任顾问，阳翰笙任组长，其他成员为：冯牧、赵寻、陈涌、江晓天、刘厚生、罗艺军、王春元、刘再复等同志。经夏衍同志斟酌后，已由周扬同志审阅批复同意。兹特呈报中央准予备案。

这次党组会上，并讨论了第五次文代会整个筹备工作的领导问题。建议：扩大并及时组成五次文代会筹备领导组。由周扬任组长，夏衍、阳翰笙、林默涵任副组长，其他成员为赵寻、冯牧、陈荒煤、李瑛、袁文殊、延泽民、陆石、李庚、孙慎、华君武等同志。周扬、夏衍同志也同意这个名单，现同时报请中央一并备案。

附呈周扬同志21日口述函打印件，按他的意见抄送请耀邦、仲勋同志和您审阅。

报告起草组当即开始工作，筹备领导组也将及时召开。

您对以上回报事项有何指示，盼告。

阳翰笙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

许觉民在我读完后说:此件中央已经批准下来。但他知道我的怪脾气,见我久久不吭声,进而便以“情”来打动我。他出示了另一张起草者名单,指着我的名字说,你看你的名字上画了个圈圈是周扬同志画的。他身体不好,我们把起草者名单送给他时,他要了笔,手抖着,然后颤巍巍地把笔落在你的名字上。许所长说到这里,我心一热,便答应了。我早知道周扬病得很重,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如此器重我信赖我,还用他剩余的未被“文革铰肉机”榨尽的一点气力对我发出期待,我能无动于衷吗?中国俗话说“盛情难却”,其实最难却的是重托的真情,我没有理由拒绝了。那一刹那,我跟自己说,赶紧写吧,这位当代文化领袖还能看到我为他起草的文字,也许还可以带给他一点最后的欣慰。

没想到,这之后,他的脑软化病情加重,不能像以前那样总是把报告的主旨想好。几次给他起草,我个人收获最大的是写作前倾听他讲述报告的要求和要点。那实际上是大文章的框架和基调,也就是“文眼”“文心”,他给报告立了心,我的文章就好做了。这个过程,真是学习的大好时机。八十年代前期大约五年,我在这一“周扬学院”里受益无穷。经过这段“修炼”,我觉得自己写作的宏观把握能力提升了。像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报告,他就对我和张琢(另一位帮我起草的朋友)说,这个报告要以毛主席说的建设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为“纲”,通过鲁迅这一典范,把三个范畴(科学、民主、大众)讲清。每次听他一讲,不仅听到写作“动员”,还知道如何下笔。可是,一九八四年这一回他病倒了,连见个面都不行,我只能在文联为我租好的旅馆里苦思冥想了。他们要求我先想好主题,然后写好提纲,一个月内完成此事,下个月文联党组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果然,一切都按时间表施行。一九八五年一月间,通知我和夏衍、冯牧、林默涵一起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让我向胡耀邦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们汇报我拟好的提纲。

1979年,周扬在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

接到通知后我兴奋了一个晚上,我把自己要讲的纲要想了又想,烂熟于心后才和许觉民一起进了中南海的中央书记处。一进门,就看到会议室中间椭圆的大约两丈长、一丈宽的大会议桌。坐在正前方的是胡耀邦总书记,胡启立坐在长桌的中间,他的身边有胡乔木、习仲勋、乔石等书记,我的座位正面对着他们。在他们边上还坐着夏衍、冯牧、林默涵。我和许觉民坐下来之后,立即听见胡启立说:开始汇报吧。于是,我就把烂熟于心的提纲用20分钟时间讲完。讲完后夏衍做了大约5分钟的说明,他事先已审阅过提纲,只是说明周扬同志已住院,无法到会,提纲中所强调的作家、艺术家在新时期兼有推动历史前进和艺术创造的双重使命这一主题是文联党组认可的。接着书记们发表了意见。胡耀邦说话时我倾听着,并做了笔记。他说,现在中国处于变革大潮中,泥沙俱下,一面是发展,一面是流氓、地痞、投机者兴风作浪,他们影响社会风气,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也要影响社会风气。都在一条河里,我们要同舟共济啊。讨论“提纲”后我们这些老少“秀才”们就要走了,没想到胡耀邦面对着我说,小刘,你们坐下来听听,于是我和许觉民居然留下来列席书记处的下一段会议。主持会议的胡启立宣布还有两个议题,一是边疆干部是否提高工资的问题,二是要不要设立博士、硕士学位制度问题。讨论中的发言,习仲勋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他敢于直言,而且语端带着情感。讨论学位问题时只有胡乔木一个人发言,他倒是娓娓道来,说明建设学位制度的必要性。散会时,我和许觉民走到胡耀邦面前,和他握手,他大约感受到了我敬爱的目光,又说了一句:要同舟共济啊!

会议之后,为了周扬,为了胡耀邦,我在旅

1981年9月25日，在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邓颖超与周扬交谈

馆的灯光下日夜写作，很快就交出了初稿。我向许觉民和文联党组请求，修改和定稿就由别人去做，我刚刚接替他担任研究所所长也的确太忙。党组同意我的请求，最后公诸社会的“报告”有没有用上我的文字，我也记不得了。

回到所里，我除了必须进入陌生的“领导角色”之外，还得开始着手写作周扬给我的另一篇大文章，这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头条”即总论。这一总论题为《中国文学》，放在辞书的最前边，篇幅一万五千字。具体执行主编工作的王元化和许觉民指示说，此文已写了两三年了，到处征求意见，还是写不好。最后和周扬同志商量，还是由你来写。你要写好三个部分，一是概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轮廓，从古代到现代都得说；二是概述中国文学的特征；三是概述中国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史略。面对这一重托也是重担，我明知繁重，又是因为对周扬个人怀着知遇之情而完成了这一工作。完成之后，本应只署周扬的名字，但王元化、许觉民为了表彰我的劳动，便不顾名分辈分的差别，把我的名字和周扬的名字署在一起。当时我四十三岁，还是全国青联委员，常以青年自居，能与中国文艺界的泰斗人物并置，自然高兴，但我当时之所以没有“谦让”，实在是因为周扬晚年留给我一种人性尚存的温馨印象，并非“暴君霸王”，使我觉得把自己的名字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实在是非常光荣。今天，我写这篇文章，也是在为他的晚年未灭的人间性情做证。到海外之后，我所做的反省都是人性的反省，包括对故人的回忆，也唯有那些还具有人性挣扎的往事，才能重新激起我热爱人生的波澜。

二

我和周扬真是很有缘分。一九七八年他从暗无天日的文字狱中刚刚走出来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而我正是院长胡乔木和另一副院长邓力群领导下的写作组成员。工作室就在周扬办公室的楼上。那时我正在如痴如醉地批判“四人帮”，经历着人生最快乐的向前冲锋的火热日子。当时周扬也刚摘下“四条汉子”的魔咒，从临近死亡的峡谷中走出来，尚未完全抹掉从地狱里带来的阴影，谈不上什么架子，而我又仗着自己年轻，就常常直闯他的办公室，和他谈论我正在写作的讨伐“四人帮”的文章和社会科学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血腥故事。那时，文化大革命如山如海的大冤大仇大恨仿佛全都集中在我身上，除了写文章之外，就是滔滔不绝地诉说荒诞与野蛮。可周扬除了认真听之外，很少说话，只是我在谈到把孙冶方打入牢房，把张闻天按之入地，把厕所里的铁丝纸篓戴到俞平伯老先生的头上时，他才连声叹息。那时，我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潮湿的。从他的泪眼中，我发现他心事很重。

这是周扬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是一种伤感的印象。这种印象在后来与他的频繁接触中愈来愈深。而且知道，他的伤感一是为自己被伤害，一是为自己曾伤害过别人。特别是后者，我亲眼看过他多次为此落泪。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九年我到颐和园清华轩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当时在清华轩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三个“将”（陈荒煤、冯牧、林默涵）和五个“兵”，周扬也几次到过那里。初稿完成后，周扬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大约有四百个文艺界著名人物参加的征询意见会。在这个会上，丁玲、艾青、萧军站起来走到周扬面前，痛斥他过去的“专横”，一点儿也不给周扬面子。那时我坐在离周扬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看到他恭恭敬敬地倾听这些满怀

义愤的“痛骂”，眼睛直愣愣的，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那一刹那，我觉得周扬真是可怜。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头目被打得尚未直起腰杆，这些作家又要向他讨债而他又确实欠了债。他欠债是因为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绝对忠诚，而毛泽东却咬定他背叛革命文艺路线而整个地抛弃他。散会后的第三天我在颐和园清华轩见到他，当时其他写作人员都回城里了，只有冯牧和我在。我们就陪着周扬聊天，并自然地说起这次征询意见会。周扬用一种负疚的、低沉的声音说：“五七年伤太多人了，那篇批个人主义的文章太激烈了，他们有气，他们都吃了苦了。”说完就落泪。这一天我也第一次听到他诉说自己的委屈与困惑。他说他每写一篇文章每做一次报告都要重新认真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毛主席也亲自给他写了三十多封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这样整他。说完又落泪。他走了之后，冯牧说：周扬同志好极了，一说起错打一些同志就掉泪，以后少提这些事，他的眼睛已经很不好了。我点点头，并觉得周扬确实非常真诚地感到过去自己伤害过别人，对此负有责任，尽管他心里明白自己又是一个执行他人意志的悲剧者，无可逃遁的政治器具。

我从清华轩回来之后，就很少再见到周扬。当时我埋头撰写《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其实，周扬真正看中我也是从“鲁迅”这个名字开始的。大约是一九八〇年秋天，当时担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陈荒煤找我，说周扬想请我和另外几个同志为他起草一篇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答应下来。在一次小型讨论会上，周扬曾谈到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的怀疑精神。这句话使我对周扬倍增好感。但它遭到林默涵的批评。最后由我和王士菁、张梦阳等人起草、周扬在鲁迅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宣读，所做报告题目是：《发扬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其中，“鲁迅怀疑精神”云云，烟消云散，不留一点痕迹。

三

这之后不久，我又作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报告的主要执笔者，再次代周扬立言，从一九八一年的春天一直忙到秋天。当时周扬、陈荒煤根据我的意见，请我的朋友、哲学研究所的张琢参加，还请另一朋友、文学所的张梦阳协助。这一写作过程，其复杂与曲折，是我此前绝对料想不到的。这一过程的细节还是留待以后再说，我这里想说的仍然只是周扬的感伤。为了写好这个报告，周扬在他家里以及在北京医院，多次和我谈论鲁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作为反对鲁迅的“四条汉子”之一被揪出来的。以《鲁迅全集》中的一条注释作为借口，说这条注释是他射向鲁迅的一支毒箭，然后便开始清查以他为代表的所谓从三十年代就开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周扬作为这条黑线的“祖师爷”，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自始至终受尽污辱性的批判。我常想，一个人能承受这种大规模的洪水般的攻击、污蔑、毁谤与中伤，能在泰山压顶似的当代文字狱中存活下来真是个奇迹。陶铸的夫人曾志告诉过我，当她听到广播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觉得每一个字都像刀子往她心上戳，而周扬听到姚文元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不知道怎能受得了。我一直想了解：是怎样坚韧的信念与观念使他能在最肮脏最恶毒的语言轰炸中支撑住生命。每次见到他时，我几乎都忍不住要问他。而背着“鲁迅之敌”的罪名蒙受十年攻

1984年，周扬与夫人苏灵扬

刘再复

击的他，现在又要作为纪念鲁迅的文艺界领袖而发言，他又该说些什么呢？心里翻腾的是怎样的真实情感呢？也许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好奇的年龄，所以总是留心他的想法说法，并把他说的话做了记录。尽管这些记录因为去年北京寓所的被劫，材料可能散失，但我仍然记得他一再对我说：鲁迅的伟大，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无人可比，他最了不起的一是对中国历史的深刻认识，一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刻认识。鲁迅是个天才，可是在鲁迅处于晚年的三十年代，“我们那时还很年轻，太幼稚，不能充分认识鲁迅”。周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很诚恳的，我能感受到他的每一句话都发自情感深处，一点儿也不掺假。他知道那时人们仍然在神化圣化鲁迅，鲁迅的研究者和宣传者仍有许多矫情，他知道这种圣化乃是鲁迅评论另一形式的幼稚病。但他不是忙于去指导他人，而是想到自己年轻时代的幼稚并为此感到遗憾。他的这种认识与情感，使我感动，所以在写作这个报告时，我要为他负责，尽可能地抹掉文化大革命投给鲁迅的神圣光环，绝对不能再滥用鲁迅的名义以号令作家。于是，我尊重周扬的意思，在写作时强调鲁迅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精神和强调作家的良知，语调平和平实一些。这一报告初稿写成的时候，周扬很高兴，他做了修改后便印发送给中央的领导人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征询意见。没过几天，胡愈之、傅钟等的意见纷纷回来，他们都很满意。当我正在松口气的时候，周扬让陈荒煤通知我和张琢立即到北京医院参加紧急会议。这次会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当时周扬住在北京医院，所以由王任重召开的此次讨论报告初稿会议只能在医院里开。那天会议除了王任重以中宣部部长身份主持外，参加的还有周扬、贺敬之、林默涵、陈荒煤等，他们都是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副部长，此外，还有李何林、王士菁、我与张琢。王任重一开始就借助胡耀邦之名，说他上午刚刚见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报告还是得有点战斗性。于是，王任重批评说，这个报告初稿完全没有战斗性，完全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还提什么作家良知，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听了王任重的话之后，我和张琢都沉不住气，当场就和王任重辩论起来。我说，过去十年把鲁迅弄得满身火药味和战斗气，借他的名义打人，这回报告可不能这么写了，我们应当有一个平和的、求实的、科学性强一点的报告。张琢也紧接着发言，支持我的看法，他锋芒更劲，用辞极为坦率无忌。王任重没想到我们敢于当面顶撞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口气放缓和了一些，说这个稿子作为学术论文还是不错的，你们可以用个人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但不能作为党的报告。于是，王任重便委托林默涵组织一个班子另写一篇。那时距离开会时间只有十几天，三位临时上阵的起草者日夜奋斗，而我则赌气真的想把初稿拿到《人民日报》发表。周扬得知我要这样做时，急了起来，说：“等等，情况可能还会有变化。”果然，过了几天，作为此次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邓颖超通知周扬和陈荒煤，说她已读完报告初稿，并说：报告写得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有一条意见，就是凡是提到作家的地方，前边应当加上“革命”二字，作家应当成为革命作家嘛。王震也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周扬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凡是精彩的地方，我都用红笔画上了。周扬让我看看王震画红线的地方，一段一段，几乎画上了三分之二。陈荒煤听到邓颖超的意见后很高兴。他告诉我，可能还得用原来起草的报告，你可以在文字上再做些推敲。邓颖超、王震的意见果然起了作用，王任重又在中宣部召开紧急会议，那时距离开会的时间只有两天了。此次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除了王任重之外，周扬、朱穆之、贺敬之、林默涵和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都参加了。王任重显然受到邓颖超意见的影响而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他说：现在形成两个报告初稿，今天都读给大家听听，大家做决定。林默涵立即表示，后来起草的报告

不行，又乱又浅又臭，还是读读原来起草的报告吧。于是，我就当着大家读了一遍报告。读完后王任重首先发言，说这个报告稿这几天修改得不错嘛（其实我并没有修改），再加上一段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就可以了。可是我很固执，当场表示，要加还是由你们自己加，我的工作就算结束了。我的话惹得几位副部长都不高兴。有位副部长站起来，说加不加一段反对自由化的文字是要不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他还拿了胡耀邦即将在同一会上发表的报告稿，特别念了其中反对自由化的一段，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我很尊重胡耀邦，但觉得当时的作家主要问题应是从教条的重压中站立起来，以便用更自由的心灵去创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崩溃了的中国文学，而不是在他们刚刚呻吟几声就忙于用“反对自由化”的口号堵住他们的咽喉。因此，我又和他们论辩起来。散会后，周扬让我和他一起回到他的家里。当时，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大姐正好在家，她对着满怀心事的周扬说了几句我一直难忘的话，如果要你再去反对自由化，再去批判别人，你就不要做这个报告，我们的教训够深的了。当时她很激愤，从沙发上站起来，锋芒直逼周扬。我被苏灵扬大姐的一番坦率的肺腑之言所鼓舞，暗自高兴。而周扬始终认真听着，待苏灵扬大姐平静下来后他才和我一起到会客室隔壁的小办公室里，他让我把谈论文艺界现状的那一段话找出来让他再看看。我把稿子摊开，他就在桌边坐下，一行一行地看下来，最后，他提起笔加了一句话：“我们现在应当特别警惕‘左’的倾向。”写完之后对我说：他们说要加上一段话，我看还是加上这一句。我看了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立即郑重地对他说：“周扬同志，你的想法是对的。”他接着很严肃地说：我改过的这份稿子以后就由你个人保存，你可以做证。他讲这几句话时，声音微微颤动着。我一直不会忘记这一天，一直不会忘记他的委托，一直把他的修改稿郑重地保留着。我不能辜负他的委托，我必须让世界了解他晚年悲哀而清醒的灵魂。

周扬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执行者，确实整过人，打击过敢于直言的作家。但是，当他自己也经历过不幸，经历过贴着革命标签的文字狱之后，又确实有所彻悟，确实有负疚之心。他从历史的伤痛与自己的伤痛中学习到一点：不能再“左”倾了。他曾参与“左”倾的革命列车碾碎了许多作家的心灵，而最后自己的心灵又被这列列车所碾碎，无论是坐在车上还是被碾碎在车轮下，他显然都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他晚年不断落泪，不断伤感，不断对着继续“左”倾的喧哗发出叹息，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感到他真诚地认识到自己参与创造了一个错误的时代，一个需要记取教训、需要忏悔、需要感到心灵不安的时代。当那些以整治他人为职业的文化革命家们高喊“永不忏悔”的口号而理直气壮的时候，晚年的周扬却从来没有理直气壮过，他只是伤感、迷惘与反省，尽可能发出一点与过去不同的声音，最后他还希望一个年轻的后人为他晚年灵魂的变迁做证。他意识到这种变迁的重要，意识到历史将肯定他的某种觉醒，尽管在这种觉醒中仍然充满摇摆、矛盾和痛苦。

我和周扬的文字之缘和思想之缘，毕竟是我人生旅程中值得记忆的一页。所以值得记取，这不在于我曾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史上的一个领袖人物的名字紧紧相连，而在于我从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看到一种历史沧桑的痛苦与严峻，一种人性的挣扎与复活，一种难以死亡的良知责任感。一种负载着时代错误与灵魂困境的眼泪与伤感。这一切，倒使我感到温热与希望，而不会像那些践踏过无数优秀的身躯而高喊永不忏悔的人们只给我寒冷与绝望。■

（作者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　机：13611159388

电　话：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支付宝汇款账号：13611159388

本色韦君宜

〇 李 昕

一

我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时，韦君宜不过六十五岁左右，并不怎样显老，可是她有一个官称韦老太，有些人更直接地称她老太太。我也随着大家这样叫。当然，若是在当面，那是不能造次的，还是得规规矩矩地称呼她“君宜同志”。

那时我对韦老太的经历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曾是富家女，早年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一二·九运动中是清华大学的活跃分子，后来入了党，到了延安。解放后，一直是新闻界和文艺界一些单位的领导人，自己也写作，成了知名作家。我读过她的小说《洗礼》，知道她的艺术造诣很高。我希望能够有机会和她熟悉起来，以便接受她的指导。

她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位干练、爽快、做事雷厉风行的女强人。她永远梳着齐耳短发，戴一副白边眼镜，身穿蓝色或灰色的干部制服。她从不刻意打扮自己。当然，如果遇到重要场合，她也会穿一身旗袍，显示出知识女性特有的品位。她后来写的回忆中，谈到曾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因为着装马虎而受到妇联领导人康克清的批评。她其实是一个专注于工作的人，不拘小节。女儿杨团说，她是工作狂。

我记忆中自己几次到韦老太屋里汇报工作，她都是边看稿子边和我们谈事情。她手里永远有看不完的稿子，而且她居然可以一心二用。一九八三年年底，文化部出版局组织了一次青年工作会议，人民文学出版社把我派去。我开了三天会回来，要向党委汇报。那天是韦老太主持党委会。我做了认真准备，讲了半个多小时，其他党委委员都在听，只有韦老太手里捧着一部长篇小说稿件，在一页一页地看，头也不抬一下。我以为她根本没把我的汇报当回事。然而她最后做会议总结，却讲得头头是道，把我传达的几点上级精神都概括进去了。我觉得这老太太真是有点神奇。

但她对我来说没有亲切感。我曾经两次和同事一起到过她的家里。就在她家的饭桌前，大家把事情一说，韦老太当场拍板定案，然后会议结束，大家起身告辞。一切都像在办公室一样，韦老太连一杯水都没有给我们倒过。她的这种“不拘礼”让我有些不适应，同去的编辑室负责人毛承志是她多年的老部下，他告诉我老太太历来如此。

她的“冷”使我无法接近她。其实，我虽然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但我的家庭还算是和这个出版社有一点渊源。我父亲在清华大学教外语，五十年代就曾经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过两本俄国文艺理论作品。出版社外文部的蒋路、徐磊然、孙绳武等老编辑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对我都很亲切。而韦老太，我父亲和她还另有一层关系，他们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我进了出版社后，父亲常常提起这事，想让我告诉韦老太。但是，我看到韦老太永远公事公办的样子，几次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口。

二

我到出版社后听到的第一堂编辑课是韦老太亲自讲授的。她开宗明义地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她说，这不是她个人的观点。当年在延安编刊物，她是小编辑，胡乔木是总编辑。胡对她说，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老太说，今天她把这句话说给我们听，如果谁不认同这句话，现在就可以调走。她说自己

如果早早选择当官，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官可以当得大些，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是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韦君宜文集》封面

她这堂课，对我是有醍醐灌顶的意义的。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但是每到关口，都想起这句话，便排除杂念，“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样坚持下来，也颇有收获，自觉并未虚度此生。

韦老太讲座中还有一些观点，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比如她说当编辑不能怕得罪人，不但要不怕得罪小作者，而且要不怕得罪名家。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对名家也要一视同仁，该改的稿子，就得要求作家改。如果作家不接受意见，把稿子交给别家出版，韦老太说，这也没有什么，“不是我们的损失，而是作家自己的损失”。讲话中透出一种自信，令人叹服。我当时就觉得，当编辑当到这份儿上，真牛。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小说组流行一句话，“好稿子是折腾出来的”。韦老太就是一位帮助作者折腾书稿的高手。她看稿极快，可以用“神速”两个字形容。我观察过她看稿的场景。那时很少有打印稿，一般小说作者都是手写，用四百字一页的标准稿纸，一部小说总是厚厚的一大摞。韦老太一页一页地翻看，频率极高，大概平均每页十几秒钟，一部长篇两三个小时搞定。看完就和作者谈意见，通常会谈得非常具体，比如哪个人物的心理活动写得不充分，或者哪一段情节不符合人物性格逻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增加情景描写，什么地方缺少细节之类。因为她本人也有创作经验，能够设身处地地进入作者的构思，所以她的意见，作者听了一般都会心服口服。

由于常年身体力行亲自审稿提意见，韦老太指导和扶植青年作者的故事实在太多，但她作为总编辑，最令人称赏的不在这方面，而在于她有胆识、肯担当。当然，韦老太在编辑课上并没有讲这些，可能是她碍于出版社领导的身份，有些话不合时宜，甚或引起误解。但是她的做法，却显示出她的超乎一般人的魄力和勇气，这一条是整个文艺界都为之钦佩的。

经历过改革开放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小说充当了急先锋。自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创了“伤痕文学”以后，大批文学创作冲破思想禁区，通过揭示现实的阴暗面，给社会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对于这样的作品，是出还是不出？

韦老太是敢作敢为的。她拿到莫应丰的《将军吟》书稿，那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是一部较为完整地描写军内文革的历史悲剧，它的思想倾向当然是彻底否定文革。作者在文革结束前隐身于湖南，冒死写出了这本书。在那样的时代，作品描写这样的内容，上面没有指示，一般人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但韦老太毅然自己拍板出版。出版后大获好评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评奖时又遇到麻烦，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有些打棍子的观点足以置人于死地。韦老太这时用上了她“通天”的一招。她找了胡乔木，取得了尚方宝剑，使评奖中的争论得以平息，作品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青年女作家竹林写了一个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题为《生活之路》，因为创作在中央给知青运动定调之前，且作品涉及知青生活的种种真实情况，写了几个知青在农村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写到一个女知青被逼自杀。这种故事在“政治上”不符合当时的口径，几家出版社都退了稿。书稿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作者单位盖着公章的函件也紧跟着到达。那函件证明作者有“政治品质问题”，要求出版社不要接受她的书稿。当时，在出版社内部也有激烈争论，有的编辑甚至认为，这是“一株大毒草”，“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韦老太是主张写真实的。但是她也担心压不住不同意见。于是她让责任编辑写了一个故事梗概，她亲自拿去给茅盾先生看。茅公看了梗

概，说了一句“希望看到作品早日问世”，于是韦老太将这部作品推出，使之成为知青发自内心的“第一声呐喊”。

更有戏剧性的例子，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出版。这是一本反映工业领域改革中的困难和矛盾的长篇小说。作者直面现实，揭示改革以“沉重的翅膀”起飞之不易。韦老太觉得这样的作品，无疑对于推动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坚决支持出版。然而出版以后，上级主管部门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韦老太又仔细看了一遍书稿，她觉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有些内容的确可以修改，但是绝不需要全部化作纸浆。她亲自写了四页纸的修改意见，供张洁参考。张洁据此修改了一稿。重印出版时，韦老太又一次“勇闯中南海”，去请求胡乔木支持。获得首肯后，这本书再次出版，而且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八十年代初期，我不断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谈论她的这些故事。我觉得做编辑就得这样做，才过瘾，才精彩。

三

但是，说韦老太有胆有识，只是一个方面。以我的亲身接触，我发现她也有谨小慎微的时候。每到这时，便对她有颇多的不满。

我当编辑以后接手的第一套书稿，是《胡风评论集》。这是胡风集团案平反之后出版社制订的重点出版计划。这套书收录了胡风在解放前出版过的九本论文集子。正文含三册，全部是旧书重印。唯一的新内容，便是胡风为评论集重印而写的后记。这篇后记初稿大约一万多字，胡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方才写成，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投身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历程的一个总结。

胡风本人对这篇后记极为重视，也下了功夫。但是交稿以后，我们发现，其中涉及的一些史料，其准确性可能有疑问。胡风在监狱被关押多年，曾经有一个时期精神失常，现在虽然看起来正常，但是他的回忆是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我们没有把握。例如后记中他回忆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有一天地下党员王任叔（巴人）用汽车接他出去开会，他拉开车门刚上车，王任叔就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共党员了。”这样的史料，我们第一次见到，以前只知道胡风曾参加日本共产党，却没有听说他参加过中共，连胡风本人过去也从未说过。而现在，王任叔早已不在人世。除此之外，胡风的回忆，也不可避免地涉及鲁迅和他本人、冯雪峰、茅盾以及和“四条汉子”的关系，后记里面披露的一些材料和细节，我们也无从查考。对此，我们只能请示。

在韦老太主持下，社领导进行了研究。有些领导表示可以和胡风商量修改，但是韦老太的态度比较坚决，她的意思是整篇拿下，索性删除这篇后记。对此我和理论组的几位同事都以为不妥，因为这毕竟是胡风复出以后的第一次发声，对文坛意义重大，可以看作是在理论上给胡风恢复名誉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没有这篇后记，那么《胡风评论集》就成了纯粹的旧作整理，没什么意思了。于是我们曾一再请求韦老太重新考虑这件事。然而韦老太以不容争辩的口气拒绝了。以我们当时的推想，这并不奇怪，韦老太本来就和周扬的关系好嘛。

后来是牛汉出面解围。牛汉当时在社里主编《新文学史料》，也算领导成员之一，他曾经是胡风分子，被关过监狱，与胡风有私交。他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劝说胡风删改后记稿，韦老太听了未置可否。也亏得是牛汉，别人真的干不了这事。因为那时胡风的精神受损伤，反应较为迟钝，听力又有障碍，我们去他家，他只是出来见见，点点头而已，一共说不了几句话。我至今记得我和美编郭振华拿着几幅设计好的封面征求他的意见，他说“都好，都好”，就不再说话了；我们又拿了一些古元的木刻作品请他选择几幅作为书中的插图，他看到其中一幅刻的是一个人站在河边高举双手，迎接远方晨曦中喷薄欲出的太阳。他说了一句，“太阳的不要”，意思是其他由我们定。我们和他只能做这样简单的交流，若是商量文章的修改，怕是力不从心。

牛汉很顺利地说服了胡风，把凡是不能证实的史料都删去了。最后这篇后记还剩七千多字，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满心欢喜，准备发稿。可是这时韦老太说，还是不能采用这篇后记。

这件事让我们觉得不可理解。牛汉也不甘心，他对韦老太说，后记究竟能不能发，你也不要做决定，咱们请示上级。结果韦老太果真去请示

了中宣部。贺敬之那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他曾经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发表诗歌，广义上属于“七月诗派”。贺敬之表态：后记可以收入《评论集》，这样韦老太才不再坚持己见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周扬文集》的出版。这套书，是韦老太亲自登门找周扬约来的。但是，在是否收入周扬的一篇著名论文上，韦老太和我所在的出版社理论组的几位编辑发生了分歧。这篇文章就是一九五七年周扬代表作家协会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可以说，文艺界的“大鸣大放”因这篇杀气腾腾、蛮不讲理的文章而定调，它是大批作家被划为右派、受到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理论依据。今天的一些人之所以称周扬为“文化沙皇”，首先是基于这篇文章，它的“臭名昭著”，差不多是文艺界尽人皆知的。我们当时都觉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这篇文章必须收入文集。但是韦老太说，周扬本人不同意，需要尊重作者的意见。责任编辑毛承志和罗君策当时很激动，说这篇文章也算是周扬的代表作之一，不收入，那就成了文过饰非，编出的书就不能叫《周扬文集》。韦老太并不和我们理论，她说文章不收，那就是定案。

韦老太是个急性子，她很想尽快出版这套书，三天两头来催发稿，可是《大辩论》这一篇文章不收，我们的编辑工作一直在拖。韦老太最后急了，她又去找作协领导张光年寻求支持。张光年说，《大辩论》这一篇还是不收的好，因为文艺界在粉碎“四人帮”后刚刚团结起来，这篇文章会给人刺激，再次挑起矛盾。韦老太于是又用张光年的意见压了我们一次。

当时在我们看来，韦老太是因为怕周扬、怕作协领导人而不肯坚持原则。她也并不对我们解释什么，只是让我们照她说的去做。她的干脆利落、永不拖泥带水的性格，使我们不能更多地了解她的想法乃至她的苦衷。

在当时文艺界的思想斗争方面，我们也觉得，韦老太常常是和胡乔木保持一致的。胡是她三十年代以来的老领导，与她关系密切。胡乔木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解放，对于文化界“拨乱反正”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不久之后，又开始在理论上批这批那，压制不同意见。对胡的一些说法，我们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四年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出版社里传达上级精神，都由韦老太主持。她要求我们以胡乔木的观点统一思想。老实说，我有些想不通。

我觉得韦老太怕犯错误，这也情有可原。但是，她有时也太谨慎了。我们理论组编了一个刊物名为《新文学论丛》，过去曾发表过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赵祖武的文章《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和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文学创作加以比较，得出一个结论，后三十年的文学成就不及前三十年高。这篇文章触动了一些人的敏感神经，挨了个别上级领导的批评。从此韦老太就对理论组的书刊盯得特别紧。

韦老太退休之后，她的继任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陈早春曾经撰文，说“韦君宜是一个谜”。当然，陈早春指的主要是韦老太的性格令人费解。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

我真正了解韦老太，是在她写了长篇小说《露莎的路》之后。

那是一九九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评选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的“人民文学”奖。我当时是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进入了评委。在评选之前，我注意到韦老太的新作《露莎的路》进入初选。于是急忙找来一阅。原本只想浏览一下，没想到被作品深深吸引。我发现这部不到十万字的小长篇，竟然触碰了一个从未有人涉及的题材：延安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作品描写的背叛家庭追求革命的女青年露莎当然是小说人物，但她身上分明有韦老太自己的影子，她的心路历程，以及作品反映延安时期的情景，都异常真实。有些情节，在党史上有依据，可考可查。

当时我还并不知道，这本书是韦老太在病中用颤抖的左手写出的。我只是读了作品披露的史实，特别是看到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在革命队伍中到处抓“特务”，一直抓到不足十岁的小孩时，感到心灵被强烈震撼，我们的时代太需要这种说真话的文学了。我佩服的不只是韦老太的勇气，更加欣赏她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启示。

那次评奖，竞争蛮激烈，入选作品包括《白鹿

病中的韦君宜

原》《古船》《活动变人形》《南渡记》等一大批名篇佳作。而《露莎的路》初版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最后这部作品落选，我觉得非常遗憾。但是我对韦老太的印象，却从此改变了。

当然，让我感受到更深层触动的，是韦老太的《思痛录》。人们说这本回忆性随笔集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我有同感。韦老太在前言里说，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正是因此，她才“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所牺牲和所得所失的一切”。她说自己曾经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为此她面对良知而忏悔，笔下的故事，有些感人至深，而有些则使人恍然大悟。

由于亲身经历过上面提到的几件往事，所以我特别留意她在《思痛录》里怎样写胡风、周扬和胡乔木。

她写了一篇《我曾经相信反胡风运动》，讲自己被蒙蔽的完整过程。她在这篇文章中说，她是直到1989年看了有关胡风集团的一些材料，特别是看了绿原的自述，才真相大白，知道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冤案”，而在此之前，她一直被蒙在鼓里。根据这一解释，我想，在当年处理《胡风评论集》的后记的做法上，我们真不能苛责老太太。

对于周扬，《思痛录》不止一篇文章涉及。谈到为什么不把《大辩论》一文收入《周扬文集》，韦老太讲出了内幕的故事。原来周扬并不承认这篇文章是他自己的手笔，因为整篇文章，是经过最高领导人修改定稿的。有些段落重写，有些段落新增，大删大改之后，文章代表的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周扬说：“我对这篇文章负不了责任。”所以，当韦老太和他商量如何处理这篇文章时，他原先曾考虑给此文加一个长长的说明，作为文章的附记，那无非是要标出哪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意见，哪些观点是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可是细想之后，他没敢这样做，因为他担心这样做或许会制造爆炸新闻，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大辩论》一文不收录固然是遗漏了重要史料，但是收录则是对作者不公正。韦老太体谅的是周扬的苦衷，作为维护作者利益的出版者，她没有错。可是，如果她当初把这些实情讲给我们听，我们大概也不会错怪她。

关于胡乔木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批判周扬一事，我一直以为韦老太紧跟胡乔木，因为他们两人半个世纪以来的交情太深了。其实即使是在出版社大会上动员我们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时候，她自己心里也是有一杆秤的。只是作为社领导，她也有一些不得已，也有一些身不由己。这一点我是自己做了总编辑之后才有了深刻体会的。《思痛录》里记载，周扬挨批时，韦老太前去看望，周扬问她，如何看待当前自己和胡乔木在理论上的争论，韦老太以“不懂哲学”四个字搪塞。这个回答使周扬伤感，他后来对人说，韦君宜别的都好，就是“是非不分”。韦老太听到周扬这样评价她，受了刺激，她反思和忏悔当时的怯懦，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原来她从一开始就是支持周扬观点的！这些，如果她不写下来，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

读了《思痛录》，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认识韦老太。我原先要猜的谜，在这里全部破解。我了解了韦老太质朴的内心，感受到她炽热的情感，更看到了她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以及她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思考。她的“思痛”和忏悔，显示出一种良知未泯的真诚。

我知道，这才是她的本色。■

（作者为三联出版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十三大报告酝酿中的二三事

○　郝怀明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后，我们紧接着就投身到胡耀邦主持的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中去了。地址还是在南长街81号中央警卫局大楼5楼。起草组成员除了原先的林涧青、龚育之、郑必坚、王愈明和我之外，又新增加了于光远（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吴象（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林子力（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理论组组长）、贾春峰（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吴稼祥（中办办公室干部）、罗建平（中办办公室干部）、陈久松（中办印刷厂厂长）。下面就来谈谈我知道的胡耀邦主持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情况。

胡耀邦：要起草一个好报告

1986年10月3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谈十三大报告的起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薄一波、万里、姚依林、温家宝、钱李仁（人民日报社社长）、袁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及起草组的同志。

胡耀邦说：精神文明决议，英国、日本、中国香港方面普遍反映很好。决议实际上澄清了几年来意识形态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精神文明决议搞了9个半月，几乎破产。经验有两条：一是不动摇，坚决搞；二是走群众路线。外部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对内部讲时该摊牌就摊牌。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现象，有理走遍天下。不好的经验是，开头一段时间通气不够，走群众路线不够，总想搞得好好的再拿出来。主席讲过不要老是浓妆艳抹才出来。要吸取这个教训，早通点气。

胡耀邦说：难度很大。有些问题还看不很清楚，包括理论和实践。有些目标和政策已经有了，不要重复。报告的题目就叫《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经过了近20年，现在搞了9年，为什么社会主义只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30多年的经验总结，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一，还是讲讲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写透。毛主席在延安要求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建设社会主义的答案，从中央文件上寻找规范行动的东西，有，我就办，没有，我就不办。这次就发生“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为什么不提的问题。这都可归纳为经验式、教条式的思想方法。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心领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而是这个政策有根据没有，从马克思主义中找规定性，这都是教条式的思想方法。如不从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解决，以后争论还会没完没了。这次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第二，可以讲讲马、恩的某些猜想，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0年后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弄不清楚。物质极大丰富要有，这也是个猜想嘛。改革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要不断自我完善。

胡耀邦设想在5个问题上阐发一下，一是认识论，二是改革，三是外交，四是党内生活，五是终身制。他强调，民主、法制、文明，首先是把党的生活搞好。党组织的每个细胞都要有造血功能，这个问题要讲透。围绕废除终身制，确立新老交替制度，要讲点有声有色的话。党的十二大报告鼓动性强，这次报告在理论上、思想上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既是论纲性的，又有大量的实践经验做依据，要把问题说透。

万里说：文化、政治民主化进入了新时期。现在整个是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估计不足。自觉的、民主的、平等的现代人，农民成了商品生产者，自主了，马上就聪明了。首先是发达地区民主意识发展了，没有民主就没有富裕、文明。现

在到了这个时候了。都尊重民主,尊重自我,尊重公共利益,不就社会主义了?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的劣根性。假大空也是封建主义遗毒。“至圣先师”,总要找出哪个人当皇帝、哪本书做圣经,缺乏的是民主、独立思考、维护公共权利。我们的文化、制度对勤奋是制约,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开创了历史,真正实现了现代的大转折。十三大报告要在十二届六中全会基础上加以发展,唱本连台戏。富裕不等于文明。社会主义不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算什么社会主义!要向国家民主化迈进,向高度民主、文明迈进。六中全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重要的东西,敢于打破框框。

会上,薄一波、姚依林、温家宝、于光远等也发表了意见。

10月10日,胡耀邦主持召开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第二次会议。

袁木首先发言,表示赞成十三大报告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建议以《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题。

胡耀邦说,我们事业的发展需要社会科学提供更多的成果,当前中心环节是要进一步端正并推动好的学风。为此必须明确几个问题:一、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二、纠正轻视实际,不接触实际、国情、现实的状况,躲着走,不重视材料,不是周密地占有材料。三、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要有个正确的政策。随便搞大批判开路、批斗,历来不成功。文革不用说了,在延安,延安以前,这么搞也不成功。批判周扬、王若水恐怕是最后一战。当时要发文件,说他们是有纲领、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网,想搞个比胡风集团还大的反党集团,我把它压住了。我说,不能给周扬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说他是“自由化的灵魂”,是自由化在党内的代表,巴金是党外的代表。几十年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不搞斗争就没有思想政治工作了。不采取讨论的方法,还要动乱。

胡耀邦表示赞成《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个题目。他强调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阐发一下,很多政策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胡耀邦决定起草组11月调研一个月,12月动手,明年1、2月拿出稿子,宁早勿迟,投石问路。

会上,郑必坚转达了赵紫阳、万里、姚依林、方毅、薄一波、胡启立、余秋里的意见。钱李仁、于光远发了言。

10月17日,郑必坚传达了胡耀邦对十三大报告的新设想:一、5年来的工作。取得什么成绩,轰轰烈烈,各方面有很大进展。全面改革,布局展开。初步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二、往前走出一条路。1. 经济、改革、建设提得更高;2. 政治;3. 精神文明;4. 外交;5. 国防;6. 统一,对港台要讲些新话。三、党的领导。1. 同群众的联系。健全制度,确保成为核心。终身制与党内正常生活。2. 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起草组在京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建议和意见

遵照胡耀邦的意见,起草组从10月22日起至10月26日在京陆续召开了理论、经济、文化、党建、部分省市领导同志5次座谈会,认真听取各方面领导、专家、学者的意见。

在理论方面的座谈会上,吴江(政治理论家)说:社会主义各国碰到的问题,都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处理不好。我认为我国是共产主义的预备阶段,是个预科,时间相当长。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于光远说: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从来都是最重要的问题。挑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时候了,要把初级阶段的特征搞清楚。各种经济成分,贫富差别,这是初级阶段的特征。有点剥削没有什么了不起,忍受一点剥削,换取社会更大进步,不要再搞什么“一大二公”。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说:社会主义在世界处于危机当中。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要回答社会主义优越性为什么在这么多国家都不能发挥,是不是制度上、理论上都有些问题?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再认识、再思考。于光远说:我们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各种干扰很多,各式各样的原因造成的不痛快。胡绩伟说:机关的积极

性为什么发挥不出来？就是心有余悸。整人，一研究问题就说是资本主义。为什么很多话不能讲？书不让出？怕得很。自认为最革命的人是最害怕的人，神经衰弱。说新闻自由就是想登什么就登什么，谁会这样做呢？还有法律嘛！对高度民主做点研究，像精神文明决议一样，很有必要。赵复三（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改革中党的地位作用、当代世界的特征等。刘国光（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说：现在经济问题上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束缚，实际上比过去批判的修正主义走得更远。商品经济、多种经济成分，都突破了传统的理解，是对初级阶段认识的深化。要澄清：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也要防止中外人士献策引向资本主义。黎澍（历史学家）说：理论讨论要开放。过去只有一个声音，不许讨论，对刺眼的地方抓住不放。希望宽松能够贯彻下去，不要半途收回去。我多年讲政治问题可以讨论。与会的李锐、蒋光化、范荣康、李慎之等也发了言。

在经济方面的座谈会上，杜润生（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说：希望中央肯定农业改革。一是承认农民的个人财产，二是承认包括工业在内的多种经营，三是农村不仅应有产品市场，而且要有要素市场。这三件事都与传统做法不同，要求十三大明确加以肯定。袁宝华（国家经委副主任）说：改革，农业好点，城市刚开头，走一步退一步或退半步。一、工业方面要提高效率，这是个大问题。归根到底是职工素质，除了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分配问题，还要进行技术改造。二、增强企业活力的问题远没有解决。“责任大、权力小、婆婆多、负担重”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三、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使总供给超过总需求。蒋一苇（经济学家、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说：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关系，不能“放开猴子，捆住老虎”。二是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越现代化，越要求劳动者的主动性，现在停留在用定额管住工人，还没形成体系来发挥工人的主人翁积极性。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经济民主，要建立劳动者民主制，进而搞行业民主制，再进而搞经济联合会。林乎加（农牧渔业部顾问）说：大家认为改得好，但又认为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发展有它的共性，也有特性，但共性多。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都应继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拿过来，给改革以理论武装，解放思想。

会上，房维中、杨波、刘毅、高尚全、陈俊生、赵东宛等还就企业的智力开发、科技进步、经营管理、厂长负责制、政府机构改革、计划与市场、宏观与微观、改革与发展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胡耀邦：提纲内容庞杂、老话太多，报告总体结构应分3个部分

11月11日，胡耀邦在勤政殿召开会议，讨论起草组提出的十三大报告提纲。出席会议的有胡启立、温家宝以及起草组同志。胡耀邦对这个提纲不满意，觉得不够理想。主要问题，一是庞杂，效果不好；二是老话太多，读起来没有新鲜感；三是按这框架写出来可能太沉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事情还没到这一步，许多问题看不清楚，写过多的纲领性、规定性的东西不行，搞得不好，就变成了主观随意性。所以，内容不能太庞杂，语言不能太陈旧，从头至尾不能太沉闷。

接着他讲了邓小平与日本首相中曾根的谈话要点。邓小平谈到政治改革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保证党和国家的活力，同领导层年轻化和素质好坏有密切关系。邓小平强调领导干部年轻化，十三大要进一步，十四大、十五大要更进一步，要选拔一批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效率。邓小平强调说，党领导一切，不要包办一切。搞成一部机器，一个合唱队，各干各的不行。苏联模式不能搞，但也不能落到西方模式，这两个模式都不能搞，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的积极性，权力下放。

胡耀邦在谈到对十三大报告的设想时说，十三大报告不要分6个部分，分得过多，显得庞杂，起承转合也有困难。分3个部分比较合适。第一部分，讲从十二大到十三大这5年，或者说从三中全会以来这9年的成绩，从事实出发，夹叙夹议，从拨乱反正到开创新局面，讲出变化，指出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指明，即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已经指明。

我们原来都以为前10年翻不了一番，事情的进程超出了我们的预料，1987年就翻了一番。除了经济，还可以讲讲政治上的安定，讲讲整党，讲讲外交。这次整党没有留下后遗症。从废除终身制，少宣传个人，提拔年轻干部，党的机体更新，没有引起动乱，不可低估。总之，要站在高处，用清新的语言，进行高度概括，写出党和国家现在的情景，把变化的本质反映出来，让大家信服。这一部分要回答得生动、深刻。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时期，但话不要这么说，可以说是三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他说，这几年的艰难，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自我当总书记后，除了出国、下乡，没离开过办公室。1982年我在军委会议上讲，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急也急不得，慢也慢不得，“左”也“左”不得，右也右不得，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步履维艰啊！对“左”的东西也不能斗，否则就乱套了。有些年轻人说我太软弱了，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批评周扬批评错了，能反过来批评批评周扬的人批错了吗？不行。第二部分，写我们今后几年怎么走，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做5年打算，有的要有长期考虑，从几十年考虑。考虑不清就不要说那么死。华国锋抓纲治国8条，我还有点欣赏，那8条归纳得可以，给人一个好的概念，水平不低，语言表达还是蛮生动的，要言不烦。缺点是没有平反冤假错案。

要讲讲我们所处的情况，搞好这5年有什么意义，围绕着什么目标走，抓几件什么事，为完成这些事，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国际环境与和平外交。这部分要有起伏，又不要写杂。第三部分讲改善党的领导，抓住三四个环节。我们还是要靠党的领导，国家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领导、党的组织。回顾党几十年来同国家民族命运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党能像我们党这样把国家搞得这样好。孙中山伟大，没完成这个事业。我们党牺牲了多少人，不管犯了多少错误，没有党不行。要从历史讲。现在讲党的怪话太多了，我心里很不舒畅，又不能压服，要说服。

胡耀邦在谈到改善党的领导时说，一是党不要代理、包办一切，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二是要坚决废除终身制，实行新老交替，讲一大批老革命家带头退下来的意义。十三大报告里没有反映怎么行？年轻人上来的意义要讲充分，要回答：事业会不会停止，政策会不会夭折？三是讲党内民主生活，党组织要有造血功能，增强免疫力，每个党组织每个细胞都要自我完善，发挥模范作用，克服不正之风。重申什么，做到什么。四是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医治我们的毛病，现成的药方找不到，要充分地讲一篇话。

胡耀邦说，他要尽快找小平同志一次，把十三大报告的主要意思谈谈。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下台。我们起草的这份十三大报告也就没有完成。■

（作者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原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0050480

华源书阁
北京华源书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uaYuanShuGeCultureCommunicationCo., Ltd.

我是华源书阁，我来了，你在哪？
——为了“您”和书的邂逅！

千元出书　赠送交流
回忆自传　家谱族谱
单书套餐　免费发行
丛书套餐　全国代理

A类：丛书号出版优惠套餐最低11500元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赠送最低1000元

服务热线：010—56223866　56223877
公司邮箱：huayuanshuge@163.com
公司网址：(华源出版网）www.hychuban.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汤立路218号明天生活馆A座206室

胡耀邦就职中宣部的三次讲话

○ 李 平

接到任命4天就职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或相当于这个职务）的有23人。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时间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却是中宣部最有凝聚力的一段黄金岁月。时年63岁，仍属年富力强的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枢。

胡耀邦（前左一）、彭真（前左二）、赵紫阳（后左一）在人民大会堂

1978年12月25日，中央又向全党和全国各地发电通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免去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同时决定，胡乔木、姚依林同志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兼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姚依林兼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同日发电通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张平化同志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免去中央宣传部部长、党委书记职务。

1978年12月29日上午，胡耀邦到中宣部报到就职，此时距三中全会闭幕仅一周时间；距他被任命为中宣部部长只有4天，他就来部办理同原部长张平化的工作交接，体现了胡耀邦爽朗、明快的办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中宣部当时办公所在地占用钓鱼台国宾馆17号楼等4栋楼。中宣部在文革初期被作为“阎王殿”（毛泽东语）打烂、解散，原在沙滩的办公处改为文化部使用。粉碎“四人帮”后，临时成立以耿飚为首的中央宣传口，指导中央新闻单位的工作，即在钓鱼台办公。中宣部恢复组建后，仍然延续了下来。那时我是中宣部新闻局最年轻的一个干部。

按照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先内后外、从上而下的惯例，胡耀邦在29日上午到部后首先召开了中宣部13级以上干部会议，并做了详尽的讲话。时隔两天，即1978年12月31日上午，胡耀邦参加了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宣部和中宣部联系单位负责人大会，就宣传思想战线的工作发表了讲话。1979年1月3日上午，在中宣部全体干部会上胡耀邦又做了简短的讲话。3次讲话，开宗明义地宣布了他即将在党的宣传、思想领域里开展工作的施政纲领。综合起来，胡耀邦这3次讲话可以归纳为7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人事变动

胡耀邦首先介绍了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人事变动的有关情况，说自己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在中央正副秘书长的分工中，胡乔木主要把理论关，负责中央重要的理论性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起草和整理。姚依林侧重于政策性文件的制定，及中央办

公厅的日常工作。他自己负责各方联系,但工作重点还在宣传部,会用主要精力管宣传工作。

胡耀邦介绍了中央有关宣传部部长人选的考虑。他说,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做了一批人事变动,其中就包括宣传部部长的变动。适合做宣传部部长的,可以选许多人,还有比我更适合的,如胡乔木、习仲勋、任仲夷等同志。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想请乔木同志当中宣部部长的呼声最高。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对此也有考虑。就我党目前马列主义水平而言,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宣传、理论工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懂得最多的一个人,也是文字能力最强的一个人。因此中央舍不得他,还有更重要的文件需要他来把关,只能取其所长呀。而宣传部部长的工作,还有很多行政事务和指挥工作,这又不一定是乔木同志的所长。中央考虑的结果,要取其长,避其短。其他的同志,中央考虑还是留在省上。我已在政治局的会上表明过,我搞宣传不是料,只好拉着毛驴当马骑。但在我来想,当宣传部部长可能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恐怕也不行,所以必须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要当宣传部部长又不在行的人,尤其要重视这一条,就是靠大家一块儿干。

胡耀邦在讲话中,还介绍了中央工作会议对几位犯错误同志进行批评的情况,从中可以感觉到他对人的处理方面的新思路,正在摒弃长期存在并被林彪、“四人帮”推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人划线、无限上纲的做法。他说,这次工作会议,批评了十几个同志,占到会者的5%。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看有一两位的问题是严重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坚决拨乱反正的问题上,没有和党站在一起,对十一大的路线执行得不那么坚决。但是,批评可以不讲情面,却不能轻易处理,轻易处理是要犯错误的。我们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随便处理一个人,就会影响安定团结。总之,今后不要轻易地、随便地把人抓起来。调下去,调开去,调回去,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戴帽、开除、法办,这三件事,不能再随便来。

这些话让人们感受到了在干部使用上与文革截然不同的新气象。

要突破“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等禁区

胡耀邦强调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应该着重学习和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新时期思想宣传工作的根本方针,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和四化建设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把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这就首先要砸烂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破除这些禁区。现在还有些禁区没有破,比如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问题。党的十一大报告上还说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始终存在,就可以把它从理论上破除。当然公开怎么说,还可以考虑、研究。总之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凡违反客观规律的一切禁区都要破除。思想宣传工作,一是破禁区,二是搞四化宣传。从理论到实践,不用四化的规律和科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技、现代国防这“四化”就搞不上去。

理论上还有哪些禁区、枷锁要破?“四人帮”所设置并强加在党和人民头上的禁区、枷锁,请社科院、中央党校开出一批清单,然后走群众路线,一个一个地破。去年破了一批,今年破了一批,明年再破一批,有多少破多少。经过调查、研究、精心讨论以后去破。我们今后不搞这一套,不能当官就画圈。积十几年的经验,画圈是有教训的,容易上当。凡违反客观实际、违反科学规律的禁区,要继续破。

继续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

胡耀邦说,粉碎“四人帮”这么一场大革命,没有思想发动和思想领先,许多事情扭不过来,拨乱反正也拨不好、反不好。就全党来讲,这两年在思想、宣传、理论工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党中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搞清了一系列被林彪、“四人帮”颠倒、歪曲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是非。10多年以来,甚至更长一点,近20年来,有没有像这两年这么活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理

论、思想、政策水平何曾提高得这么快，我看少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两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首先是思想上、政策上、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宣传战线上，一个特别可喜的情况，就是涌现了一大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并且很能干的领导干部；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理论、宣传工作的人才，特别是一批40岁左右的年富力强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敢于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敢想、敢说、敢干、敢闯，宣传战线出现了一批闯将。这是宣传战线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我们宣传部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认认真真地把这批优秀的宣传、理论工作者发现、选拔出来，加以培养，加以关心，有的要大胆地选拔到这条战线上来，否则就要犯错误，就是官老爷。

接替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在钓鱼台会见“县报座谈会”与会者
（前排中为王任重，右二为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左二为副部长廖井丹）

改变打棍子作风，发扬民主

我们要特别注意，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意见、创作作品或言论否定、砍掉。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些理论棍子，有好几个是恶棍，总是打倒一切。我们有这么一句话，“革命就是批判”，但有时把这句话理解偏了。实际上批判就是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鲁迅等人，不仅批判了许多人，也推崇了许多人，推崇了不少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看看他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革命导师对别人的评价，从来不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而是全面评价分析，主要抓观点，看总的是好的或不好的。他们对作者不一定熟悉，就是从作品、论文上看，好就推崇，就介绍。我们党内有些恶棍，只抓住一点，就算反党，就是黑话。谢富治这样的人当公安部部长能不搞冤案？康生打了多少干部，打了多少宣传、文艺界的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清算，“百花齐放”怎么能搞得好？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说轻点是形而上学，说重点是文化专制，是特务情报工作。我就曾向社科院的同志介绍，请他们收集一下材料，看我们的导师如何推崇思想家、科学家的事例。多少年来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好像马克思主义到处批判、到处打人，其实不是这样的，它是吸收了前人文化精华的。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

实践标准问题是否继续讨论。我个人的意见，可以继续讨论，但必须有新东西、新道理可讲。这个问题要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我们的工作要受实践检验，凡是错了的必须改正，对了的必须坚持。

要很好地研究如何加强四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这是摆在全党思想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面前的新的大课题。假若还像前几年那样，着重谈政治、路线斗争，是绝对不行的。从明年起，要占很大的比重谈经济建设。现在我们说一切坏事都是林彪、“四人帮”的，两年以后、3年以后，如果工作还搞不上去，人民就有理由质问我们了，矛盾在开始转化了。两三年后，事情再搞不好的主要矛盾，就不能算林彪、“四人帮”的了，要算我们在台上的了。历史就是这么无情。

重提“双百方针”

胡耀邦说，通过座谈周总理1961年6月19日在广州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

话，我们的文艺创作从明年起，要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周总理的讲话，对我们当前的文艺工作非常适合。要经过认真准备，开个文艺务虚会，开半个月或20天，把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推向前进。

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促进派。宣传部门管得很多，但是当婆婆要当开明的婆婆。开明就是当“双百方针”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我们需要百花盛开，需要文艺民主和理论民主。要特别警惕，不能让“四人帮”的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的作风影响我们。

如何加强民主、法制和党的三大作风的宣传？最重要的，是从宣传重要性改成研究怎么走到正确轨道上来，包括党内生活、社会生活和立法等。我们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些好说好写，但实际情况怎么样，有时分不清是真犯法还是假犯法，是你犯法还是我犯法，有许多是非被搞颠倒了，不把党的正常生活恢复怎么行？明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开全会，要制定的一个文件就是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基本准则，然后提交中央委员会颁布。

胡耀邦还讲了宣传工作与实际工作的衔接，他说，要研究出问题来，随时掌握全党动向。许多问题不注意就发现不了。比如农民负担重的问题、强迫命令的问题，如果注意调查研究，就可以早些发现，早些解决。如果在前年冬季或去年春季抓这两个问题，我们就会更主动一些，形势就会更好一些。去年和前年全国都搞揭、批、查，去年就发现不少地方搞得不好。如山西阳泉，只有40万人，而隔离审查的有1700多人，自杀的有好几个。

要破除现代迷信

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是我们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不是普通的、可讲可不讲的问题，是对马列主义根本态度的问题。突出宣传个人，在30年代以前，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是很少很少的。这个现象泛滥起来，是从苏联党开始的。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书，就没有歌颂斯大林的东西，他主要提阶级、提政党。中国党在三四十年代也不多。这个问题在解放后发展了，达到顶峰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导致的。而且突出宣传个人，制造迷信，会使我们党变质。野心家、坏蛋就是制造迷信来搞阴谋。总之，不要多宣传个人，而要宣传党，宣传人民。

胡耀邦讲话本身就是破除迷信的实践。本来大家希望听他讲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新指示精神，但他在一开始就明确宣布，今后要把“首长做重要指示”这一套统统去掉，恢复老传统，就是对党和国家的工作，进行上下之间、同志之间的交流，互相交换意见，营造一种同心同德、融洽和谐、努力工作的氛围。他的这几句开场白，立刻迎来满场的热烈掌声。

公道评价前任张平化

胡耀邦说，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同志，对中宣部确实有很多意见，主要是对张平化同志有意见。意见主要的一点，是这一年多来领导不够有力、不够坚强。这个意见我觉得有道理。张平化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也做了自我批评，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这个重大问题的讨论上，态度不明朗。他自己讲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前天在中宣部，我也谈了我个人对平化同志的看法。平化同志总的来说，当得起8个字，“久经考验，饱经风霜”。他是井冈山底下仅存的一个县委书记。不过饱经风霜往往有两重性，一种是像陈老总的诗所讲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也有另一种，看问题、想问题更犹豫些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张平化同志改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我看是正常的工作调动。我们前天已经口头商定，对中宣部一年来工作的议论，基本上就结束了。现在事情多得很，每个同志的教训可以继续总结，但我们不再对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讨论。

从那时起，胡耀邦开始了他在中宣部有声有色的开拓性工作，中宣部迎来了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段历史。

附录：

张平化的自我批评性的讲话

在1978年12月29日的十三级干部会上，张平化同志做了自我批评性质的离任讲话。他说，中宣部成立了一年，前半年做了些工作，后半年由于我的错误，工作比较被动。我的错误主要是

在理论问题上，具体地说，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这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错了，宣传工作势必被动，这说明我的思想还很不解放。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许多领导干部还没有解放思想，仍然思想僵化，没有开动机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小平同志提出来的4个方面的原因，我回想了一下，全都有，主要是小生产思想影响很大，因循守旧。毛主席曾批评我见事迟，抓得慢，对新情况、新问题抓不住，看来这个老毛病还没有改过来。我这个人比较孤僻，在部内上下通气也少，如果和同志们多来往，多通通气，也可能早些发现问题。

张平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我教育很大，回想历史上有3次比较深刻的教育。第一次是延安整风，过去盲目性大，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并不清楚，但通过整风学习只是批评了别人，自己没有受到批评；第二次是文革，以前虽不说是老虎屁股，也批评不得，到了文革中，男女老少都批评，有善意的，也有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真正受到触动；第三次就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自己的批评较准，有说服力，因此极受教育。这次全会解决了全党一系列大问题，我受到了很大启发，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要解决，如“阎王殿”的问题，过去我就还有顾虑。这次把自己形而上学的东西冲了一下，对一些问题就有了新认识，如对上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理论上的是非和组织原则的一致性，高举旗帜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致性，过去因为自己头脑中的形而上学，就把这些本应一致的东西对立起来了。

张平化说，7月11日邓副主席曾找我谈话，明确说实事求是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当时我问邓副主席，为什么不在中央的会上讲，小平同志说，到适当时间会讲的。我认为这个问题要中央常委解决，但当时中央常委的认识不一致，我也很难办。现在认识到，小平同志对这些问题谈得很透。如果按“两个凡是”办，那历史上的许许多多问题都不可能解决。需要完全扭转乾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

（作者为中宣部原干部）

（责任编辑　丁　东）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400-610-0896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盒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字2012第2460530号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字2013第2461278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字2013第2461279号
注： 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4100217号

设在中国的马共电台

○ 陈益南

1968年7月一天中午13时，对中国有关部门负责收听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革命之声》中文广播的工作人员来说，有三四分钟的广播，会让他们终身难忘。当时，听到《革命之声》的女播音员，用中文平静地播送马来西亚共产党人民军的战报时，突然，听到电台中传来自动武器射击的声音，并且，枪声在逐渐增多、增大，还听到了手榴弹那种特有的爆炸声。不久，枪声逐渐稀疏，而出现了手枪发出近距离射击的响声。很快，又听到一大群人用中国人听不懂的语言在叫喊，紧接着，传来女播音员的喘息声，还很清楚地听见她发出的呼喊：各位听众、同学、亲人、朋友们……亲爱的祖国，永别了！在广播中传来一声爆炸的巨响后，广播便戛然而止，寂静无声了。当时所有收听到这一广播的人，都猜到了，枪声、女播音员悲怆的告别声与爆炸声，及此后广播的戛然而止、寂静无声，意味着什么。

很多年后，人们知道了这个与电台共存亡的女播音员的情况：她姓焦，原是中国山东济南的一个红卫兵，济南某中学的高三学生，一个美丽的姑娘。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支援世界革命为己任的格瓦拉主义，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青年欣然认同与接受。一批中国红卫兵自行跨过边界，自发投入到东南亚的丛林中，参加了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焦同学便是其中一员，她成为马来西亚共产党人民军战士，在设于丛林中的马共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当时，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军特种部队的偷袭，在抵抗无效即将被俘的最后时刻，女播音员拉响了一捆集束高爆反坦克手榴弹。

距女播音员牺牲1年多后的1969年11月15日，寂静了多日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革命之声》的广播，突然，又重新回荡在空中，而且，所播出的声音、功率更大，音质更强。然而，这个声音，却不再是发射于马泰边境的丛林之中，而是来自中国湖南省益阳县境内的四方山代号为

"691"旧址 马共广播电台旧址的大门

"691"的建筑群。电台分别以马、泰、华、英语进行播音，每种语言每天播音1～4小时。

此后，长达12年，《革命之声》的广播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不论马共人民军与政府军的交战如何激烈，或如何艰巨，《革命之声》的广播，都能飘荡于天空。直到1980年6月，这个声音才撤出中国，重新回到泰国边境的丛林。

长沙向西约60公里，便到了益阳县境，在距319国道几公里之处，有一个叫岳家桥的小镇，四方山就在小镇的附近。而隐蔽的"691"建筑群大院，便处于四方山中的一个水库旁，占地面积近200亩。当年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就设在这里。

"691"并不是专为马共《革命之声》所建，而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战备需要，国家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建的一个二线备用台基地。后来，应马来西亚共产党的请求，提供给马共使用，将它改为马共《革命之声》所在地。当时电台的发射机50千瓦，输电线电压11万伏，备用柴油发电机480匹马力，发射塔高94米，是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水平。

马共广播电台到此，起初人数不很多，发展到后期，才增加至百多人。电台总编辑是马共中央委员陈田。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也常住到这里。在"691"大院内，有一排红砖平房，之中就有陈平及马共中央领导人的几间住房，以及办公室、会议室。

"691"内的生活很单调。每天就是在固定的时

间上班、吃饭和休息,娱乐休闲活动并不多。一早起身后,吃了早餐就去电台上班。11时30分是吃午餐的时间。电台工作人员的衣、食、住、行,全由中国方面包办。马共人员只管电台的播出,中国工作人员则负责电台的发射等一切技术上的事务,也负责保障马共人员的日常生活需要。

“691”的大门内,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岗亭,大院内还有两幢部队的营房,一个连的解放军驻守在这里,负责警卫大院与电台的安全。

在“691”大院内,马共人员和中国人员分成两个部分,也分别住在两个区。双方人员不准私自往来,不准互相聊天,必须严格遵守。大院内,另有一道中门,将大院隔开为两个区。中门之内,是马共人员的天地,门外则是中国人的工作与生活区。马共人员与中国人之间很少有往来,双方人员更不能建立私人友谊。

在马共人员的区内,有几幢双层楼房,供他们居住;还有两间文娱室,让他们从事休闲活动。但是,只有两台黑白电视机,大家只能在一起集体看电视。但在区内,马共人员有机会观赏电影,影片会定时送进来放映。此外,马共人员一年有两次出外旅行的机会。基本生活费他们不用操心,吃集体,用集体。他们每个人每个月另领40元人民币的生活津贴,大家都一样,总编辑陈田也不例外。

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有时也住到长沙市南郊的青园宾馆。当时,青园宾馆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理,是专门接待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特殊宾馆,对外不开放。

现在,“691”大院已成为历史,在那儿人们已看不到任何当年电台的痕迹,只剩下一幢幢被林荫遮掩的破旧楼房与疯长的杂草共存。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有关部门也曾想开发利用“691”这幽静的几百亩地,然而,可能是地处深山之中,搞了许多年,都没能挖掘出它的商业价值,办企业不适宜,做宾馆太偏僻。倒是其神秘的往事,经常吸引一些人前来观赏,使“691”大院,成了当地一处特殊的景点。

马来西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二战期间,马共建立人民抗日军,开展抗日游击战,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1945年八九月间,英国重占马来西亚,于1948年6月20日颁布了《特别紧急条例》,其核心是恢复其宗主国的统治。对此,马共决定发起反抗英国人的武装斗争,并于1949年2月1日建立了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军,当时的马共总书记,就是时年26岁的陈平。

马来西亚在1957年获独立后,有着众多华人的共产党被边缘化,因而,武装斗争的矛头又指向了政府。1960年,马共的主力部队共约3000人撤至马泰边境泰方一侧的4个府(省)的丛林中,以求休养生息。这里山多林密,重峦叠嶂,便于隐蔽;又有铁路直通马来西亚、新加坡,有海港可达香港。马共巧妙地迂回于马、泰两国地方军政的矛盾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得以在泰国的领土上生存20多年。

进入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剧变。

1982年的7月,泰国陆军制订出“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攻陷了马共3个团的团部,占领了很多营地及生产基地。使马共武装丧失了经营多年的藏身之所,从而丢失了后勤基地、情报文件站及干部训练中心。

然而,马共最大的变化,是在此战役结束之后。从1979年起,中国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取代了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中国发生的变化,让马共领导人不能不重新思考他们的理想与前途。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与李光耀总理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一来,反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于是,李光耀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1980年,邓小平接见了马共总书记陈平,要

“691”旧址内 马共电台工作人员的办公楼

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从1987年起，一些马共高级领导人，响应当时泰国首相差猜“不要战场要商场”的呼吁，按泰国官方提出的3项政策，首先与泰国政府达成和解。泰国政府的3项政策是：一、凡放弃武装斗争者，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二、和平归来后，不受监视或坐牢，免除判罪，就业自由，保证人身安全。三、其子女可以出国，可以自由上学、就业和结婚，不加限制。

最后走出丛林、放弃武装斗争的是马共中央总书记陈平。1989年12月，在泰国边境城市合艾，以陈平为团长的马共代表团，终于与泰、马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和平协议，决定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回归社会。奋斗了60年的马来西亚共产党予以解散。

泰、马两国政府向原马共人员按每人5英亩的标准，在马共原活动地区，无偿提供土地，作为马共人员赖以生活的生产资料，并建立了若干个“友谊村”“和平村”，供不愿离开的原马共人员居住。现在，这些“友谊村”“和平村”中的一些前马共军人，将他们原来的战斗场所予以开发。加之外商的投资，使当年的游击区，变为了泰马边境的特别旅游地，吸引了不少国内外观光游客，由此给“友谊村”“和平村”的村民——前马共人员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收益。

走出丛林后，一些原住在泰马边境的马共领导人，按和平协议中可以无条件回国的条款，要求回马来西亚，叶落归根——他们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这些人的要求，大体上都被满足了。

然而，居住在泰国曼谷的前马共总书记陈平，在2003年，以一个80岁的老人身份要求回到马来西亚的家乡的申请，却被马来西亚政府拒绝了。为此，陈平的律师向马国法院起诉政府的这一违约举措，然而，官司打到2008年的7月22日，马来西亚最高法院最终裁决仍是不准许陈平回国。理由是：陈平拿不出他在马国的出生证明，因而，不能证明陈平是马来西亚公民，因此，不能打官司，也不能入境。显然，马国政府方面，仍然有人对陈平耿耿于怀。

对此，马国的很多报刊，便嘲笑政府：1989年12月签署泰、马政府与马共的三方和平协议时，就是陈平代表马共在协议上签的字，那时，政府怎么不问问陈平是不是马来西亚人？按政府现在的做法，要么1989年签和平协议时，政府就是搞错了，与一个不是马来西亚人的外国人签了协议；要么，今天政府不让马共领导人陈平回国，就是在自食其言，违反了1989年的协议。

但是，陈平终究没能回到他的祖国，只能仍居住在泰国。2003年，陈平用英文发表他的回忆录《陈平——我方的历史》，讲述他参加共产党的一生。他的文章，被获准在马来西亚的报刊上公开连载，并成书出版、销售。对此，东南亚学界评价颇高，认为允许陈平出书讲述马共的历史，是一个让失败者也参与对历史进行评说的范例，打破了自古以来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撰写的铁律，从而开创了历史叙述实现双向互补的先河。

2004年，陈平获新加坡政府特许，以学术研究为由，短暂访问新加坡。2009年11月，陈平发表谈话，以前马共总书记的身份，向一切当年曾受到马共活动中暴行伤害的人们及其家属公开道歉。

2013年9月16日，陈平在泰国曼谷的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9岁。■

（责任编辑 丁 东）

有奖征集民间抗战实物档案

为纪念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更好地保护散存于民间的抗战档案，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专门新建了民间抗战档案纪念馆，并决定面向全国征集有关抗战的实物档案，包括抗战时期的书信、日记、文件、书籍、照片、奖章、证书以及其他实物等。

我局实行有偿有奖征集。对凡征集入馆的抗战实物档案捐献人均给予一定的征集费，并颁发证书；组织专家对征集到的抗战档案进行评奖，并给予奖励；对征集到的实物档案分类结集编印成书公开出版。

联系方式：023-68863589
张先生、王女士
13996376236 高先生

重庆市北碚区档案局
2014年10月10日

周有光的文化观

○董 健

中国文化的现代追求

一、什么是文化观？简单地说，就是人对历史、现实、未来的看法和主张中那些最高级、最具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核心的结论和观点。这些结论和观点代表着人的追求和评判是非高下的标准，又被称为“文化价值观”或“价值观”。中国自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产生过多种文化观，错综复杂，各有长短。今天，到了一个总结与决断的时候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来讨论周有光老先生的文化观，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

二、周有光的文化观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追求的重大成果，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真理追求在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周有光原是一位经济学家，20世纪50年代转入语言文字研究，亲自参加了中国文字改革实践、政策设计和理论研究。到80年代退休后才转向历史文化研究。但他的文化观绝不是80年代才形成的。前面的经济、语文研究，都在为文化研究打基础，或者说，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他说过，语言使人与动物分别开来，文字使文明与野蛮分别开来，教育使先进与落后分别开来。文化观是时代、社会的产物，是文明发展变化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上的种种斗争，知识分子受到的与文化问题密切相关的种种压迫，特别是文革中那些反文化、反人类谬论的流行及其恶果，都促使周有光在80年代进入了深层的文化思考。

三、人类在社会实践、生活体验中接收各种信息，包括大量阅读，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不断提高和利用自己的智慧。有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文化深度与高度。恩格斯说过，由于人的寿命有限，一个人研究一个问题的深度受到很大限制，不得不在人与人之间形成研究的“接力”。周有光今年一百一十岁了，他的长寿，部分地、有限度地突破了这种局限，使研究的“接力”在一个人的身上部分地实现了。这是他所拥有的一个优势，是我们学不来的。这是一个奇迹！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一生在学问上走了不少弯路，向极左势力妥协过，学问上受到过不小的损失。但他晚年觉醒，哲学史第七卷有新的起色。如果他活到今天，说不定会有更高深的理论出来。

四、周有光的文化观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文化观之下的一系列主张（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等等），都是医治时弊之良药。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希望思想文化界，特别是那些掌握着思想文化权力的人，认真研究一下周有光老人的文化观。

颠覆性强，建构性也强

科学的、进步的文化观，是人类文明与文化自觉的表现，它对旧文化观有很强的超越性和颠覆性，同时它也有很强的建构性——树立起更强有力的价值体系。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启蒙思想家，如王若水、周扬、李慎之、李锐、胡绩伟、朱厚泽、周有光、何方、资中筠……他们从不同方面反思历史，解构多年流行的文化观，试图建立全新的，符合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要求的文化观。今天看来，他们之中，周有光的文化观最具历史与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对僵化、过时的思维模式与理论体系最具颠覆性，同时，他的理论自身也有很强的建构性——在一切荒谬学说解体的废墟上，树立起崭新的理论体系。

“阶级斗争”、凡事必问“姓社姓资”、“东—西文化的对立”（否认普世价值）等等，这些“左”倾教条和僵化的思维模式，曾长期统治我们的头脑，产生了种种荒谬、混乱的文化观。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但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没有摒弃这些“左”的、过时的

条条框框。上述各位启蒙思想家,从各自不同方面批判了这些“左”倾教条主义的理论,为我国的现代化开辟前进的道路。

周有光的文化观更具系统性与科学性。他的语言简约而有力,通俗而深刻,以轻松的方式描绘沉重的话题。他以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提出了历史三段论、文化双重论、科学一元论。他告诉我们,要从三个方面认识社会文化的发展:第一,经济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第二,政治上,从神权社会到皇权社会,再到民权社会;第三,在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上,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他特别指出了“科学”和“信仰”在文化层次上的根本差别。他揭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信仰一旦成为信仰,就不容怀疑,但它往往经不住科学事实的考验。而科学是可以任人怀疑的——因为它坚强有力地站在事实的基石之上。“信仰”和“思想主张”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科学允许怀疑,允许自由创造自由出新,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硬道理”。

解开一个文化死结

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文化的现代化遇到了一个认识上的死结:在中西对立、古今对立中,文化不知所从。文化专制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合流,借这个死结来反对普世价值,宣扬东方文化特殊论。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那些符合现代化、民主化、全球化要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等)遭到反对和否定,而那些过时的意识形态继续统治人们的思想。我本人长期困惑于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绝对主义及两者关系的问题,动摇于民族主义与世界眼光之间,被文化上的“左”倾思潮所迷惑。读了周有光的文化论,得到启蒙,茅塞顿开。他的文化双重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世界文化东西二元的提法并不符合事实。世界文化从地域和结构上看有四种:东亚文化、西亚文化、南亚文化、西欧文化(西欧文化传入北美,称西方文化)。第二,文化有高下文野、先进与落后之分。高处流向低处(先进影响落后),落后追赶先进,这当中有普世价值,也有局部的价值。没有恒古不变的文化。第三,世界文化的构成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国、各民族文化发展中那些最优秀、对人类最有贡献的文化聚合为世界现代文化,为各国各民族所共享。另一方面,各地区、民族、国家也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有些部分仍在生效,同时也在不断更新、完善和发展。按照这个文化双重论,专制保守文化主义所制造的那个死结,就解开了。观察目前世界文化走势,周有光的观点越来越为事实所证明。

科学没有阶级性

科学的一元性,是周有光文化观的核心。我们天天把“科学”二字挂在口头上,但并未能理解科学的要义何在。周有光告诉我们,科学的要义有三:一是它的一元性,二是它的真实性(即客观性),三是它允许怀疑与批判的自由主义本色。在这里,一元性是根本。这就是说,尽管我们提倡文化的多元,但科学却绝对不能因为人的见解的差别而变成人言人殊、见仁见智的东西。科学就是科学,它不容歪曲和伪造。譬如,科学有没有阶级性呢?周有光告诉我们:没有!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社会科学也没有阶级性。在这里没有什么例外与特殊。对科学问题、思想问题的研究,如果带上了阶级性,那可以叫“主张”,但不能叫科学。苏联曾经产生过“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无产阶级的生物学”等等,都失败了。现在流行的某些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伪科学。周老多次讲过(大意):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就如同在一条跑道上的竞赛,可以有快有慢,也可以有先进一些、落后一些的区别。后来者可以居上,规矩是一样的,脱轨必须回归。回归就是“回规”——回到客观规律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十分艰巨的打扫文化出轨所丢下的种种垃圾的任务。

坚持科学的一元性,关键是面对事实,追求真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追求真理就是追求真实。真实被揭示了,真理便显现出来。雅科夫列夫主持平反委员会工作,把历史上的真实揭露完了,就认识到这个党应该垮、必须垮的真理了(见雅氏所著《雾霭》)。真理就是这么朴素,而我们往往被种种创造出来的“理论”所蒙蔽,而看不到真理。希望我党我国能擎着真理的火炬前进。■

(作者为南京大学原副校长)

(责任编辑　杜明明)

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

○ 叶廷芳

我们不再是思想大国了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中央痛切地总结了前30年的教训，告别人为的阶级斗争，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使我们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竟然在短短的30余年的时间里，经济总量就接近了世界各国最高水平！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让人看到“东方醒狮”的本色了！

笔者的职业属于人文科学范畴，故对国家软实力的发展的关心不亚于上述硬实力。但一想到软实力的时候，常常不禁眉头皱起！纵向追溯，我们有过像春秋战国那样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宏大气象，有过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曾子、墨子那样一大批灿烂群星——我们不愧是个思想大国！直到清末民初，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弱国年代，我们也还能推得出像龚自珍、魏源、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这样一些可圈可点的思想大家。可回到当代进行横向比较，我们却不免感到惭愧：除了革命领袖，我们拿不出一个堪与上述人物相媲美的、在当今世界拥有话语权的思想大家！可思想是软实力的精魂啊！如果我们的软实力长期缺乏坚实的思想支撑，就不可能与硬实力构成相匹配的双腿阔步前进，我们就会成为令人遗憾的“瘸腿大国”！我们在尖端武器、航天技术、高速铁路、水稻种植、体育竞技等领域很快赶上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唯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相形见绌！为什么呢？本人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但我自信是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说出来。

强调“舆论一律”，限制了思想自由

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之所以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大家，是由于强调“舆论一律”，习惯于用某些标准化的思想来衡量社会上纷繁复杂的思想，合之者存，忤之者弃。而弃的方法又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强行宣布其错误和有害。久而久之只剩下一些“正确”的思想畅通无阻，而更多的思想则被禁锢在人们的头脑里，甚至被驱逐出人们的记忆！结果我们的思想库变成了人工的“思想养殖场”，而失去了野生的原生态和天然的基因，因而失去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人们习惯于喊些空洞的口号来虚张声势，什么“战无不胜”等等。一旦遇到较有威力的不同思想，不去分析对方的真实含义，也不考虑在平等的台面上交锋，一下子就举起拳头，把人打翻、打哑，似乎从此就“战胜”了。但这造成多大的后患，不言而喻。

尊重思想自由就是保护思想多样性的真理原生环境

人类在二次大战后显然变得聪明些了，终于懂得了大自然的规律，明白了动物界的“食物链”原理，对那些看起来非常有害的毒蛇猛兽，从必欲除之而后快升华为宁出高价而护之。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不也存在一个生态平衡问题吗？每个人都有个大脑，而每个大脑都要思考，就像每张嘴巴都要吃饭一样。因此各种思想的混杂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态。那种总想以某种“正确”的思想来统一众多的不同思想，一时好像也能做到，但时间一长，就难以见效。或表面一致，实际是同床异梦。可这更危险：你蒙在鼓里！而允许思想混杂，人们敢想敢说，那些推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天才智慧容易脱颖而出，而且总是对历史起主导作用。记得作家茅盾20世纪50年代末在撰写《夜读偶记》时，回忆起20年代寻找真理的过程，说：

那时候社会上什么思想都有，我也分不清孰对孰错。但我什么书都看，反复对比、思考，最后觉得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因为有这样一个艰难的寻找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在我头脑中是牢固的。茅盾的这番话非常宝贵，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从原生的思想环境中寻找到的真理比从“思想养殖场”轻易接受的“真理”要牢靠得多！它更说明，那种不许阅读这个、不许接受那个的做法更是愚蠢的；不但做不到，做到了也不见得有好处！

当心历史耻辱柱

在原生环境中寻找真理之所以难，是因为真理是新事物，它们一开始常常是以异端的、冲击人们习惯思维的“丑怪”面貌出现的，因而容易被人误解。这一规律导致了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或者出于自己狭隘利益的考虑，或者由于判断的失误，犯下累累罪过。约20年前我得到两部有关出版社赠送的书，一本叫《中国禁书大观》，另一部叫《世界禁书大观》。我浏览之后大有感触！那些著者为了寻求真理，却不为当局所容，受尽各种刑罚，甚至被活活烧死！而迫害他们的那些人，好像都是振振有词：或者“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或者“为了上帝的安宁”！然而曾几何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时作为“罪证”的文字闪闪发光！而当年整他们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想到这里，我真想对有关管理者说：对于思想者或文化人，你要触动他的时候，务必格外小心：有一位监护真理的历史老人在跟随着呢，而他是不死的！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

以熟读史书闻名的毛泽东分明是知道这一历史规律的，所以晚年在他清醒的时候，曾说过这样中肯的话：“要保护少数，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可惜，毛泽东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并没有按这句话去做，但这句话的本身是至理名言，应该作为思想遗产加以继承和贯彻。

中国加入WTO后很快发现：我们销往世界各地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固然日胜一日，但拥有我们自己品牌的产品却少而又少。于是上下很快达成一个共识：国人的创新意识薄弱！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世所公认的。那么缺乏创新能力的症结在哪里呢？我认为是思维惯性问题：国人向来习惯于纵向承袭思维，而不善于横向超越。最近获得一条信息对此做了佐证——乔布斯在一次演讲中有人问他：你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是什么？乔布斯回答得非常简洁明了：另类思维。可谓切中肯綮！另类思维是创新的前提。但具有创新思维的人在我们这里是容易被误解的，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

因此我认为，党的宣传部门要当心自己不要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安部”。社会上需要公安部，因为社会上的罪犯容易识别，但意识形态领域的罪犯你不好识别；你今天说他是“罪犯”，三五十年以后，说不定人家成了一个新学派的创始人！这类例子中外历史上太多了！我们的法律教科书中可以有许多罪，但不可以有“思想罪”；我们的社会可以有许多牢狱，但不可有文字狱。道理很简单：通向真理的道路有千百条，但到达真理的时刻表绝不会一致。因此，请给真理以时间。这样做也有可能“放虎归山”，毕竟“少数”未必都是真理。好比一首交响乐，它的几十分钟的美妙旋律中总有一个“不协和音”。孤立地看这个不协和音是丑的，破坏性的，但对于整个乐曲来讲，它是少不了的，因而是建设性的！世界总是这样矛盾而又辩证。因此我认为，对于社会安定，也应该运用辩证法去思考：是在“动”中求静，还是在“静”中求静？在“静”中求静，反而得不到静。好比厨房里的高压锅，留个小气孔冒气，它不会爆炸，但一旦你把气孔堵死了，必定爆炸！一个社会除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折腾，一般的吵吵嚷嚷，都是正常的社会生态，我们不必大惊小怪，而应该顺应它，习惯它。

苏联、东欧究竟在哪里摔了跤

1989年至1991年的苏联、东欧事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非常事件，执政了那么多年的共产党一下子就跨了！很想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正好1991年我获得一次为期半年的赴德访学的机会，于是我顺便做了点调查。为此特地住

到波茨坦一位熟识的教授家里。他叫汉斯·马奈特，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民主德国派到北大教我们德语的老师，两德统一前担任波茨坦大学教授兼党委委员。柏林墙垮掉后，他那个党支部23名党员有20名自动退了党。他是3位没有退党的党员之一。我们每天一起吃早饭至少两个小时，都是谈政治。他为他的党的失败深感痛心，曾先后两次眼泪哗哗。但是痛定思痛，他和剩下来的党员也做了郑重而深刻的反思。下面这些话是我牢牢记住的。他说："我们党在1989年事件（指柏林墙垮掉）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社会主义如果不跟民主相联系是不能顺利的！因此我们的'统一社会党'现已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为什么不把'社会主义'放在前面呢？"我马上插问。"我刚才说了：'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顺利'——民主是前提啊！"马奈特教授接着说："一个社会有许多利益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应该有自己的代表在国家发言，维护自己群体的权益。所以我们党现在也赞成多党制。在多党制情况下我们党重新努力，争取民众的多数，重新执政，那我们党就真的是好样儿的了！"听了他的话，我对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肃然起敬！觉得德意志民族不愧是个以严肃认真、善于思考也勇于认错著称的民族！在我看来，向真理投降比发现真理更伟大：它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体现了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的这个党虽然在野了，但该党的精神却大大升华了，而且与恩格斯的"更新"接上轨了！总有一天会重新执政，我相信！

我当时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东欧这些共产党政权的迅速解体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群众享受的自由过甚，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抑或相反，造成积怨？为此我去德国著名大学城图平根，造访原民主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汉斯·马耶尔，他是1963年因不满东德当局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而越境前往西德任教并定居的。想不到我推门进去还没等我开口，这位老教授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今天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愣了一会儿，然后委婉地说："那您当年为什么要主动离开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国家呢？"他理直气壮地说："那还用说！乌布利希（当时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搞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那不是马克思主义嘛！我们知识分子总是有些观点想表达出来。但你写文章要受批判，在课堂上讲也要受批判！我还能干什么呢？谁受得了！"显然，思想控制太严，引起了知识分子反弹。我在德国历史文化名城魏玛逗留期间，请德国古典文学纪念馆的秘书洛特先生谈谈两德统一前与统一后的感受。他大为感慨地说："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以前说话若涉及政治总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可现在，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还与不少原东德居民交谈过，多数人对两德统一后的现实是满意的。

我认为，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名的改变，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历史性的总结。这批不甘失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付出了几十年的惨痛的代价，终于痛苦地承认了一条真理，而这条真理恰好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晚年的遗训相吻合，即：必须在民主道路上走向社会主义！我国已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谢韬经过多年研究于2007年在《炎黄春秋》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精神与这一结论不谋而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谢韬的这篇长文是根据恩格斯晚年被许多人忽视了的重要论断、根据原社会主义阵营十来个国家半个多世纪的丰富实践写出来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贡献。如果党的最高领导层能以此为契机，组织一批精干的理论力量，深入各有关国家，对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分裂成的两个大派别所奉行的不同路线，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现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所遵循的"议会道路"和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结合具体实践，进行详细的考察、调研和总结，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名的改变是一种总结，但那毕竟是欧洲人的视角。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一次总结，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它是不全面和不彻底的。

我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条路线，即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和平民主路线进行补课性的调查和研究。由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的

新乡“反右倾”旧事

○ 千正旺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同志，并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会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河南省新乡地区当然不能例外。最终，河南省委认定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材料上报党中央后，耿从全省的右倾典型升级为全党的右倾典型。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应该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我当时是地委办公室的干事，经历了新乡地区“反右倾”斗争和后来平反甄别的全过程。

（一）新乡的“地段责任制不仅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出来了”如同一颗炸雷

1959年8月23日至9月25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全省三级干部会。新乡地区的参会人员是：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书记处书记陈东升，所属24个县每县正、副书记各一人。地委机关工作人员有4人随会服务，我是其中之一。

会议开始时，个人先用两天时间学习庐山会议文件。而后，以地区为小组开展讨论，要求大家联系本地工作实际，分析当前的形势。当时新乡地区由于正在全区的广大农村推行“地段责任制”，效果非常明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农业生产出现了新气象。大家认为这是新乡的主流，形势是好的。

耿起昌那时是省委的候补委员。小组讨论期间，他到省委参加了3天的省委全会。一天中午，全会结束了，耿起昌回来，但他对全会的情况未做任何透露。当天下午，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来到新乡地区小组，说是要听取大家的讨论发言。当安阳县委第一书记陈春雨在发言中讲道：“农村推行地段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学农业技术的人多了，出现了父教子、夫教妻、父子田、夫妻田、五子登科田”时，史向生突然打断了陈春雨的发言。他说道：“地段责任制不仅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也出来了。”史向生的插话就如同一颗炸雷，顿时使得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静了几分钟后，接下来的发言全都是表态性的空洞言辞。

下午会议结束前，史向生讲了两件事。一是让把耿起昌的讲话记录原稿取来，大家再讨论一下，看“地段责任制”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二是向大家宣布：为加强对新乡地区小组的会议领导，省委已通知张超同志明天到会（张超时任新乡地委书记处书记）。

后来大家才知道，耿起昌在省委全会上已被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长期以来不知道恩格斯晚年根据实践的发展对他和马克思以前的某些重要理论做了修改，对遵循恩格斯新观点的伯恩斯坦向来斥之为“修正主义”；对他的活跃在欧洲各国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即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以及工党嗤之以鼻，认为他们在与资产阶级搞阶级投降、阶级调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才有机会走出去，陆续看到一些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纲领和执政现实，逐步改变了上述片面看法。现在看，他们还是站在劳动阶层的立场上，把社会主义因素打入到资本主义机制中去，尽量把资本利润通过税收制度越来越多地“扣”下来，用来提高社会福利。在执政期间，各项政策向中下层劳动者倾斜。

从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起，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丰富实践，而且有了两种社会模式，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比较一下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杜明明）

点名批判。全会做出了《关于刘玉峰、耿起昌等八位同志所犯右倾严重错误的处分决定》。史向生此次到新乡地区小组参会，实际上是来宣布省委对耿起昌问题的处分决定的。从此，揭开了新乡地区“反右倾”斗争的序幕。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史向生所讲耿起昌讲话的记录原稿，指的正是耿起昌推行“地段责任制”的讲话记录。据我回忆，耿起昌这样内容的讲话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在新乡地区各县县委书记会上的讲话，一次是在全区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这两次讲话，都是我做的记录。记录稿经地委秘书长魏玉高审阅后，印发各县执行。原稿则存入地委的文书档案部门。

1956年的耿起昌

那么，什么是新乡地区的“地段责任制”呢？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全国“五风”泛滥，特别是“共产风”“瞎指挥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项规章制度被冲垮，生产管理混乱，耿起昌把这种混乱局面形象地概括为：“上晌（出工）敲破钟，到地一窝蜂；走路一条线，到地一大片；干活却不多，等于碾一遍。”他针锋相对，积极倡导推行了“组包段、户包块、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包工到户、定产到田、超产奖励，几年不变，让农民和土地发生感情”的“地段责任制”。这些具体内容在他讲话的记录原稿上都可以查到。

（二）新乡7年探索“地段责任制”曾引起刘少奇“极大的兴趣”；省委却批评是“架空高级社，变成了周天子”

说到新乡地区的“地段责任制”，尚需回顾一段历史：

早在1952年4月，新乡地委就总结了全地区成立最早的初级农业合作社——获嘉县贺庄马应选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制的经验，并于次年12月正式下发文件，向全地区推广他们的经验。新乡在这方面的探索和试验远远早于全国其他地区。

1956年，新乡地委在全地区实现农业高级合作社后，又开始在全地区大胆推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地段责任制”。当时，负责全省农业工作的省委书记史向生就批评道：新乡的这种责任制架空了高级社，把高级社变成了周天子。

而那几年，新乡地区的国民经济确实取得了迅猛发展。从1953年到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9%。

1957年2月28日，刘少奇视察新乡。他听了耿起昌等新乡地委负责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汇报后，对新乡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到队、固定3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十分赞赏，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1958年6月至7月，在反“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反党集团”运动中，省委批判新乡的“地段责任制”是“右倾保守”，新乡地委被迫向省委写了书面检查。责任制也随之取消，销声匿迹了约半年时间。

1959年1月下旬，新乡地委在短短不到10天内，先后两次召开办公会议，对“地段责任制”专门进行了讨论。1月22日，耿起昌在地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向全区发出建立“地段责任制”的号召。这一回，他更是把“包工包产到队”改为“包工包产到户”，与省委继续对着干！这下子，耿起昌岂能不受批判！（以上各段均引自《中共新乡地区历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三）耿起昌反对省委整干部、搞浮夸；如实报告棉花产量，使毛泽东下决心“哪儿也不去，还是去七里营”；面谏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

耿起昌除了坚持搞“地段责任制”得罪了当时的省委几位主要领导外，他还一直坚持反对吴芝圃、赵文甫、戴苏理等人错误地整干部、搞浮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召集新乡地区10个县委书记座谈时，耿起昌（中）向他介绍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社长徐占奇（左）

夸，这也是导致他在“反右倾”中遭到批斗、处分的重要原因。

1958年6月，河南省委错误地开展了反“潘、杨、王反党集团”的斗争，耿起昌就表现出消极抵触。杨珏后来回忆道：“在斗争我们时他说，老潘的问题不一定这样严重吧!赵文甫、×××开了会就威胁他说：‘老耿再这样，你右倾也跑不了!’耿起昌想不通，斗争不积极，到后来还是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像这样的干部在河南是为数不少的”。

有一次，耿起昌在陪同省委书记处某书记去原阳县视察时，他看到农村每个村口都扎着3个稻草人，写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名字，强迫群众扎砍剁、啐吐沫。耿起昌对这种违反政策和侮辱人格的做法非常反感，情不自禁地踢倒了稻草人，还愤愤不平地骂出了声。这个省委书记对耿的举动非常不满。回到郑州，他向主管全省组织和政法工作并且自1955年2月起就兼任第一副省长的赵文甫做了通报。自此，耿起昌就被赵文甫视为“异己”，怀恨在心。

当年的8月，毛泽东到河南视察，叫吴芝圃汇报棉花产量，吴芝圃说一亩地棉花产量已经达到1000斤到2000斤，毛泽东没说什么，路过新乡下车，叫耿起昌汇报新乡的棉花产量。耿如实报告：“一亩地可产200斤到300斤。每亩700斤到800斤的，新乡只有10多亩。”毛泽东听罢，第二天不顾雨后道路难行，坚持说“哪儿也不去，还是去七里营”，让耿起昌陪同到七里营视察。毛泽东看后，认为耿的汇报比较合乎实际。“后来主席得知耿起昌被打成右倾了，这时毛主席亲自派谭震林带工作组直接到七里营调查，农民一致反映耿起昌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六十条’的……”（引自杨珏谈话记录，1967年5月20日）

1958年11月1日晚，毛泽东在新乡火车站召集新乡地区24个县委书记中的10位座谈。耿起昌就全民大办钢铁的弊端面谏毛泽东，毛泽东在1965年2月对周恩来、薄一波、余秋里、谷牧提及此事：“我到新乡，耿起昌对我说，可不得了，这么多人上山大炼钢铁，没有饭吃怎么办？我一看形势不好。到了武昌，我就觉得不好，说泄气话了。”（引自《毛泽东年谱》和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

面对省委虚报粮食、钢铁产量和大办食堂、大办水利等“左”倾冒进的提法、做法，耿起昌和新乡地委的不少领导人，共同想方设法修正、拖延和对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危害。这也加深了省委对他及地委班子的错误看法，给他日后的磨难埋下了种子。

（四）省委领导亲自坐镇指挥，批判扩大升级

由于我既是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新乡地区小组的工作人员，又是当年耿起昌讲话的记录人，所以取记录稿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下午会议一结束，我即请示耿、陈二位书记，是否回新乡取来，得到同意。我当晚就回新乡从地委档案处把原稿取出，第二天一早返回郑州，交到省委大会秘书处，经他们略加修改后，记录稿登在了大会的简报上，发至各小组。耿起昌的这两个讲话记录稿就成了他“右倾”错误的主要证据。

史向生参加新乡地区会议后，大会办公室重新安排，将新乡地区与南阳地区、省直机关农林水3个组合并，共约150人左右，加大力度、集中目标对耿起昌进行批判。批判会由新乡地委负责人张超或陈东升主持，会场的秩序还是正常

的，没有发生动手动脚、谩骂侮辱的现象。发言者，主要是新乡地区的与会人员和省直机关农林水系统的同志，因他们的工作与农村有直接关系，其中也有人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南阳地区发言的人则很少。

批判耿起昌的重点问题是“包工包产到户”的“地段责任制”。另外也批判他提出在农闲时，应该允许农民有10天自己在家做饭；还有他提出大办水利可能会带来盐碱化等所谓“错误言论”。就这样，批判会约进行了10天左右，不了了之。

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晚年回忆说：“1959年省委组织批判耿起昌时，济源的县委书记侯树堂就坐在我旁边，他心里不满。我们俩和王九书等许多新乡的县委书记都是以沉默和敷衍来应付。”

为了进一步消除耿起昌等人的影响，掀起批判新高潮，省委又在《河南日报》上专门发表了《斥包工包产到户的荒谬主张》的社论。

（五）移师新乡继续批判，会期超过一个月

9月25日，省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但对耿起昌的批判并没有结束，只是把地点由郑州改到了新乡。

9月28日至10月29日，新乡地委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召开了第15次全会，贯彻庐山会议和省委会议精神。在会议开始时，首先宣布了河南省委转发的中央通知，免去耿起昌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职务。

新乡地委的第15次全会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思想实际，认真做自我检查。第二阶段从10月13日开始，将耿起昌的“右倾”错误分成不同专题，逐一进行细化批判。在批判耿起昌的过程中，又株连到地委书记处书记兼专员李炳源和地委常委兼秘书长魏玉高两位地委领导同志。

会议通过了对他们三人的处分决定：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一切职务，下放到安阳市机床厂任第四副厂长；地委书记处书记李炳源定性为严重右倾错误，撤销书记处书记和专员职务，保留地委常委，下放到地区水利建设指挥部任副指挥长；地委常委兼秘书长魏玉高定性为严重右倾错误，撤销地委常委和秘书长职务，下放到新乡县的大召营公社任副社长。

（六）三轮“反右倾”伤害大批干群；生产力严重受损

10月，河南省委决定由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兼任新乡地委第一书记。随后又任命陈东升为新乡地区专员，牛立峰为第一副专员。

当时，新乡全区参加省地县三级干部整风学习班的共有23470人，90%以上的党员干部交代了不同程度的“右倾思想、右倾情绪和右倾活动”。除李炳源和魏玉高外，还有6名地委领导干部被定为批斗重点。在全区各级党员干部中，遭到批斗的“重点人”高达7454人，最后大部分被定性为“严重右倾”，受到了各种处分。

时任封丘县县委书记的韩鸿绪晚年曾在忆文中写道：“当年秋天搞‘反右倾’，耿起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县委书记都低着脑袋，也准备当右倾。”

在随后进行的一般党内干部整风中，全区又有2273名干部被确定为“重点人”，占干部党员总人数的4.9%，在各类会议上受到批斗。理由就是认为他们反对或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意见、不满等，特别是执行了耿起昌推行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右倾”错误路线。甚至还罗列出“包工包产到户”的所谓“十大罪恶”。

在党内干部整风的同时，新乡地区的基层整党亦全面展开。参加整风的农村党员16.25万人，被确定为重点人的6657人，占总人数的4.10%”。

在上述分别针对各级领导干部、一般党内干部和基层党员群众进行的三轮整风运动中，采取了许多违纪、违法的手段，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几位亲历者在后来的文章中就写道：“整风会、集训班、特训班从地区一直办到公社，先后集中了大批生产队、大队、公社、县的各级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会批、小会斗，拳打脚踢、拧耳朵、抹花脸、跪炉渣、穿孝

1962年的11月和6月，平反后的耿起昌和王庭栋分别担任新乡地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

衣。特训班更是厉害，站着几道岗，不许自由活动，每天只能吃4两粮食。”

对于这些做法的恶果，谭震林后来经过4个月的蹲点调查，也了解到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正如他在1961年7月19日写给耿起昌等人的信中严厉批评的那样：“如逼迫某人写下永不翻案的字据，对某人采用了莫须有的罪名，对某人采用了倒栽赃的办法，用酷刑把谁打残废了，等等。这些比较明显的，不近人情的，实际上是一种犯罪行为的具体例子……”（均引自《中共新乡地区历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这场“反右倾”斗争给新乡地区的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961年新乡地区粮食总产量下降到9.89亿斤，比1957年减产43%，全区的粮食总产值和粮食总产量都双双低于了1950年的水平。（见《中共新乡地区历史》）

生产力严重受损造成整个新乡地区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危在旦夕。到了1961年3月底，新乡地委给河南省委的报告说，2月份全区每天平均死亡420人，全区缺粮9000万斤，80%的食堂没有菜吃。（引自贾艳敏著《“大跃进”时期的河南农村公共食堂》，见《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6期）

（七）谭震林亲笔给中央起草报告；毛泽东亲自给耿起昌平反；吴芝圃给耿起昌写道歉信

1961年伊始，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该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随后他亲自带领3个组到南方各地调查研究。谭震林后来当面告诉耿起昌：“毛主席找到我问：‘耿起昌现在在哪里呀？’要我带人去查一查。”

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带领调查组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蹲点调查。调查的题目是“民主办社”。谭震林很快就发现了广大社员群众对1959年新乡地委推行的“地段责任制”非常怀念；同时，干部群众也对因此把耿起昌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感到愤愤不平。谭震林提出要审查1959年“反右倾”的档案材料。当时，地委领导安排我在谭震林身边做服务工作。于是我第二次到地委档案处将耿起昌当年两次讲话的记录原稿取出，呈送给了谭震林。谭经过认真审阅后，向中央写出了专题报告。而且，谭震林从报告的起草、誊抄，甚至到写信封，一切都是亲自动手。这些程序完成后，谭交给我装入信封、封上口，命令我派车送到郑州，由省委机要处指定专人专程送往北京。我装封时，看到谭震林在报告的抬头处写的是：“中央、主席并彭真同志”，在信封上写的是：“彭真同志亲启”。

接着，谭震林召开了七里营公社的全体干部大会，生产队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谭震林特意叫吴芝圃从郑州赶来主持这次会议。就是在这个会上，谭震林明确地向大家宣布说：“地段责任制”是生产管理制度，不是方向道路问题，更不是资本主义问题。他还具体举例说道：把河南省交给你吴芝圃，这就是你的“地段责任制”；把山西省交给陶鲁笳，山西省就是陶鲁笳的“地段责任制”。

谭震林的讲话，首先为“地段责任制”正了名。

会后，谭震林又让新乡地委通知在安阳机床厂担任副厂长的耿起昌来七里营参加调查组。耿接到通知后，从安阳乘火车来到新乡，是我到

车站接的。耿下车后，直接找谭震林报到。谭在与耿起昌谈话时，多次夸奖耿起昌的骨头硬，没有向搞“左”的那些人低头。随后，耿起昌被谭震林派到八柳树大队担任调查组的组长。谭震林让耿起昌重新恢复了工作，这也等于给他的日后公开平反铺了路、定了调。

这时的吴芝圃也开始改变态度，他用毛笔给耿起昌写了一封道歉信。

谭震林在七里营的讲话和让耿起昌参加调查组的消息，很快就在新乡全地区传开了。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受到处分和牵连的大批干部也站出来，纷纷要求平反。这时，谭震林又提出，由新乡地委把这些干部集中起来，在豫北宾馆举办平反学习班。学习班的名称仍然沿用调查组的题目，叫作“民主办社学习班”。6月9日正式开班，几天之后，就传来了毛泽东6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的部分内容。

毛泽东在讲话中做了自我批评，并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要甄别平反，重新教育干部。毛特别以河南错误打击耿起昌为例子，明确表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和态度。他说：前一段“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如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跟我们现在的六十条比，他就是完全正确的，他有先见之明，比我高明，但是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了，要坚决给他恢复名誉，仍当地委第一书记。我们要承认错误”。毛的这番话，算是他代表党中央和本人，亲自为耿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还专门确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中，不许再开展反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1961年7月，改组后的河南省委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为耿起昌等8人平反，同时任命耿起昌为新乡地委第二书记。

8月，新乡地委在第16次全会上，宣布为耿起昌、李炳源、魏玉高3位领导同志平反。

11月，由耿起昌主持地委工作。次年11月，省委正式任命耿起昌重新担任新乡地委第一书记。

当时，新乡地区因“反右倾”需要甄别平反的党员干部、群众共有10万余人。从1961年11月至1962年12月底，在新省委直接领导下，绝大多数同志都被改正了原来的错误结论，陆续得到甄别平反。相对于那时纠正“共产风”所进行的经济退赔，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贴切地称这次甄别平反工作是“政治退赔”。

之后，全区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恢复和提高。到196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15亿斤，棉花总产量3825万斤，比1956年增长4.42%。全区的工业总产值4706万元，比1956年增长361.37%。（引自《中共新乡地区历史》）■

（作者曾任新乡地委和新乡市委副秘书长）

（责任编辑　杜明明）

2015年出书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①**文学及小说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游记、通讯等；历史、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②**社科、人文、历史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③**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行政、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和学术专著；④**美术类书稿：**画册、书法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08-8708　传真：010－65735038
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王双、牛萍萍、文馨(编辑)
约稿详情、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zuojiaba.com
投稿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8号朗廷大厦A座515　编辑中心收(邮编：100024)

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

● 专业作家为您代写个人传记、回忆录等作品；● 只要您口述就行了，其余交给我们来做；● 作品以图书、光盘、摄影集、视频等形式发行；● 咨询热线：400-608-8708　邮箱：bookzj@126.com

★咨询即有精美新书赠送(有限量)！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大“五一九”参与者的结局

○ 蔡家麒

1957年我还是一名北大历史系的学生。5月19日上午，学校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质问校团委的大字报，掀起了全校师生压抑已久的民主怒涛。我是这张大字报的参与者、捉笔人。但当时我完全是不自觉介入的。

大字报的出炉

是日晨，我在30斋宿舍看书，听见班长张兰馨和张学仁等一群同学从楼下大声议论着走上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正在北京召开的青年团全国第三届代表大会我校的代表是谁的问题，然而都不知道是谁。他们刚刚走访了系总支和校团委，接待的人也不清楚是谁。为此，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张兰馨大声说：“刷他一张大字报！”众人立即同意。这时有人提议我执笔，因为我的毛笔字被认为写得好。班级党支书孙淼也在场，他是位年岁较长的调干生。这段时间正是党号召大家“鸣放”的时刻，老孙表态可以写，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我就在一张粉红色的大纸上写了起来。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团三大的召开。我们有如下问题需要校团委答复：一、我校的代表是谁？二、他是怎么产生的？三、我们有意见向何处反映？”署名是“历史系二年级二班一群团员和青年”。

大家拿着这张大字报走向大饭厅，我也跟随前往。贫农出身的非团员陈鸿生自告奋勇地张贴，一时不少过往者驻足观看。时近中午，我回中关村家中，待到晚饭后返校，发现整个燕园沸腾了。以大小饭厅为中心的墙壁、报栏上贴满了各色的大字报，其中以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我的一株毒草》最引人注目，刘奇弟的《胡风不是反革命》以及中文系学生张元勋和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相继贴出。当晚他二人还发表演说，朗诵了这首诗。这段时间的大字报内容，有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教授治校的，有要求公布或废止个人档案的，还有揭露黑暗不公正的事项的，等。《阿Q外传》和《儒林内史》等讽刺长篇陆续面世。饭厅周围成了空前的民主广场，同学们激烈地陈述着、辩论着。这块民主飞地，后来几乎成了北大民主传统的象征，一直延续到1989年。

5月19日晚，学校在大饭厅举行例行的报告会，著名学者于光远莅临做报告。在他讲话时，有不少学生给他递条子，多半是问他对当天学校贴出的大字报的看法。他当时没有准备，回答不多，很谨慎。

陈鸿生病死狱中

我所在的年级有3个班，即两个历史专业班、一个考古专业班，每个班约30余人。“反右”开始后，每个班都划了3名“右派”同学。我班的张学仁（第一张大字报的积极参与者）、雷光汉和陈鸿生均被划成“右派”，其中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为在他自己交代的日记里发现有不少反党言论，即便他从来也没有流露过。他历来很内向，我平素同他接触很少。他来自江苏农村，身体壮实，在入学前已婚，有一子，因和班级党支书谈话时动手打人而被捕，后病死狱中。后来他们三人都被平反，陈的遗子，学校给予了生活补助金。我在翌年的整团运动中，也被批判，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大约在1978年，我所在的昆明地球物理研究所人事部门通知我，北大团委决定撤销当年给我的处分，并从我的档案里撤去了一些不实的材料，只给了我一份被撤销材料的名目单和一纸取消处分的通知书，记得上面写着年轻人说过一些“过头话”，不必计较一类的文字。

党委书记江隆基数年后自杀

当时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据说他在“反右”和划“右派”期间不够积极，北大划“右派”716人。数量不及清华多，似乎是书记没有全面理解和贯彻中央的意图，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批评。“反右”结束不久，他被贬到兰州大学去当校长。1959年7月，我和同班同学在甘肃地区结束民族调查后准备返回北大的前夕，专门去了兰大看望江校长。他在家里接见了我们，他的话不多，要我们每个同学在他的笔记本上留下我们的姓名。文革期间他自杀了。

雷光汉远走他邦

同班被划成“右派”的雷光汉同学，他在“反右”和文革里的遭遇颇具传奇性，也具有典型性。雷是湖南湘西石门的土家族人，家人务农。他身材较矮，胖墩墩的，脸上经常堆着笑。在1957年“鸣放”期间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文史楼前。这张小字报讲的是帝俄时代俄国侵占了我国东北和西北许多领土，但是苏联当局对于以往中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包括黑龙江以东的“江东64屯”等中国的大片土地，一直占据着不予归还。这事被我班党员同学颜芙善意地批评了一顿，他遂将这张小字报撕了下来。“反右”期间各单位都有划“右”的指标，雷光汉以出身富农和反对苏联的罪名候补成一名“右派分子”。当年划“右”有一条重要的标准，即所谓的“反共、反苏和反人民”。很多同学为他抱屈而不能言。1960年6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疆伊犁中苏口岸霍尔果斯的霍城县中学教书，此地距边境仅7公里。其间他在《伊犁日报》的《天山夜话》专栏上发表了一些涉及新疆的历史与人物的文章，文革开始，新疆的《天山夜话》和北京的《燕山夜话》被挂上了钩，雷光汉遂被打成“黑帮分子”、专政对象。文革初，一度被押往伊宁市附近的南台子煤矿挖煤，后又转到天山脚下修水渠。红卫兵大串联期间，他到北京找到了同年级同学沈元，两人谈至深夜，对动乱的文革局势忧心忡忡。沈元助他20元钱，回到湖南湘西老家，他的老父被批斗得病卧在床。家乡也难久留，雷光汉不得不回新疆，却发现未婚妻为了和他划清界限，竟然同别人跑了，真可谓无处可去。

1968年4月29日北大中文系学生林昭，1970年4月18日同校同系同届的沈元皆以“反革命罪”先后被枪毙，时值全国“一打三反”，到处都在枪毙人，红色恐怖蔓延全国。此时在乌鲁木齐的一位北大同年级从事考古的同学王柄华托人将一张叫雷光汉“速逃”的纸条通过雷的一个学生秘密送达雷光汉，要他赶快逃走。作为一个“黑帮分子”，他为了活命，于1970年4月下旬泅过冰冷彻骨的伊犁河，逃至对岸苏联的哈萨克斯坦，苏联边防军以非法越境将他逮住关押。其间经苏联特工机构KGB多番提审，他只说自己是个教师，因避文革之害而逃亡，匆忙出逃未带任何身份证件。但他想起在北大读书时，有个苏联留学生叫刘可夫（克留可夫，后来曾担任过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在北大读研究生，攻中国古代史，那时雷光汉和刘有过接触，他提出刘可以证明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刘可夫为人仗义，证明了雷的身份。KGB了解他不是中共潜入的间谍，就施展各种拉拢、诱惑和威胁的手段，要他和KGB合作反华，被他坚拒。他一再郑重申明自己“反对文革绝不反华”。其间，先后拒绝到当时反华的东方研究院和莫斯科出版社工作，也拒绝参加拍摄反华电影和为反华电台撰稿，他始终拒绝加入苏联国籍，甘愿做一名备受歧视的“无国籍者”。他被同意留在靠近新疆边境的哈萨克斯坦一个城镇侨居。为了生计，他摆过地摊，在一个机械工厂当过技工，他的日常生活长期被KGB监视，特工们对他不断地骚扰，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他始终坚定地拒绝和KGB合作，绝不做对不起祖国人民的事。他对当时当地官员的腐败非常厌恶，尤对无处不在的苏联特工的种种卑劣手段愤懑不已，认为在苏联境内侨居只是权宜之计，一直计划着再次逃往海外有华人居住的地方生活。曾逃往伊朗再转往他地，结果在出逃的土尔克明斯坦边境被捕，以“民族主义者”罪名被审讯、监禁了7个月后，流放到南西伯利亚的国际囚犯农场服苦役。

文革十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此时北京有媒体报道，曾经在北京郊区某座桥上发现苏联特

工的活动。一天,有人来到雷的同班同学陈高华(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家中,通知他雷光汉是"苏修特务",雷若是到来,要马上报告。后来据陈对我讲,他们对所有在京的同班同学都打了这样的招呼,但是后来又对这些同学解除了这个决定,这么严肃又严重的事情,被说成是一个"误会"。

这件事,我直至见到2014年6月2日的《文摘周刊》上转载《济南日报》的一篇题为《苏联秘遣间谍潜伏东北始末》一文后,才了解了当年的一些真相。那些年,中苏交恶,在北京郊区西坝河,我国公安部门抓获了一批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外交人员,还得知有一名从新疆叛逃到苏联的中国人,参与其情报活动,中国当局立马就怀疑到雷光汉,不久查明这个人是李洪枢。1972年李再次被派来中国,在东北地区搜集情报,被中国边防人员抓获,发现他随身携有情报发射器,与苏联使馆人员秘密联系。后经精密部署,当场抓获了前来和李接头的苏联使馆秘书,人赃俱获,这才解除了对雷光汉的通缉,避免了又一起冤案。

20世纪80年代雷光汉同当地的一位贤淑的中国女画家结婚成了家,自从他的女儿出世后,一颗激荡不宁的心沉静了下来。国内改革开放后,当局恢复了他的中国国籍。其间雷光汉两度回国探亲,目前他侨居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塔拉兹城靠养老金生活。2011年雷光汉写就了30余万字的《苏联逃亡记——一个反苏分子的家国情怀》,记述了当年他种种遭遇的全过程。这部自述性的实录,生动地描述了生活在前苏联中亚地区各民族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行为,见证了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时的动荡岁月,表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爱国情怀。

沈元被执行死刑

还有一位值得记忆的同届一班同学——屈死的沈元,当年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他的遭遇和结局更加悲壮。1956年,他因为从一份英文的《工人日报》上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片断供同学传阅而被划"右"的。我和沈元平素没有交往,唯一的一次接触是在1955年9月初,我们作为历史系的新生刚到北大报到,被暂时安排在小饭厅住下,我和他的床位相近。有一次我们谈到民族问题,他当即指出我对民族的理解不符合斯大林的关于民族的4个定义。当时我就感到他的知识比我多。后来他担任一班的团支部书记。二年级他在做中国古代史年级作业时,他居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汉武帝年谱,邓广铭教授在课堂上加以赞赏,大家都认为他是全年级最好的学生。据说沈元是上海著名电影导演沈浮的侄子。20世纪50年代初,我看过沈浮导演,蓝马和上官云珠主演的《希望在人间》,印象颇深。

据知,在"鸣放"和大字报期间,沈元并未公开发表过什么言论,但仍逃不过划"右"的厄运。那年月,因为业务技能出众而被打成"右派"的人绝不在少数。

沈元被划"右"后,被集中到北京门头沟山区斋堂北大生产基地劳动改造,被劳改的大都是北大的"右派分子"。白天从河滩背石头上山修水库,晚上开批判会,经常被批判有抵触情绪。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折磨和凌辱。一天,他偷跑出来,一路步行到天安门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能也提出了自己的申诉。公安局把他带到北大处理。沈元提出不愿意再回到斋堂去,请学校另行分配他到工人队伍里去接受改造,于是他被分派到河北唐山修筑铁路的工段上劳动。沈元很快就适应了,同工人相处得很融洽,为工人们扫盲,讲历史故事。大家都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学生怎么会是"右派分子"!1961年在工人们的保举下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这年他患了肝炎,工地批准他回北京治疗,住在灯市口的姑妈家。他经常跑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和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写史学文章。

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3年多的人祸天灾,政治气氛有几年相对宽松。他的姑妈是位高级知识分子,认识一些上层领导,1962年,她通过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把沈元推荐给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黎澍,黎看了沈元撰写的9篇学术论文,很是赏识,他正需要找一位助手,遂留用沈元当助理研究员。黎将沈元写的《〈急究篇〉研究》一文刊登在他主编的《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上。沈元在该文中认为,汉代的儿童蒙学课本《急究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汉代人的眼光即人类学所谓

的“主位”视角来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受到老一辈史学家的称赞。在黎澍的指导下，他写就了5万余字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一文，登载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上，《人民日报》副刊将该文编成《论洪秀全》和《论太平天国》两文先后整版发表，这在当年是少有的事。我当时在呼和浩特读到这两篇文章后，竟有些不敢相信是他写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所里的造反派批判黎澍拉帮结伙，重用“右派”。黎、沈屡遭批斗，黎澍倒台，沈元被扫地出门，他已经是走投无路了。1968年9月1日，沈元用鞋油化装成黑人，企图进入非洲某国驻华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再设法离开中国，却被我方门警发现，立即逮捕其入狱。1970年4月18日在北京的一个公开场合，他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叛国罪”立即枪决。据他同班同学党支书郭罗基后来撰文说，沈元临刑时显得很镇静。他被枪毙时才32岁！对于一个青年英才之屈死，我无限惋惜！我想用云南学者马曜先生早年诗作中的两句来祭奠他：“大地不平山突兀，苍天有泪雨滂沱。”

20世纪80年代沈元被平反。北京中级人民法院的平反通知书上说：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1968年9月1日被逮捕，1970年4月18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1968年4月18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可怜沈元的80岁老母亲经过千辛万苦争来的一纸无罪判决，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呀！”北大党委为沈元做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有关当局到近代史所当众正式宣布此事。这真是“屈死的冤魂，天地鉴察！”黎澍生前说过：“近代史所要有10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变。”有些研究人员多少年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他还说，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楷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来补校前人的注。他死后留有一包文稿，被近代史所的一位人事处长或行政人员拿走了，迄今不知下落。沈元的长兄沈荃、姐姐沈蓓，为争取将沈元的遗稿《汉书补注》公开出版，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元，最终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

杨秉功囚后执教

同年级考古班同学之遭遇也须提及。他叫杨秉功，河南南阳人，喜欢拉拉京胡，绰号“杨大姐”。鸣放期间，他以匿名信攻击党外人士卢绪章，说他积极钻营，爬上了政府的要职，并警告威胁他当心自己的性命。这显然是很幼稚的做法。但是，这封恐吓信居然很快落到了当局最高层的手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分量极重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登在1957年6月8日第一版上，说“右派分子”们已经磨刀霍霍杀向党了。这就是“六八社论”，党中央明确地发出反击“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信号，从此全国掀起了“反右”斗争。这期间杨秉功也和大家一起投入运动，直到1960年初夏毕业前夕，他才因匿名信被捕。他被捕是夜晚同学们都回到宿舍就寝，10点半钟统一熄灯的时刻，有人在寝室外叫唤杨秉功，要他出来，杨走出寝室就被公安带走了，从此杳无音信。若干年后，杨被释放，他曾到历史博物馆，找到同班的宋兆麟。据宋告诉我，杨秉功已满头白发，没有谈及当年的事，也未提及他的有关结论和平反的事。只知入狱后，他除了不能外出和与外界联系外，可以阅读书报，并且学了一手木匠活。他回到家乡南阳后，曾一度经营家具制作糊口。近年我又了解到杨在当地因为一直没有给当局添“麻烦”，就被调到南阳师范学校任教，在这里办了退休。

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全国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分子”，从来没有准确的数字，官方迄今讳莫如深。国内出版物通常用的数字是50万人，但许多人认为实际上远远大于这个数目。知识分子在社会性的是非面前，大多表现出有良知，有正义感，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因为知识给予他们力量和信仰。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灵魂脆弱，心地龌龊，以损人利己为快事。这种人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多余而有害的。■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杜明明）

曲阜1958年“大搬家”始末

○ 张树亭 张玉昆

1958年9月初，刚刚完成“人民公社化”运动；9月19日，便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紧接着10月“大办民兵师，实行全民皆兵”，“县办民兵师、公社办民兵团、大队办民兵营、生产队办民兵连”（《曲阜市志》第37页，以下只注页码）。曲阜县一直与全国保持步调一致，只是在“大办民兵师”运动之后，插入了自己的地方运动：全县22个乡镇406个自然村75998户350484人“大搬家”。（第91页）

“大搬家”基本是两种形式：一是本村“互搬”，即本村人张家搬到李家、李家搬到王家。稍远的东头搬到西头，最近的仅仅路南搬到路北。总之“挪挪窝”即可；二是“并村”，即整个村子并入另一个村子。

“并村”腾出的“空村”，主要用于驻扎成建制的民兵组织：如纯女兵的“穆桂英营”、纯男兵的“小罗成营”。有的作为公社事业单位，如陵城公社的何家村为学校：全公社1～6年级400多个小孩子在那里集中吃住。

“搬家”规定：只允许携带床铺、被褥、衣物、碗筷等，而严禁携带金属器具，比如锤头、錾子、铁锅、菜刀、饭勺等。尤其是严禁带粮食。为严格落实这一规定，村委统一安排党、团员或青年民兵、积极分子负责监督。住户前脚离开，监督者便随即搜查：铁器，送到曲阜城里帮助完成上级下达的“大炼钢铁”指标；粮食，送到大队仓库。

不论“互搬”还是“并村”，都是几家搬进一家，有的甚至是两三家搬进一个三间堂屋或两间偏屋。即没有一家是独门独院的。可想而知，这对于千百年过惯独门独户日子，思想意识又相当封建、保守的曲阜农民来说是多么不习惯。我（笔者张树亭）时年11岁。我们父子俩与曹家母女仨共住一个两间厨屋：她们住里间，我们住外间。白天黑夜出出进进共走一个门。试想，彼此都会是多么别扭！最难堪的是用厕所：那时农家都没有专用厕所，一家人都是用猪圈（曲阜俗称“茅子”）。现在几家人共用一个“茅子”，那会是多么不方便！

“大搬家”工作还未完全结束，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社论。于是，“全县一哄而起，以生产队（民兵连）为单位全部办起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第37页）

大约两个月后，仓储几乎吃光，于是改为以稀饭（曲阜俗称“糊涂”）与胡萝卜豆腐为主食。胡萝卜豆腐，绝不是“豆腐”，而是胡萝卜片掺上大豆碾碎的豆糁子蒸煮而成的一种食物。最初，豆糁子还较多，该食物还有点饭味、香味，人们还能下咽。不久，大豆吃光，改用豆饼，那饭就很难吃了。再后，豆饼也很少了，便几乎成了一缸缸一盆盆的胡萝卜……人们为了多得到些豆糁、豆饼，每到开饭，都是拼命地抢盛，在缸里盆里翻上搅下，因此，轮到后边盛的，缸里盆里就是一堆胡萝卜泥水。

各地公共食堂因抢饭、盗窃不断出事，尤其是浪费严重又无良策解决。因此，到1959年3月，上级下达指示：所有公共食堂一律停办，折腾了5个月，便宣告彻底失败。

食堂停办，社员就得各自起火。怎么起？几家搬在一起，栖身都很窝屈，哪里还有厨房？即便几家能合伙在院子角落处搭个“棚子厨房”共用，又上哪里去弄锅、盆、刀、勺……至此，各村委实在没招了，便请示公社并转呈再上级：让社员各自搬回各自老家。至此，轰轰烈烈的“大搬家”也宣告彻底失败。

自然，“并村”的社员也就搬回原籍。那些“穆桂英营”“小罗成营”等民兵组织也就自动宣告解体、解散。

各自回到家里又怎么办？有的已是残垣断壁、破屋烂院；普遍的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没有风箱、锅、盆、瓢、勺等最基本的厨具，而最严重的是没有

粮食。对于这些问题,村委、公社都毫无办法,只能“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

至此,全县大饥荒开始。人们争采树叶。最先是较为好吃的榆树叶;榆树叶采光了,就采洋槐叶;洋槐叶采光了,就采家槐叶……直至吃臭椿叶、金针苗。曲阜城北石门山一带有不少人吃橡子面、观音土……就在吃家槐叶时,已有人出现中毒肿脸症状,到吃臭椿叶时,中毒肿脸的就不少见了。一些吃橡子面、观音土的,主要是大便不畅。

“4月,全县社员中因营养缺乏,患水肿病者达15124人,有400多名青壮年外流东北。”

为遏制水肿病的蔓延与死亡,“县委确定每人每天安排7.5两(市两)粮食,在全县发放34.8万元,并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外流”(第38页)。7.5两,即不到半斤。起初是地瓜干与大豆,后改为地瓜干与麦麸饼,再后又改为全是地瓜干。

极其严重的大饥荒持续到1960年夏的麦季才得到初步缓解:收成最好的城关公社有的村每人能分到60斤小麦;收成最差的尼山公社的最差的村也能分到6斤。那年的收成,整个曲阜都是不错的,但因上缴“爱国粮”任务太重,不敢多分。到1961年年底,由于大多村偷偷分了些“自留地”才得以解除。这就是说,曲阜地区也和全国一样,是“三年大饥荒”。

曲阜有句俗语:大旱三年,圣人(孔子)门前收三分。曲阜,地处山东丘陵与鲁西大平原的过渡地带,这个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就使得它即使遇上大旱、大涝,也能有不错的收成。而1958年与其后的几年,皆风调雨顺。之所以会发生“三年大饥荒”,主要原因是3点:

一是1958年的严重“失收”:为完成“大炼钢铁”任务,“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由公社统一指挥。晚秋收获,要求限期报捷。地瓜、花生大部烂在地里。”(第37页)

二是“大搬家”。本来,那年上半年麦季都还分了些小麦,加上曲阜人有攒陈粮的习惯,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下半年一米不进,家家户户也能撑过一年半载的生活。但“大搬家”特别规定“不准带粮食”,就使得家家户户没有一米一豆的“内存”了。

三是“公共食堂”浪费太严重,使得“大搬家”搜刮的粮食很快用光。

多年来,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58年的“大搬家”,是何人创意?又是何目的?这些《曲阜市志》均无记载。当时从大队到公社层层级级开全民大会动员此事时,说得最多的是:为了“实现军事化”“集体化”“三年超英赶美”“五年进入共产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但这些说辞,似乎难以作为“大搬家”的充分理由:不“大搬家”,就不能实现那些伟大的宏伟目标吗?唯一可做解释的是:为吃“公共食堂”筹措粮食、为完成“大炼钢铁”指标筹集钢铁、为驻扎建制民兵组织准备营地,但这些事情,全国各地也都面临,为何人家就没“大搬家”而唯独曲阜呢?且,若细考多项事情发生的时间先后,更有多处难以圆说:比如9月19日开展“大炼钢铁”,曲阜城东很快建起“500余座韶阳炼钢高炉”(第37页)。怎么高炉刚点火就能预见到这些高炉肯定完不成上级下达的炼钢指标,而需“大搬家”收集社员的铁锅铁勺来帮助?莫非曲阜县某领导有未卜先知的“特异功能”?再,10月中旬“大搬家”,怎么能预知下旬《人民日报》准会发表《办好公共食堂》社论,而需提前做好粮食准备?莫非中央给各下级提前开了“吹风会”。

不言而喻,1958年的“大搬家”对曲阜民众可说是一场空前劫难。对此,群众不可能没有丝毫不满、抵触情绪。为保证这一“新生事物”的实施,曲阜县委主要采用两种政治手段进行思想控制。对阶级敌人,经常召开批斗会;对其他成分的“思想落后分子”,一经发现,便召开批判会。比如有一中年妇女对“大搬家”不满,说:“这过的是什么日子?”村里便派4个民兵把她从家中架到会场“批评教育”:架时四肢朝上,犹如四腿桌子四腿朝天,拖行近200米;一中年妇女在“大搬家”中偷藏粮食,开完批判会后命她挂牌游街,自敲小锣自喊“都别跟我学,我是坏蛋,我偷……”一中年男子对吃食堂不满,说“人多没好饭,猪多没好食”,村里便召开大会对他“拔白旗”:令其赤背跪在雪地上接受批评。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执政伊始便提出“不折腾”的治国理念,他可能多就文革而言。但曲阜百姓,早就深刻体会到了“瞎折腾”“胡折腾”“乱折腾”的滋味了。■

(张树亭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张玉昆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杜明明)

我亲历的苏州武斗

○ 解顺庆

我是1968届高中学生，就读于江苏吴县中学，文革初期和千千万万红卫兵一样，经历了“四大”、批老师、斗校长、“破四旧”、大串联等一系列运动。1967年四五月间，由于与新生的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产生重大分歧，形成了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即“支”派，和苏州市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简称“串联会”）即“踢”派。我所在的吴县中学“红总司”属于“踢”派。到六七月份，小范围的冲冲打打开始了，但还只限在冷兵器，最典型的武器是洋镐柄和“古巴刀”（出口古巴的大砍刀，收割甘蔗用的，长约80厘米）。每天街头大卡车呼啸而过，攀在车门外两侧的两个人手持的必然是“古巴刀”，甚是威风。卡车上齐整站立着头戴藤条帽、身穿黑老纱、手持洋镐柄的斗士，冲向不知名的战场。

迂 回

当时整个苏州地区的基本态势是：“踢”派占据了六城门内的苏州城，“支”派被逐出苏州城，占据了城郊及周边乡镇，对苏州呈包围之势。由于市区“支”派的到来，吴县、吴江、昆山、常熟等地的“踢”派势力骤降，只得纷纷撤退，向苏州城内靠拢。我就读的吴县中学，位于苏州西北十余里的浒墅关。在这种情势下，主导全县学生运动的吴县中学“红总司”也只能组织全县“踢”派学生大撤退。

1967年7月28日下午2点，浒墅关火车站由工人、学生组成的二百余人的队伍集结完成。在几位复员军人的专业指挥下，我们呼着战斗口号，登上了绿皮火车，颇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境。列车一路向东，开开停停，在傍晚5时许到达上海，上海“工总司”接待我们，我们住进了位于徐家汇的风雨操场。苏州地区的“踢”派在这里大会合，少说也有两三千人，各式战斗队的旗帜堆满了主席台。住了两夜，“苏三司”（苏州地区革命造反第三总司令部，苏州地区当时下辖苏州市、无锡市、吴县、吴江县、昆山县、常熟县、太仓县、沙洲县、江阴县、宜兴县）头头卢某做了两场演讲，大意是苏城在流血，我们要打回老家去，保卫苏州城。当时，其列宁式的、希特勒式的手势交替挥动，使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学生热血沸腾。7月30日晚上，我们这支几千人的队伍，举着“打回老家去，踢开苏革会”“保卫苏州城、保卫大上海”的横幅，在上海大游行，上海市民也敲锣打鼓为我们壮行。和两天前离开浒墅关火车站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从徐家汇一直走到宝山路上海老北站，斜穿了半个上海，上海“工总司”组织两组专列，才安顿全部人马。从上海出发，31日凌晨5时到达苏州站。

这次苏州地区“踢”派安全大撤退，并最终顺利进驻苏州，苏州地区的“苏三司”功不可没。如果一厂一校一镇等“踢”派向苏州靠拢，必然遭到层层拦截，损失伤亡将十分惨重，而上海当时是“踢”派最可靠的大后方，上海“工总司”是支持“踢”派的。自此，“苏三司”头头王某等名噪一时，其旗下全部由复员军人组成的“八一”战斗队更是名声大震。

初 战

苏州武斗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战斗，均发生在1967年8月，即“火烧苏医”“火烧赵天禄”“火烧葑门孵坊”，史称“苏州三把火”。到苏州的第二天，8月2日凌晨，我便参加了“火烧苏医”的战斗。苏州医学院（简称“苏医”），位于苏州最主要的马路人民路边，距南门仅几百米，一幢西式丁字形4层教学楼，是该校最主要的建筑。“支”派据守在大楼内，“踢”派在校院周边包围，渐次向大楼进攻，冲在第一线的是工人队伍，而其中又以复员军人为骨干，双方加起来有七八支“五

六”式步枪，还有一些小口径军体步枪。这些便自然归几位退伍老兵所用了，坊间传说的机关枪之类肯定是没有的。当时仓促上阵，我手中连根木棍也没有，混杂在大队人马中。我们“红总司”一干人设伏在“苏医”南侧，我和一个叫天白的同学一起坐在“沧浪亭”小河边的石栏杆上，算是埋伏了，其实连一个“支”派的面也未照。天快亮时，被围主楼顶上传来了高音喇叭广播声：“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青山不老、红旗不倒，苏革会垮不了”，“你们被蒙蔽了”！我听着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呢，不禁和天白对望了一下：“心松！肯定是心松。”心松是我们初中时的好伙伴，只知道他此时是“支”派，想不到今天被我们围困在大楼内。心松幼年丧父，读书极好，是老师眼中标准的好学生，想到这里，心里真不是滋味。天白一声：“走吧!”正合我意，再加上又困又饿，我的第一次武斗经历便收场了。两天后，8月5日我返回“苏医”现场，见大楼顶部木结构已成炭黑状，4具尸体散落在现场，其中可以确定的是我校“红总司”一姓徐同学，被小口径步枪击中肺部，时年17岁。

拔除苏州城内最后一个“支”派据点江苏师院，是我参加的最危险、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战斗。该校位于苏州城东葑门相门中间地段，紧临护城河，时值8月中旬，当天下午我们头戴藤条帽，身穿背带工装武斗服，没有枪，埋伏在该校葑门一侧围墙外，任务是抓俘虏。突然护城河对岸高楼上一串串重机枪子弹向我们射来，“嗒嗒嗒”，“嗒嗒嗒”，极专业老练的点射，间隔两秒钟一次，我们遇到高手了。骄阳下、白墙边、黑老纱、白藤帽，再好不过的射击目标了。市郊大片菜农地里的长豇豆棚、黄瓜架成了我们救命点，不料子弹还是追踪而至，菜叶、泥土是切切实实溅到了我头上、身上。我猛然醒悟，白藤帽目标太明显了，我大喊一声：“帽子摘掉!”大家纷纷照办，果然，子弹不再飞来，同时，我方阵地机枪也响了，火力掩护压制了对方，我们逃过一劫。这场战斗，据点是拔除了，但在我们的队伍中死了一个学生。他是扛着一箱子弹冲过小河，一条小木船连接两岸，刚冲上小船，被重机枪击中颈部，当即倒下。让我们记住他吧：缪亚伟，浒墅关民办中学初二学生，时年16岁。

苏州战斗冲在第一线的是各大厂矿的工人，在这支队伍中有很多退伍军人，他们经历过朝鲜战争、解放一江山岛战斗、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炮击金门等实战，当时他们大部分30岁到40岁上下，经验、体力都正当年。带领我们据守南门人民桥的一批退伍老兵中有3个人，绰号分别为“大癞”“二癞”“三癞”，我在跟随他们据守人民桥的几十个日日夜夜多次听他们讲述亲历的战争场景，这些讲述往往自豪带着吹嘘，但我是绝对肃然起敬的，我的军旅情结就是从这一刻萌发的，后来，我也入伍当兵成为一名军人。

厮　杀

说到武斗真正和对方面对面厮杀的场面，我只经历过一次，但正是这一次令我终生难忘。那是1967年9月上旬，苏州军管会“八二四”公告，“九五”命令已颁布实施，枪支基本上已收缴，武斗稍趋平缓，两派只是高音喇叭互相对骂。一天下午两三点钟，一伙“支”派二三十人，手持棍棒从桥南堍冲向桥中央我方沙包阵地挑衅，我方马上组织三十余人冲出反击，我手持洋镐柄冲在前面，借桥面居高临下顺势挥舞冲击，仅一个回合，对方就逃回桥南堍向东拐入南门外大街。我们追得来劲，冲进对方街区四五十米，突然，从大街两侧民房内冲出上百人，前面逃的又反身杀回，对我们形成合围之势。“我们

“南门事件”现场

中计了！”队伍顿时大乱，只见“大癞”挥手一指桥堍方向大喝一声“冲啊”，我紧跟在“二癞”身后，和“红总司”十余人互相掩护从原路突围，好在接应的几十人从桥上冲来，我们成功突围。有七八个人挂了彩，我背上挨了一棍子，但我的洋镐柄也让对方三四个人挂了彩。回到沙包阵地，“二癞”对我头上利索地拍了一下，分明是对我的认可，我却对他报以一阵傻笑。战事还没完，另外冲入对方街区的十余人未能原路冲回来，他们从房子间隙和小巷冲向护城河游水逃回北岸，对方游泳好手在后面追。不料一支拖轮船队由东向西驶来，挡住了逃生者的去路，游在最后面的一个战友被对方抓住，被生生拖回南岸，我无能为力，顿时泪流满面。一天后两派的《红苏州报》大打口水仗。我方报道称革命小将经受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终被杀害，以通栏大号黑体字冠以革命烈士称号。让我们记住他吧：褚龙华，粮店学徒工，时年18岁。

在武斗中最先进的武器，当属仿AK47的全自动“五六”式冲锋枪。武斗当年我就已领教目睹了该枪血腥的一幕。我们有一支巡逻队，人手一枪，大都是由转复军人组成，队长是“大癞”。巡逻区域通常在双方防区的交叉地域，在一些城乡接合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分不清谁的地盘。时值8月下旬，按惯例半夜12点开始巡逻，我和同学新宝等几人想跟着去，被半路赶了回来，一来是资格不够，多半也是照顾我们学生的安全。我们返回时听到后方传来几声枪声，原来双方两支巡逻队不期而遇，黑夜中难以识别敌我，打着哈哈蒙过去了。偏偏我方走在队伍最后的一位兄弟按捺不住，在脱离的最后一步，信口一句“猪猡”！这让对方一员大汉突然醒悟，转身枪口直抵其胸口。这兄弟也甚是了得，抓住枪管向下猛按，几乎同时一串子弹出膛，四连发自胸至腹一条直线将其击穿，前后过程仅短短数十秒。第二天上午我们到苏州地区医院吊唁，他躺在太平间，全身赤裸，用一条白被单覆盖。我上前揭开被单，其脸纸一样惨白，自胸到腹，贴着4块白胶布。我调整情绪，对遗体三鞠躬。让我们记住他吧：张燕童，苏州红叶造纸厂工人，时年24岁。

停 战

苏州武斗惊动中央，周恩来为此两次做出批示，一是1967年8月3日凌晨1时，27军军部传达其电话指示：“听说在苏州医学院里两派打得很厉害，你们要立即派部队去解决，告诉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坐下来谈，立即把武斗停下来，不能烧房子，不能开枪，围攻的一方要迅速撤离。”为此，凌晨4时许，79师派出1600多名战士前往“苏医”解围，受到“踢”派阻拦，经反复交涉未果，只得返回。二是1968年1月29日0时周恩来第4次接见南京军区、江苏赴京代表团。凌晨1时总理办公室孙秘书电话传达了周恩来指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双方以同等数量的代表对苏革会、南通革筹会采取调整、充实、扩大。”自此，“苏革会”委员从12人一下增加到70人。

在苏州市军管会的组织下，双方头头集中到苏州驻军的玄母山谈判，再次对“权”和“利”在争论中重新分配，历时半年的苏州武斗悄然收场，没有一个确切的终止时段。不过我们“红总司”及旗下的各战斗队，还是整队集合几百人的队伍，打着横幅喊着口号，在浒墅关“踢”派的组织欢迎下，算是打回了老家。紧接着在上塘、下塘举行了全镇示威大游行。为安全着想，在母亲的关照下，我去了镇江老家叔叔家里住了整整两个月，到1968年1月初才回来，可见当年父母的良苦用心。

我必须坦言，在参与苏州武斗的经历中做过的事：我藏过一把刀。那是一把“三八”式步枪上的刺刀，并配有刀鞘，长约50厘米，是吴县人武部“明抢暗送”的。苏州市军管令的“九五”命令最后重申收缴武器，但我还是壮着胆子，躲过所有人的目光私藏下来。当时我们住在苏州市工人文化宫，在武斗结束后将其顺利带回了家中，心想着这是有纪念意义的，我父亲像躲瘟疫一样严令我交出去。我不肯，又藏了起来。后来在我下乡插队时我哥趁天黑将其扔到大运河里去了。

再要坦言的一件事和枪有关。武斗中我喜欢玩枪，为此没少挨“三癞”的头皮，而我第一次实弹射击，恰恰是“三癞”手把手教的。记得当天在工人文化宫南侧围墙外一片乱坟岗，我和同学天白、新宝等随“三癞”一起学打枪，因为只有他们才够格有枪。“三癞”极规范地示范一遍后，我把“三八”式步枪架在一棵杨树的枝杈上，朝东农田方向哆哆嗦嗦打了一枪，挨了“三癞”一记头

皮，显然不合乎要求。后来，开枪成瘾，一发不可收。据守南门人民桥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我常常对着斜对面西南方向苏纶纱厂高大厂房、露天阳台打枪，一枪过去，水泥墙上冒出一缕白烟，又一枪过去窗玻璃四散迸飞。3年后当兵，新兵第一次考核实弹射击，“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更好使了，我3发30环，连长把我上下打量了两遍，操着广西国语连说两个“好”，我腰板挺得笔直，接受到当胸一拳的奖励，几乎和当年“二癞”一个模式。此时我心中在暗暗感谢南门人民桥的日子。

反 思

最大的惭愧是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母亲。浒墅关离苏州仅9公里，武斗的那些日子，苏州城里城外枪声大作，特别到夜里更加清晰可闻。第二天坊间便会传出苏州夜里又打死了多少多少人，母亲天天心惊肉跳惶惶不安，叫老大、老三先后来看望我，劝返不成。她终于受不了焦虑的折磨，和我同学天白的母亲坐小火轮到苏州金门，再坐三轮车四下打听找到了“乐乡饭店”。先是看到了天白，他母亲自然一块石头落地。母亲问天白：“我家大块头(我乳名)呢？”偏偏天白打了个“磕巴”：“啊，大块头，大块头……好像刚刚在这里的……”他这“磕巴”不要紧，母亲只觉得眼前一黑，脚一软，幸亏有天白母亲扶着才没倒下。这时我也赶到了，印象中爽朗大气的母亲，我第一次看到她眼睛中闪着泪花，好似大病初愈似的，轻轻吐出几个字：“大块头，回家吧。”我的第一反应是哪能在大庭广众面前当逃兵，无知的我竟对母亲一阵呵斥，显得自己多么不怕死，多么听毛主席的话。母亲几乎是被我生生赶走的，连一口水也没喝！

母亲晚年，我蒙幸常常陪伴她。东说阳山西说海，她会极认真地和我探讨。歌里边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她会当真的一样，正色问我到底谁亲，我一个字一个字轻轻地在她耳畔说：天下爹爹姆妈最亲！母亲欣慰地猛吸一口烟长舒一气回答我3个字：“小赤佬！”我家6兄妹中母亲无疑是最喜欢我，那年，我也50多岁了，母亲用带着镇江口音的苏州话深情地对我讲：“大块头，你个小赤佬，你阿晓得，武斗咯年，我哭干了多少眼泪。”我联想当年乐乡饭店对母亲呵斥的一幕，禁不住像小孩一样一头栽进母亲的怀抱泣不成声。

“金门事件”现场

我毕竟在武斗中活了下来。但是，在苏州、在全国，有多少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有多少个家庭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溯 源

苏州武斗已过去48年了，很少有人愿意梳理，到底什么原因引发苏州历时大半年，涉众数十万，死伤上千人的大规模武斗？我集中剖析3个最根本的原因。

第一，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最大的群众组织“二七公社”时，在谈到河南两大派冲突分歧的同时，一句“文攻武卫嘛”语惊四座，全国形势突变。当时传达江青讲话，老实说她前面、后面还讲了什么，我现在都回忆不出来，唯这一句轻飘飘的5个字我记忆犹新。她的“文攻武卫嘛”一出口，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夜之间全国各地冠以“文攻武卫”的各种指挥部、司令部、战斗队纷纷武装了起来。古城姑苏难逃厄运。

第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

介入文化大革命。"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两军"是军管、军训。应该说,文革局面混乱,工农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起了很大的维持作用,但是支左这个重大举措,实在是个天大的失策。就苏州而言,事实上,"支""踢"两大派都得到了解放军的支持,都被认定为左派。支持"支"派的是27军驻苏州的79师,当时部队番号是苏州老少皆知的6307部队;支持"踢"派的是空4军及硕放机场空军,也是苏州老少皆知的"蓝裤子"及江苏省军区、苏州军分区武装部。由于两派都得到了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子弟兵的支持,双方都得到轻重机枪在内的真枪实弹。明抢暗送,解放军支左支到把枪支也献出来了,直接导致了武斗的升级。

"火烧赵天禄"现场

第三,面对新生的"苏州市革命委员会"产生的支持和反对的"支""踢"两大派为"权"和"利"争斗所致。文革把人性中的"恶"推上了极端,特别是到了夺权的阶段。1967年3月苏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全市从上到下各级权力机构,全部"三结合"改朝换代产生了新的"权"和"利",一起造反的弟兄在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面前,内心世界暴露无遗。必须强调的是,成千上万参与派别争斗、武斗的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在"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下纯粹是盲从,而惨死于刀枪棍棒之下的首先是他们。

盘 点

在此,我用沉重严酷的事实和触目惊心的数字向读者做一个全景式的交代:"支"派得到27军79师的支持,"踢"派得到空4军15师和苏州军分区的支持。两派头头在文革前可以称得上好工人、好干部、好教师、好学生,在文革中官至中央委员,省、市、县革委会领导。最后结局不外乎3种情况:一是被作为刑事犯判刑,甚至有一人被判死刑;二是作为"四人帮"在苏州的"爪牙""代理人"被判刑入狱,最重者长达18年;三是被定为"三种人"而被抓扣、审查、刑讯,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终了余生。

苏州武斗伤亡惨烈、破坏最大的是"火烧赵天禄"。1967年8月22日、23日"支""踢"双方在阊门外吊桥、占鱼墩一带激战,逐房逐街地攻防,最终烧毁商店25家,民房326间,上千居民无家可归,与石路毗邻的闹市一角,一夜间变成一片废墟。

自1967年7月28日至9月6日,"支""踢"两派分别从79师、苏州军分区、市人武部、吴县、昆山人武部、吴江部队农场、南京军区石码头仓库共抢夺各种枪支6600多支(挺),各种炮50多门,手榴弹2万多枚,子弹200多万发。两派分别在长风厂、阀门厂、冶金厂等(均为千余人部属大厂,有军工产品任务),用军用材料、器材自制了大量土枪土炮和手榴弹。

自1967年7月24日,在养育巷、观前、临顿路双方武斗死亡3人起,到1968年2月10日"娄门事件"止,苏州市大规模武斗持续6个半月近200天,从长矛、"古巴刀"、洋镐柄、铁棍发展到土枪土炮、手榴弹、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八二"迫击炮、"五七"无后坐力炮。

1967年9月12日,双方在驻军79师西大操场交换"战俘"191名。整个武斗双方共被打死187人,其中"支"派在"火线"被打死46人,"踢"派在"火线"被打死106人,双方互相俘虏后打死35人,被打伤的约1500余人,无辜被打死的居民群众30多人。

今天,伟人说了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们达成了依宪执政、依法治国的广泛共识,这是共和国成立66年最大的进步。但是历史不可忘却,如若不然,就对后代欠了账。■

(作者为苏州市物资系统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杜明明)

殊途同归的共享社会
——里夫金与马克思

○　陈启懋

近读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零边际成本社会》两书，受益颇多，并且感到有些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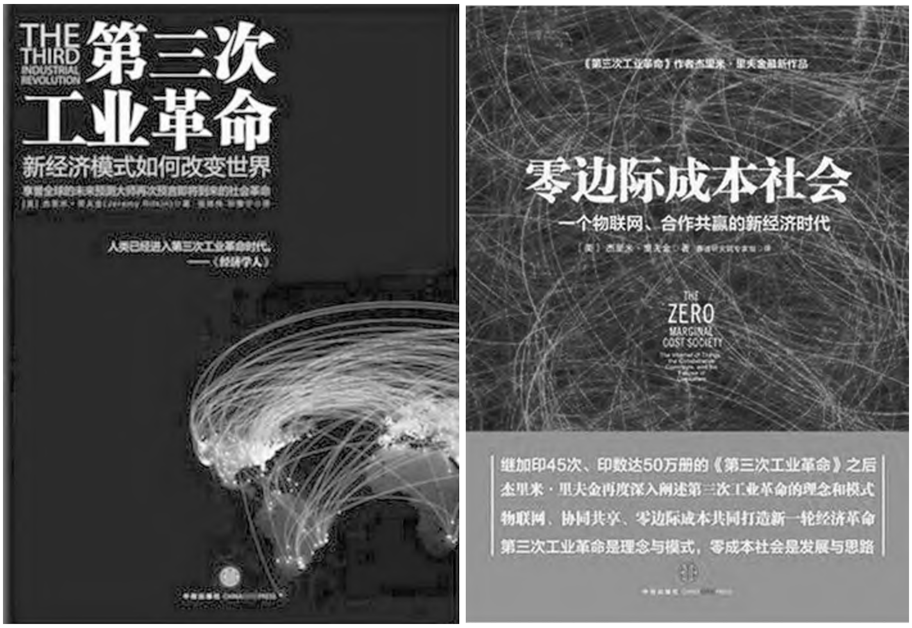
杰里米·里夫金现任华盛顿特区经济发展趋势基金会主席。他是当代享有国际声誉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发表过20多部著作，内容有关科学技术变化对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影响，已被译成超过35种语言，为世界数百高校、企业及政府部门所采用。里夫金还长期担任欧盟的顾问，并为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做咨询工作。他的意见受到政企学各界人士的重视。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德都肯定他对后碳时代发展模式的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零边际成本社会》是他近年来的著作，发表后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李克强总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刚一发表时就曾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密切关注”。两书的中译本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杰里米·里夫金

里夫金在这两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主要是：

（1）当今世界正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走向尽头、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兴起的历史交替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所以走向尽头，是因为它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都依赖化石燃料（石油、煤、天然气等）做基础，而化石燃料资源不仅总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更重要的是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使地球气候不断升温，会导致灾难性的变化，造成对未来生命的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威胁人类本身的生存。以可再生的绿色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紧迫任务（核能不安全，不宜用作化石燃料的替代物）。另一方面，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基础的互联网技术现已完全成熟。互联网革命正以急风暴雨之势席卷全球，深刻地改变着各行各业的面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可取代化石燃料的可再生绿色能源的技术也正日趋成熟，其成本不断降低。两者的结合，使第三次工业革命在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蓬勃兴起。

（2）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将在30年内完成，其内容包括大力开发和普及太阳能、风能、水力发电、地热、生物能源、潮汐能等可再生绿色能源：在所有建筑——公寓、办公场所、大型商场、工业园区直至每一户人家……安装小型绿色能源发电设备，就地收集绿色能源，为整栋楼房供电，使千百万建筑都成为微型发电厂，同时相应地普遍建立绿色能源的储存库，以保证稳定供应；用互联网技术把所有分散的大大小小的发电厂连接起来，建立贯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以至全球的能源互联网；用可再生能源的电联网改变全部用化石燃料做动力的由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构成的全球交通运输系统。这些基础设施构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



里夫金著《第三次工业革命》和《零边际成本社会》

撑，其核心是由日趋成熟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与飞速发展的互联网再加上日益扩展的物流网融合而成的智能物联网。这个伟大工程完成后世界将大变样。

（3）物联网革命导致的“极致生产力”（里夫金所说的“极致生产力”似指科技革命已把原来的生产力发挥到了顶点，技术的潜力已挖掘殆尽，但新的生产力——技术还会产生。所以不能理解为生产力发展已到了尽头。）将使整个经济体内生产和分销商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逐步降低至趋近于零，从而形成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Cost Marginal Society）。现在，信息互联网的发展已使通信成本趋于零；全球已有超过1/3的人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以近乎零的成本进行通信、交往，并生产和交换信息，包括文字、音频、视频……可再生能源的电联网的建成和普及将大幅度降低能源成本并使其逐渐接近于零。近于免费的廉价能源和3D打印机、智能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的推广，特别是互联网与制造业、服务业的结合，不仅会使千百万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将大大降低一切产品和服务的成本。今后几十年内，全球经济将逐渐进入一个商品和服务几乎免费的时代。

（4）物联网革命和能源结构的变化还将改变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和权力结构。政治文明、权力结构受能源结构、机制的影响很大。化石燃料资源的稀缺性、集聚性（只在特定地域出现），需要政府动用大量武装力量来占领矿源，并以持续的地缘政治运作来确保其安全，需要中央集权，需要聚集大量资本对其进行开采、加工和运输。这样就产生了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大财团、大银行、证券交易所，以及争夺资源，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等等。而新时代人类依赖的绿色能源的遍布、取之不竭、可就地取材等特性，使传统的那种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模式成为过时的东西，而由新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按社会节点组织起来的、分散的扁平化权力结构取代。互联网将把这种分散的结构融合为有效运作、紧密联系的整体。地缘政治将向包容性的生物圈政治转变，全球将形成若干欧盟式的洲际政治经济联盟，如北美联盟、南美联盟、非盟、亚太联盟，等等。

（5）零边际成本时代的到来将使人类社会发生颠覆性的大变化，资本主义模式将逐渐消亡而由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的新社会经济模式取而代之。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追逐利润，利润枯竭时资本主义的生命就到了尽头了。当社会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资本就无法生存，必然要为另一种新的经济社会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就是协同共享。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来就存在。如各种产销信用合作社、公益性的慈善机构、基金会、文化体育团体和医疗机构、农村里的共耕社、社会团体和其他一切能够生成社会资产的非营利性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组织。目前的社会中资本主义制度起主导作用，协同共享模式只起辅助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零边际成本的逐步形成，资本主义的作用将逐渐减退，而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的作用将日益加强。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体现协同共享模式的新生事物正在蓬勃发展。数以百万人计的人的思想和生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他们不仅自己发电并以近乎零

边际成本的方式制作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信息、绿色能源、娱乐和3D打印产品，成为新型的“产消者”（prosumer），而且，他们还通过社交媒体、合作组织、租赁商以极低代价共享汽车、住房、服装和其他物品。在一些年轻人的观念中，“私有权正让位于使用权”（“只要能方便使用，何必一定要自己拥有”）。当“产消者”在协同共享中分享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时，市场上的交换价值就会逐渐被协同共享下的“共享价值”所取代，市场经济也就逐渐淡出社会生活了。预计到21世纪中叶，协同共享模式将占据主导地位，而资本主义经济则逐步退居发挥辅助作用的地位。最终资本主义将消逝而为协同共享的新社会模式所取代。

（6）随着协同共享社会的形成，人类将进入合作时代、新文明时代，进入生物圈生活方式。在协同共享社会中，物质极大丰富，摆脱了繁重体力劳动的人类将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把更多精力转移到对人本身的关爱和参加公民社会的各种活动。包括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旅游、社会活动等方面在内的“关爱和体验业”将得到充分发展，所有人的合理物质需求都能得到满足。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的思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协同共享的生活条件下,私有观念将逐渐淡化。专利、版权也将淡出经济社会生活。过去基于物质地位的社会差距将缩小、消失。人类将克服过去几个时代形成的血缘认同、宗教认同、民族（国家）认同、社会（阶级）认同和旧时代遗留的种种消极的事物，如社会不平等、权力斗争、社会动荡、战争、种族灭绝……而“进入生物圈意识，将认同感延伸到把整个人类作为我们的大家庭，把我们的同类生物作为我们进化家庭的扩展”。也就是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时，人类才真正“从求生状态中解脱出来，享受生活并在社会知识领域里自由翱翔，探索、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

里夫金说的“协同共享”模式，现在似乎有些难以想象。但他用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实际事物进行了论证，很有说服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汽车共享。2012年美国就已有80万人加入了汽车共享俱乐部。会员凭智能卡就可以调用该俱乐部在不同地方、不同城市的停车场的车，既便宜又方便，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欧盟国家的汽车共享服务现有会员70万人，预计到2020年将有200多个汽车共享服务机构，会员人数将达到1500万。据预测再过8年左右，无人驾驶汽车将实现商品化。届时汽车共享将得到大发展。试想，如果任何人只要付低廉的费用，就可以用手机调用汽车共享服务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并借用GPS导航毫不费力地到达目的地，那么谁还一定要拥有需要花精力进行日常保养的私家车呢？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里夫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书中很少引述马克思的言论。但他从现今西方社会的实际出发，用大量实证、数据论证了未来社会的发展，得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大致相仿的结论。

第一，里夫金提出的协同共享社会，原文是Collaborative Commons。common原来是形容词，意思是公共的。作为名词的commons可解释为公共地、共有的、共有权（共同使用和享有的权利），其含义似与公社相近。这样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一切合理要求都能得到满足的协同共享社会，不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吗？只不过里夫金是根据发达国家最新的发展情况得出的结论，并把这个社会的特征刻画得更具体些，而这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难以做到的。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从事实出发得出了与马克思相似的结论，这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科学性，有助于坚定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

第二，里夫金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物质极大丰富，商品、服务的边际成本接近于零时将会自行消亡（原文是eclipse，意思是：消失、消逝）而不是被外力消灭。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的思想相悖，但与马恩晚年的思想十分接近。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1848年前后）曾主张用暴力推翻、消灭资本主义。但到1859年，也就是11年后，他们已认识到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其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在资本主义还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时企图用暴力加以消灭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样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他们早年的用暴力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到了晚年他们更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有其“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人们即使探索到了这种规律，也不能跳过或

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指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酝酿着自我扬弃的因素，提出股份制可以作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和途径。恩格斯根据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经验，指出在民主制度健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这些都说明马恩晚年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遗憾的是后来有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没有能够认真领会、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他们无视马恩晚年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死抱住马恩早年的已被他们自己否定的用暴力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不放，并不顾实际情况盲目生硬地加以实施，其结果是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另一方面，那些被列宁和共产国际批为“修正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叛徒”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开展工作，倒是取得很大成绩，其中很多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推行了有利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政策，推动了社会进步。他们的路线政策，是符合马恩晚年的思想的。里夫金关于在生产力高度发展、边际成本趋于零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将自行消亡的论述很有说服力，有助于我们防止与克服“左”倾冒险的错误思想，更自觉地按照自然的客观的发展规律推动社会进步，为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而奋斗。

第三，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恩格斯也说过：我们要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现未来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具体描述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新社会的因素、胚胎。

里夫金关于发达国家在新的科技产业革命推动下协同共享模式的蓬勃发展的描绘，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的论述具体化了。他列举的种种协同共享的经济模式，例如各种合作社，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经常看到的。里夫金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一类公益性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由公民社会创建的机构、活动概括为协同共享模式，而且有说服力地指出这种模式正在发展壮大，到本世纪下半个50年有可能逐步取代资本主义模式。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认识今天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素不断生长的形势，从而认清世界在转型中发展前进的大趋势，树立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第四，里夫金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现有权力结构、政治运行模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论述，符合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必然会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他在这方面虽然没有能够具体展开论述，但也可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任何政治体制都是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而变革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模式，没有万世一系的永久“王朝”。

里夫金熟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分析、推断主要建立在研究发达国家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对迄今仍占世界人口2/3以上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他并不是很熟悉。他曾应邀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评价很高并有很高的期待，认为中国有可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在前列，但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很了解。里夫金也不是一个国际问题专家，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南北差距、各种复杂的矛盾、地缘政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因而他对世界转型发展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曲折性难免估计不足。然而尽管如此，他的研究是建筑在扎实的实证基础上的。他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零边际成本社会》不同于一般未来学者对未来世界的构想，更不是科幻作品，而是具有很高理论价值和很强的实践意义的前瞻性著作，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周有光老人要我们从世界看中国。无可否认，目前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前面、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前景，我们才能看清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更清醒地认清我们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才能更好地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较快、较顺利甚至跳跃式地转型前进。里夫金的这两本书可以在这方面给我们启示。■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杜明明）

我读《阎明复回忆录》

○ 胡德平

明复同志这本96万字的回忆录内容充实，他感人的家庭历史和书中丰富的史料，都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尤其是其中对中苏关系、十年文革和改革初期的历史回顾，值得人们仔细研读。

我是在1986年调到统战部的，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3年。那时统战部是全国党政部门中最活跃的部门之一。今天到会的我们当年在统战部工作的老同事就有5个人，刚才斯亮大姐说的话非常好，我本来想对统战部的事再说一点，为了节约时间就不说了。当时各界的统战工作对象列为10类，统战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党外各界朋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给工商界人士摘下资本家的帽子，真是拨乱反正，视民如伤。同时，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中心、一国两制等问题，统战部还团结了大量的港澳台朋友及海外侨胞，真正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振兴中华而全力奋斗！当时工作最投入、最繁忙的人，非明复同志莫属。我记得在1986年年底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前夕，明复同志发着低烧，却仍坚持为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夜操劳。现在想来，3年的时光真是太短暂了，若能再多若干年，我们党的统战工作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

对于明复同志的回忆录，我首先阅读的是中苏关系从结盟到破裂那个时期的回忆。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明复同志写道："这部分回忆，气势恢宏，规模盛大，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而构成这部回忆录主线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我因置身其中，见证了这段历史全过程而感到荣幸自豪。"这段历史确实太重要了，这本回忆录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是关于中苏关系的这段历史我读过了，我想谈3点学习体会。

一、中苏人民的友谊不可忘却

中苏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友谊是不能被遗忘的，更不能因两国曾经的不愉快经历而刻意抹杀这段历史。

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大型项目，初步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从书中援引的材料看，斯大林当时讲过这样的话：向中国派的人，不仅要传授经验和知识，而且要知道还能从苏联要些什么；所以派出去的人不仅是本行业最优秀的专家，而且应该是胸怀全局的人。回忆录中是这么引用的，而且这一精神付诸实践，苏联派专家高峰时期曾达到1390多人。专家们经常告诉中国的同行，除现有的工程、设备材料，你们还缺什么资料，哪些方面还要增加专家，只要中方提出来，这些申请就会很快得到满足。往往这些新增加的资料，会整车皮地运往中国。1951年因苏方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撤换了十几个部长和副部长。

当然，苏联不是无偿地给中国这些援助的。中方支付苏联的货款，每年高达1亿到1.2亿美金，这都是侨汇所得。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每年支付1亿到1.2亿美金，折合到现在是多少钱！1959年至1960年，我国的侨汇发生了变化，便以黄金换取外汇支付苏联。大跃进期间，苏联专家从纯粹的经济技术观点提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很多无疑是正确的，比如小高炉问题、厂长与党委书记关系问题、革命热情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苏联专家看不起群众运动，我觉得这是苏联不对，但他们也不是恶意的。对我们的党委在

作者与陶斯亮（中）、邓榕（左）在《阎明复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

工厂里一切说了算、不强调物质利益，人家提出批评，我们的观点不一样，这不是恶意的，但我们还是难以接受，彭德怀还要挨批。在大跃进造成饥荒以后，苏联确实要给中国100万吨粮食，这能救活多少人！原来我听说过这一情况，不敢相信，现在明复这本书说了这个事，我觉得应该相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家冷静了不少。1982年，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阿拉木图发表谈话，希望跟中国恢复关系，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1984年，阿尔希波夫[注]访问中国。当时有一种说法很好，阿尔希波夫以中国大使馆客人的身份访问中国，我们不欢迎，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我们是欢迎的。这是一句很真诚的话。阿尔希波夫来华后，见了很多当年的老朋友，他回国后写了很多回忆文章。这个工作也是国际统战工作，就是这么一句话，对于中苏两国之前的那些矛盾、争论，大家释然了不少，我觉得很好。明复同志在回忆录中写了一些很生动的故事。例如，因为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专家只要拿着工作证，一个小红本，在中国出入哪里都没人限制。当时从鞍钢来北京的几位苏联专家，问中共中央在哪，问中南海在哪，问毛主席在哪，中方工作人员都为其提供了方便，最后真的见到了毛主席。这是很生动的细节。另外，苏联有教条主义，刘伯承元帅学苏联经验挨批了，刘帅说道：对于教条主义，不要怪老师，应该怪我们学生，人家的经验你自己分析，我们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有自己的根据地，我们建国了。刘帅的话多么智慧。明复同志书中的这些细节又唤起我们的回忆，当然两国之间不是没有矛盾，但这些好的东西要记录下来。

二、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

中苏论战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我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阎明复回忆录》有史料有史论，看完这本书我的认识有了提高。是否可以说，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谈不了，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非要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非要最后动“核手术”“外科手术”，真是没必要。是中国指责苏联变为修正主义更接近实际，还是苏联指责中国教条主义更恰当？如果苏联不是对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不搞实质性变革，为何30年后垮台了呢？如果中国共党不受教条主义影响，为何以后“左”的思想日益发展，最后竟然演变为十年浩劫呢？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让许多爱想问题的中国人完全搞清楚。明复在回忆录中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有所回答。从书中我们知道，刚才李静杰同志也说了，2009年11月受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邀，阎明复、李静杰、张德广、李凤林用了4个半天，向江泽民做了汇报，陈述了中苏关系变化的过程，并形成了文字材料。希望党中央在适当时机对中苏关系这一严肃的、重要的问题做一个总结，有一个说法，哪怕组织几次认真的讨论也好。起码明复同志的这本书就是一部记录详实的资料，这些同志还健在，抓紧时机总结出几条，已成为一项必须要做的极有意义的工作。

明复同志从一名重要的、内行的俄文翻译，后来成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1989年5月16日，经小平同志同意，阎明复参加了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判。邓小平当时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的空话。”“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话都

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我认为邓小平同志说的“实质问题”是符合实际的。明复在回忆录中说到师哲同志要离开俄文翻译工作时，就透露了党中央领导人真实的感情。这是理解中苏关系的一个脉络，小平同志说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突破口打开了。明复同志写道：“中苏大论战脱离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成为一场‘空对空’的论战。”这一分析与邓小平的观点完全一致。书中又说与会者一致认为中苏大论战是一场“空对空”“左对左”的论战，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态度更加鲜明，这种认识则又进了一步。而我认为这种认识还应该继续研究下去，但是不是“空论”，要作为经验教训，让中国的党员和老百姓基本上有比较多的正确看法才好。

三、中苏论战中一些新的思考

总结中苏论战这一历史事件的新思考，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讨论中苏论战时，与会者的一些观点，是我原先从未想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使我对这一论战的复杂性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如说赫鲁晓夫是“左”而不是右。大论战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极左反对赫鲁晓夫的“左”。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是有批判的，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动，但是对斯大林内外政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理论体系的基础，基本上继承下来了。回忆录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这是新的提法。为了重新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上这些观点，我认为提出来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要把历史问题搞清楚，就要有新的眼光。这对我们是有利的，是有建设性的思考，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好。

有人认为大论战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第一，中国彻底摆脱了苏联的控制；第二，打破了苏联在国际共运中一统天下的局面；第三，为中国独立于苏美的国际战略地位创造了条件。但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同志认为这是歪打正着。对此我想说：何止是歪打正着，“有积极意义”很难说有什么逻辑！自从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我党就开始寻找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这才是逻辑的必然，苏联的赫鲁晓夫下去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却越找越多，不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这么多，所以我觉得不要说歪打正着。

后人评论前人确实是很困难的事，也是必须很谨慎的事，但历史无情，后人评论前人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总结这段历史，对今天来说，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正如书中一语道破的那句话：“中苏大论战的实质是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毛主席压根看不起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他是国际共运的当然领袖。”“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我认为这本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材料，而且明复同志可谓是当时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他写出来更可信。

在明复同志的领导下，我们曾在一起工作，我觉得如果这个会再开放点，中央统战部的老人会来得更多。衷心希望明复同志爱惜身体，健康长寿。感谢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注释：

注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1907—），20世纪50年代，作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总负责人，在中国工作8年。80年代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深入发展两国经贸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双方签署的文件对于推动此后的俄中经贸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全国工商联原党组书记）

（责任编辑　王彦君）

严正声明

近期发现网上流传着一些《炎黄春秋》Word格式的电子版，该行为系盗用我社的名义，且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篡改并恶意传播，严重侵犯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及作者的合法权益。我社将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炎黄春秋杂志社

中苏关系史的权威之作

○　李静杰

《阎明复回忆录》问世，这是广大读者期待已久的事，是值得庆贺的喜事！

几年以前，当阎明复同志在三亚撰写他的回忆录时，我有幸阅读了他的初稿。一周以前，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在首发式上做一个发言。我想，这不难，我只要看看目录，凭记忆就可以写一个发言稿。但是，当拿到新书以后，书中的每一章都把我吸引住了。我花了3天半的时间，把书从头到尾重读了一遍。

《阎明复回忆录》从他的童年写到20世纪80年代末，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内容非常丰富，但是涉及最多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这方面的内容占全书的70%以上。目前，我承担了研究1949—1991年中苏关系史的国家课题，这与《阎明复回忆录》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基本上一致。几年来，我大量搜集和阅读了国内外有关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著作。在这里，我想把《阎明复回忆录》与国内外已经发表的著作加以比较，看看《阎明复回忆录》有什么特点，它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第一，从1952年陪同刘少奇参加苏共十九大并见到斯大林，到1989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作者参与和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为了完整和真实地再现历史，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引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一些原始记录，通过《阎明复回忆录》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所有这些大大增加了该书的真实性、史料性和权威性。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没有类似的著作，当然今后也不可能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阎明复回忆录》在国内外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鉴于该书内容之丰富和可信度之高，中苏关系的研究者，会将此书放在案头，经常查阅。我还相信，《阎明复回忆录》将在国外引起广泛的兴趣和反响。

第二，众所周知，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对中国国内的发展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自上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以后，中国人一直在走俄国的路。即使到现在，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也还不能摆脱一个“苏联问题”。《阎明复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全面援助中国的历史。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阶段。记得在阅读《阎明复回忆录》初稿时，有的同志曾提出，有关苏联专家在中国全国总工会讲课的内容太多、太具体了，要不要删减一些。我说，这些内容非常宝贵，而且越具体越宝贵。看了这些材料，你才能知道我们的一些理论体系和制度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才能知道我们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说，《阎明复回忆录》不仅是研究中苏关系人员的必读之作，而且对研究党史、国史，对学习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三，《阎明复回忆录》首次比较科学和全面地回答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中苏两大国从结盟最后走向分裂，这是冷战年代国际关系中的最大事件，对两国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国内外有许多论述，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以外，还由于许多内幕还不为人所知，有些问题还处于敏感状态。探讨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这是个世纪性课题。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下决心改善中苏关系。他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原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组织研究苏中关系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两国关系破裂的原因，以便为苏共中央制定新的对华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阿尔希波夫不负重托，组织众多苏联学者和当事人进行讨论和研究，最后形成

一个《总结》报告。阿尔希波夫对中国非常友好，上世纪50年代任苏联在华总顾问长达8年之久，与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作为翻译的明复，深得阿尔希波夫的厚爱和信任。1995年夏天明复访俄时，阿尔希波夫出于对俄中关系未来发展的期待以及对明复的友情，把《总结》报告的内容告诉了他。《总结》报告的基本观点是：苏中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苏联，是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压力造成的。江泽民主席在得知《总结》报告的内容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要求大家研究："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方面有什么责任？"为了回答江泽民主席的问题，在明复的领导下，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围绕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和中苏大论战，在京东的燕郊分别举行两次大型研讨会。我负责会议的组织工作和文字工作。参会者包括参与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外交部和中联部的领导、中央领导的翻译、参加撰写"九评"的"秀才"以及研究中苏关系、国际共运的学者。特别应该提及的是，杨尚昆同志对研讨会也非常关心。明复及时向他汇报讨论的情况，对于他就一些问题发表的看法，明复也及时向我们传达，这样就形成了会内和会外的互动。研讨会结束后，由我执笔，把大家发言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两个"纪要"，题目分别是：《对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再认识》《如何认识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总的结论是：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的责任更大；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的责任更大。仅从中苏各自参加讨论的人员构成来看，苏方的《总结》报告和中方的两个"纪要"无疑是相当权威的，结论也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后来，江泽民主席和其他中央常委同志看到了两个"纪要"，高度评价了研讨会，并表示"完全赞同""纪要"的观点和结论。《阎明复回忆录》把中苏两个方面的总结都收了进来，使过去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的材料公之于众，从而引发更多的人去思考这些重大问题，这是《阎明复回忆录》又一新颖之处和贡献。

1957年阎明复随毛泽东访苏。克里姆林宫警卫局局长扎哈洛夫少将身后为阎明复

上述两次研讨会以后，明复又提出一个建议：把俄罗斯方面苏中关系的当事人和学者请来，双方坐在一起，共同总结教训。为此，我两次出访俄罗斯。遗憾的是，当时俄罗斯形势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苏中关系的当事人和学者分成了不同的派别，不愿坐在一起开会。结果，明复的意愿未能实现。

明复为人谦虚，保持低调。他常常说，"我只是一个小翻译。"从《阎明复回忆录》来看，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的历史，他不仅掌握丰富的资料，而且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阎明复回忆录》堪称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史的精品力作，权威之作；明复堪称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史研究的带头人和开拓者。

当然，《阎明复回忆录》也不是完美无缺，还有不足之处，特别是，他一生中一些重要的经历没有包括进来，作为"回忆录"是不完整的，希望今后能够补上。■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王彦君）

宋庆龄与新闻界

○ 汪大波

新闻应坚持真理，传播真实

“现代收集和传布新闻的设备有了高度发展，但是人们往往不知道怎样去应付浩如烟海的新闻，而不致给埋在里面，忽略了以前的一切……人类坚持不懈地谋求一个没有苦难的社会和世界。但是人类的前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它趑趄、停顿，甚至挫折……既有真的新闻，也有所谓的新闻；既有真的历史，也有所谓的历史……真理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就在你发现那揭橥、保卫和促进人类事业的地方。”这是宋庆龄在《漫谈新闻与历史》中写下的话。文章发表在《新观察》杂志1956年第23期。

《真实报道的传统》是宋庆龄谈新闻工作的另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国建设》1962年第一期。她在回顾《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的历史时写道：由于“国民党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发布实行严密的检查。保卫中国同盟感觉到应该承担起向全世界传播我国的真实情况的职责。我们把报道实际情况作为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这两篇评论，宋庆龄对新闻工作的观点跃然纸上。那就是：一、新闻与历史紧密相联，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二、新闻工作者应当坚持真理，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发展；三、新闻报道必须真实，传播真实情况。

运用新闻反对专制，保卫人权

早在1911年，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读书时，她就担任了校刊编辑、文学社通讯干事。当时她还是个18岁的女大学生，在校刊上发表了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文章，满腔热情地赞颂中国辛亥革命的胜利。

大学毕业回国后，宋庆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夫人和助手，重视发挥新闻舆论的作用，她团结组织国内外的新闻报刊和新闻工作者，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支持北伐，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中共的好朋友。

牛兰夫妇是国际红色工会在华的代表，协助中国革命的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判了死刑。1932年7月，宋庆龄组织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营救牛兰夫妇。委员会中有鲁迅、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还有著名新闻工作者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上海《大陆报》记者蒂尔曼·德丁、上海《大美晚报》主编T.O.撒克里、《中国论坛》主编伊罗生等。宋庆龄通过中国和国际的新闻舆论向国民党当局施压，迫使法院对牛兰夫妇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牛兰夫妇最后逃出了监狱，被宋庆龄秘密掩护出国。

迫害国内的“政治犯”，是反动政权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一贯政策。1932年12月，宋庆龄同鲁迅、蔡元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国民党老党员、曾任孙中山秘书的杨杏佛等人一起，组成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和宗旨是：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当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判处制度……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同盟”协助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以宋庆龄为首的“同盟”成员，冒着白色恐怖，积极开展营救全国政治犯的活动。成功营救了中共党员廖承志、红军将领陈赓、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新闻工作者刘尊祺等人。据刘尊祺回忆：他从偷送进狱中的报纸上看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的消息，和《中国论坛》报对“同盟”的介绍，就同狱中难友商议，由刘澜涛用英文给宋庆龄写信，揭露关押他们的所谓“反省院”是一座军人监狱，“犯人”都是

社評
從智利斷交看盟國前途
華府注意物資援華
「中國之命運」
蔣委員長新著
現已付印下月發行
英機襲緬
邱吉爾
立法院昨開例會
通過新聞記者法
所得稅加重稅率
新幾內亞續有戰鬪
敵攻穆播與瓦阿間敗退
太平洋美潛艇沉敵艦輪
豫災實錄
總動員會設立
軍法執行監部
經建動態
兵役署

《豫灾实录》

未经审讯、宣判就被无限期关押，受到残酷的折磨。他们要求释放出狱，上东北前线去抗日救国。宋庆龄看到信后，立即交给《中国论坛》公开发表，同时派“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带领调查组去北平，向当时掌控北平军政大权的张学良陈述。几个月后，张学良释放了新闻记者刘尊祺等所谓“犯人”。

宋庆龄在一篇文章里旗帜鲜明地写道：“争取民主权利和争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

1933年，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残酷杀害工人领袖和知识分子。宋庆龄和鲁迅、杨杏佛、史沫特莱、美国新闻工作者伊罗生等代表民权保障同盟，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去当面提出抗议。宋庆龄在列举了德国纳粹摧残文化，残害人民，侵犯人权的事实后，义正词严地指出：“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如《世界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钳制……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表示抗议。”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史良、邹韬奋等7位领导人，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宋庆龄广泛组织新闻媒体和新闻工作者营救坚决主张抗日的“七君子”。邹韬奋是进步报刊《全民抗战》《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的创办人，是国内外著名的新闻出版工作者，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领军人物，也是宋庆龄的挚友。宋庆龄挺身而出，通过媒体传出她本人《为“七君子”被捕而发表的声明》，公开驳斥日本报纸《每日新闻》对她的种种攻击和诬蔑，尖锐地指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政治主张是“全国人民不分政治信仰或党派，成立统一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她还多次在上海《中国呼声》刊登题为《援助中国》的通告，争取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援。那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的通讯地址就是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全国各地的来信来稿，均由宋庆龄通过《中国呼声》主编秘密转交给《救亡情报》。1937年2月，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央全会发表演说，大声疾呼：“救国必须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宋庆龄从国民党中央的讲坛上走下来，又立刻投入保障民权的斗争。她带着铺盖，同其他社会知名人士一起来到国民政府苏州监狱，要求把她自己也关押起来，和爱国抗日的“七君子”一起坐牢受审。宋庆龄这个震撼中外的“救国入狱”行动取得了胜利，救出了邹韬奋等7位爱国民主人士。

新闻就是要坦率而无所畏惧

1941年至1943年河南那场历时两年，饿死几百万人、祸害殃及3000万河南百姓的大灾难，中国新闻界率先采访报道的是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他采访写出了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1943年2月1日《大公报》改题为《豫灾实录》全文刊登。通讯具体记述了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出现狗吃人、人吃人的人间地狱惨状。通讯还报道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河南依然强征暴敛，使天灾又加上了严酷的人祸，百姓苦不堪言。紧接着《大公报》2月2日又刊登

了该报负责人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指出：读了那篇通讯，知道了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任何硬汉都要下泪。《大公报》的通讯报道与社评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也触怒了蒋介石政权当局。就在2月2日的当晚，中央军委会悍然下令惩罚《大公报》停刊3天，接着又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记者张高峰。

查封报纸、抓捕记者，是全世界公认的法西斯暴行。《大公报》被停刊及记者被捕事件，引起了宋庆龄的极大关注和愤慨。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随即去河南调查、采访，证明张高峰的报道属实。面对河南空前饥荒死人的残酷现实，宋庆龄毫不含糊地给《时代》周刊记者写了条子，支持外国记者去面见蒋介石反映真实情况。她给《时代》记者的信中说：“我想对你建议，你在写报道时要像对我谈的时候一样坦率而无所畏惧。如果因此而倒霉受罪，也不要泄气，否则局面就不可能有丝毫改变。”这是当年被称赞为“中国的良心”的宋庆龄发出的正义之声。受到宋庆龄的鼓励，《时代》周刊记者写的新闻报道，于同年3月在美国发表，把河南大饥荒真相捅到了全世界。蒋政权对外国人的声音还是有所顾忌的，在舆论压力下，当局被迫妥协，记者张高峰得以出狱，在河南被“管束”一年后，回到了重庆。

日寇侵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香港，迅速组织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团结了大批不同阶层、不同政见的人士，结成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有效地开展了抗日救亡工作。她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向全世界传播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为保卫中国而战。她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题为《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一文，引述孙中山的言论，强调中国必须加强内部团结，发展经济，才能抵抗外来的侵略，“建立一个新时代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依然十分重视新闻工作。她创办了《儿童时代》，由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办，多次为该刊撰稿，指出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人类的未来，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她还创办了《中国建设》，多次发表署名文章，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崭新面貌，传播中国人民热爱祖国、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的声音。

她同新闻工作者有缘有情

宋庆龄一生都伴随着与新闻人的情谊，始终支持和保护中外新闻工作者。她和外国记者史沫特莱是情同姐妹的知心朋友。史沫特莱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长达7年，有5年时间奔波于抗日战争第一线，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原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安排自己的秘书帮助斯诺把一些有关陕北的资料翻译成英文，并且写信介绍斯诺去延安，写出了震撼世界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1972年2月，宋庆龄知道了斯诺病逝的消息后通宵不寐，亲自起草唁电说：“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他在我们抗战期间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心中的记忆将永葆常青。”她还派秘书张珏代表她去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参加斯诺骨灰安葬仪式，向斯诺致敬。

宋庆龄敬重中国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香港沦陷后邹毅然去新四军工作，1944年7月病逝。宋庆龄领衔发起在重庆为邹韬奋举行了追悼会。她和邹韬奋夫人沈粹缜成为好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粹缜担任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后被聘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秘书长，任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沈粹缜都应邀去宋庆龄家中做客。

《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是宋庆龄为悼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新闻工作者金仲华而写的文章，发表在1981年第2期的《中国建设》上。她写道：“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多少对无法无天者的控诉，多少对封建法西斯的谴责，深含在沉抑的话语之中！

宋庆龄一生，既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一位杰出的人民领袖，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她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坚守着她的办报办刊原则。她是中外新闻工作者的挚友。■

（作者为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杜明明）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　张郎郎

编者按：遇罗克先生离开世界已经45年了，我们请当年跟他同一个牢房的张郎郎先生写了一段回忆，以飨读者。

中学文革报

毛主席語录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

創刊号

1967年1月18日

出身論

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中学文革报》发表的《出身论》文章的部分截图

一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二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所在的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7筒1号。

K字楼每个房间大概是不到20平方米，关了20个犯人，当时疑犯太多了，牢房里最多住22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身。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

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当时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院儿里，有三个建筑。一个是三层建筑的K字楼，据说从天空中看下来是个字母K。犯人们传说，在战争中看到K字或十字的建筑，就不予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都无法逃生。

我进到这间牢房没两天，就有犯人向我介绍遇罗克也在这。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遇罗克一开始并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那年才24周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我是因为讲了些江青的段子，又因为学西方艺术史专业想去法国留学，被公安定罪"恶毒攻击领导人""叛国投敌"判处死刑的。牢房里多数人是愁眉苦脸，而遇罗克却是笑眯眯的。

他略带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我叫遇罗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这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的人。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模样。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摇头晃脑地吟诵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三

遇罗克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肯定"门儿清"。

他只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什么、积累些什么，只想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

好在我也并不在乎别人重视不重视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于是，我和他定了合同：每次休息时间，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牢房刚刚从别人那儿趸过来的。他通过给我讲解来复习这部分知识。我的天，他真的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不吃亏，从他那儿又学了复习功课一招。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纯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看那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萨特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全是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了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没生气。

他至少有一个理想的投射点，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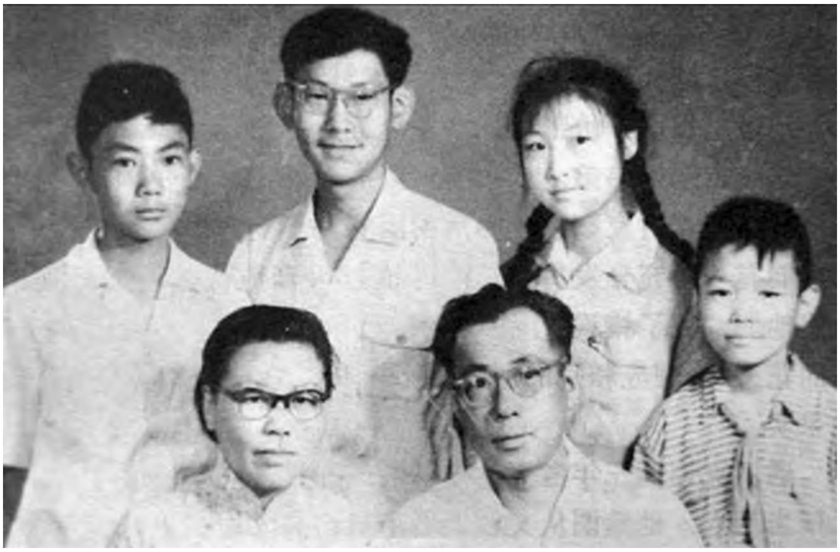
那些天，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屋的石厚刚先生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泽东选集》。

石厚刚先生是当年陕北的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因为他去延安学习过，所以才有这部《毛选》。石厚刚却不肯把这部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只得托我想办法。

石厚刚知道我是生在延安的，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在我软磨硬泡下同意把这部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厚刚被提讯走了。

遇罗克趁这个空当，赶紧让我借给他看这部秘籍。我悄悄递给他，让他千万别明目张胆。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版本对照着看。读得很认真，一字一



遇罗克全家福

句像校对似的看。时而若有所得地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

石厚刚回来之前，遇罗克赶紧把书还给我。后来，不知是被石厚刚发现了，还是别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厚刚先生的书从此就不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悄悄对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们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时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五

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吃完早饭，遇罗克都会打报告——这是犯人向政府提出申请的唯一方式。他向管理员提出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犯人留存纸笔的。

他说："我要写思想汇报。"

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看守都会答应他。他利用这个方便，一面写些应付预审员的材料，一面乘机写下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写好以后裁成小豆腐块儿大小，以便保存。

我们俩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诗词歌赋，都一一尽录其中。几个月下来，数数也有三四百首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

星期天，我们利用法定缝补时间的机会——这时候政府才发给我们针线，于是就把这集子装订出来两本，我们一人存留了一本。

一些同号的犯人也偷偷借去传抄。休息的时候，我们默默地念着、背着，眯缝眼睛浮想联翩。仿佛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隐隐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景色，那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在不自由状态下的小小精神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企图带出监狱。可惜在例行搜检牢房时，竟然被搜走了。在牢房中没有长久的秘密，很难隐藏任何东西。

晚饭后，犯人们可以三三两两地散淡聊天。有一段时间遇罗克和我一起议论诗词创作。我对现代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古朴的韵味。只有具备中国文化根底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体会到这些精髓，也只有以这种形式才能表达出中国人的感受和情操。

我不愿意和他下象棋，因为这儿比从前那个号管得严得多。我没敢做象棋、画棋盘。所以只能下盲棋。他仗着记性好，胡走一气，一会儿就把我绕晕了。

他似乎脑瓜里有个电脑储存系统，还装了一脑子棋谱。别说"橘中秘""梅花谱"那些名谱，就连一些不大有人知道的书，他都能头头是道讲给你听。

有一次，我问他：你看过《当头炮进三卒对屏风马》这本书吗？这是我当年在先农坛体校向侯玉山、谢小然两位先生学下象棋的时候，自己买的一本书。

他一听，立刻说这是浙江著名棋手何顺安先生的著作，他如何在1956年在全国比赛中力擒黑龙江猛虎王嘉良，当时用的就是他最擅长的当头炮进三卒。一番话把我说得目瞪口呆，真不知

他那脑袋是怎么长的！

六

由于遇罗克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

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有一回，遇罗克因为违反监规戴了好几天手铐。虽然不是自动扣紧的洋铐，只是两个铁环的那种土铐。可是血管一膨胀也很难受。这时候他想找些话题跟人聊聊，借以分散注意力。他找上了我一起靠在墙边聊，他突然问我：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支歌。"我俩在黄昏的暮色里，望着窗外远处朦胧的余辉。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唱得很认真，很动心，歌声那么沉重，牢房里十多个人都不作声了……

七

当时的牢房里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都高许多。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马门教授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发生了对犹太学生的孤立、围斗、驱赶。我说："我看过这个电影，这些情况跟我国六六年夏天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

我说："文化革命破四旧的时候，我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德国犹太人的处境如出一辙。"

遇罗克又问："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会让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谈到《出身论》的出版在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一麻袋一麻袋的来信，大量的捐款。许多人要求来参与、来帮忙。当局最后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不能让这个舆论工具继续发生影响，这一点他很清楚。

我问："你这样做会有秋后算账，你们值得吗？"

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有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为此我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当时的好学校一路直升上来的，他让我明白这个社会对人们是不公平的。

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过草莓，在街道上当过电话传呼员……他在社会上交往过各式各样的人，经验丰富。在交谈中，他使我了解了许多社会的不同层面。

这时候，我周围经常是有人打人，有人被打。有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有人被戴上防毒面具……天天见到的画面充斥着铁和血，我们还要视而不见。

当时几乎每个牢房里都有一两个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人，他们是这里境遇最惨的人。有一个犯人据他自己说：他是"北航"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当时差不多已经完全疯了，他的话难辨真假。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远郊区的农民，据说他是因为骂了毛主席而被关进来的，进来的时候，就戴着镣铐，人已经被多次毒打而变了形。

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看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他们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表现自己也是个狠角色。

当时遇罗克对那些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犯人的态度很特别，既不打他们，也不对他们好，而

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回答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太多了。

遇罗克和我的确不一样，他是一个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斗争的环境中。他必须成为战士。况且，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他也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友谊在当时的含意是：疾风劲草，两肋插刀。

划破夜幕的陨星
——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1980年7月21日，《光明日报》刊登纪念遇罗克的长篇通讯：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八

遇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据说预审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用公布证据的办法。遇罗克告诉我，当预审员向他展示出他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时，问他：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他还是一声不吭，预审员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

最后，主审说：

“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

遇罗克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别废话！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5分钟以后再告诉我们。”

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退场。只留下法警和遇罗克。5分钟以后，预审员们又陆续回来了。

主审很慢地问：

“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遇罗克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罗克告诉我，主审气得一言不发，面色铁青。接着吼着说：“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给我等着！”

九

我清楚地记得，遇罗克了解牢房中许多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痞子瘪三，哪些人急于立功赎罪。

他并没有利用他在狱中的优势。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欺负他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召”之下，落井下石。凡是一切狱油子卑劣、阴险手段，他从来都不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权术，治治那些“有病”的犯人。因此，预审员们自然对他恨之入骨。

对遇罗克现象的反思有两种极端，有些人想让人们彻底遗忘他。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到了，很多人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是偶像化。而实际上也是让人们彻底忘却遇罗克的一种方式。因为神破灭以后被遗忘是最快的。

只有把遇罗克尽量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才能让人们记得他。■

（作者先后为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驻校作家、教师，现专职写作）

（责任编辑　杜明明）

百岁老兵忆抗战

○ 马士弘 口述 万本根 谭继和 张彦 苏东来 采写

马士弘,男,原名马千毅,著名学者、中共老党员马识途胞兄,1911年生,重庆忠县石宝乡坪山村人。黄埔军校第11期学员,原国民党少将副师长。1937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加入陈诚率领的第十五集团军。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跟随罗广文起义。20世纪70年代任成都市政协委员。

时间:2014年12月8日、12月16日

地点:成都市成华区马士弘家中

口述者:马士弘先生现年104岁,身体健康,思维清晰,语言流利风趣。在座的还有其弟96岁的马子超先生。

下面是马士弘先生谈话的实录。

一、我参加的淞沪会战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已经合作了。蒋介石决心抗战了,他说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动员军队全力抗战。

整个中国抗日战争是由三大战场组成的:一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展开的敌后游击战场;另一个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的战线近3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三是西南、西北人民抗战和支援前两个战场的大后方战场。我参加的是正面战场。从1937年上海"八一三"战争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我由连长、营长一直做到团长,参加过"八一三"淞沪会战、保卫武汉大会战、宜昌战役、长江石牌要塞保卫战、常德会战等重大会战。这些大的会战,双方起码都是十几二十几万人。小的战斗不计其数。

我当时在十五集团军42旅,参加了"八一三"淞沪会战。我们当时驻防在罗店到大厂一线,我当时是侦察连长,罗广文是旅长,我的父亲马玉之和罗的父亲罗宇涵是世交,就介绍我到他手下当兵。我开始在四川部队,也是连长,但是我看不惯川军。成天抽大烟,形象太差,我很不愉快,好歹我也是黄埔军校毕业,怎么能在这样的部队中工作呢?

我就找到罗广文,当时部队在无锡,战争爆发后,我们就调到前线去,先到大厂,大厂在江门后面一点,后来我们就退到罗店,打了100天,打得很好,壕沟挖得很深,日本的坦克也使不上劲。但是我们的总指挥徐庭瑶在战略指挥上出现失误,我们在前面与日军作战,日本人则从我们的后面杭州湾,沿着沪杭铁路北上,抄了我们的后路,把我们整个部队包围了。他让部队撤退,要是不撤退,我们转过身来打也好。我们以团为单位撤退,这一撤退,上面日本人飞机轰炸、对面海上有日本军舰用炮轰炸,结果乱得不像样子。我们18军由陈诚指挥,当时部队驻守在江北,陈诚命令不要退,我们在夹金这个地方有3个师和2个旅约七八万人,很多军队都是沿着京沪铁路向南撤退,日军紧追不舍,这样一来,日军后方出现空隙,我们反而安全了。陈诚让我们一部分过长江往北边走,我们走南岸到嘉兴,后转到安徽。这样18军就分成两部分,我在长江以南部分。那时,我担任42旅侦察连连长。到安徽后,在广德与川军饶国华部共同抗敌,我们又走到湖口。不到一个月,日军把杭州占了,沿着汉杭铁路西进,把南昌也占了,我们跟日军就隔着鄱阳湖对峙。后来日军绕路从鄱阳湖到了我军后方,我们就赶紧沿着浙赣铁路西进退到湖北阳新。日本人占领湖口后,继续北上到了马当要塞。

马当要塞是由18师在守护,18师师长的家眷在武汉,日本人来的那一晚,他逃跑到武汉去了,后来被枪毙了。日本的军舰一来,18师在没有师长的情况下坚持两天,马当要塞最终被攻陷,后来18师溃退至阳新与我们旅合在一起。由于18师是个老部队,在北伐时期谭延闿是师

马士弘

长，为保住18师番号就撤销了42旅番号，罗广文当18师师长，我从此就在18师了。我们属于第六战区，后来参加武汉保卫战，在湖口要塞阻击完日寇后，42旅合编为整编第18师，我由连长调任18师参谋处任少校参谋。

后来，我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随部队与日军激战多日。因三面受敌，武汉于1938年10月25日沦陷，18师急行军至汨罗江南岸布防，准备长沙会战。长沙是我们自己人搞焦土政策，下令烧长沙，却说是日军扔炸弹把长沙烧了，其实我们清楚得很。我们退至汨罗江，当时很奇怪啊，日军还没来，怎么后面长沙就烧起来了呢？后来知道了是蒋介石下令烧长沙实行焦土政策。

18师移驻常德数月，于1939年3月奉命移防入川，驻防重庆北碚整训，并担任陪都卫戍任务。1940年，日军分成两路，一路由荆门经当阳南下，一路由江陵沿江西进，直逼拱卫重庆的宜昌，宜昌战役打响。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紧急调动18军到宜昌前线，我所在的18军18师也由重庆码头分乘32艘轮船，经过一天一夜奔赴宜昌急援战场。当时中国军队的师指挥部设在镇镜山的高地上。日本人先用飞机侦察，接着水陆并进，迫近宜昌城。我受命将师部直属工兵营、警卫连、侦察连、机炮连组成一个战斗突击队，我担任队长，工兵营长谢真勋担任副队长。我们兵分两路，由我和谢真勋各率一部阻击日军。我们两路夹攻，很快收复了谭家铺、古老背。后来，军事要塞谭公山被攻占后，中国军队腹背受敌，18师与日寇在宜昌城内展开巷战和白刃战。很多人战死了。剩下的人继续坚守，没有接到命令，一个人都不退半步。举目所见，鲜血遍地，十分惨烈。我身边的人，几小时前还跟我说话，转眼已经牺牲了。想起一句唐诗“战士军前半死生”，很是感慨。

后来，因为全师伤亡损失过半，我们奉命撤回四川忠县整补。日军自1940年攻陷宜昌后，一直意图攻占长江最后一道防线——石牌要塞。如这个要塞失守，日军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到重庆。蒋介石深知这一战关系到抗战最后的胜败与国家存亡，于是下达死守命令，少将以上军官立遗书，凡临阵脱逃者按军法处置，战至一人也不准离开要塞。白崇禧亲自到石牌来督战。

1940年夏，我所在的18师由坪山坝开赴鄂西前线，担负守卫长江石牌要塞及三峡地区任务。1943年5月，日寇向石牌发起猛烈攻势，敌我双方投入兵力达10多万人。我当时任18师53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有一天，我在柳林沟和日军一个大队打了一场艰苦的遭遇战，战况惊心动魄，我们打了一天。第二天，我的副营长下巴被子弹打掉了。日军在对面山上用机枪扫射，我没注意到。我正好扭头，嗖的一下，我自己都不觉得有子弹过去，当时的战斗是非常紧张的。那颗子弹从我额头擦过去，流血了，但我以为是汗水，我身边的卫兵说，营长，你受伤了。我一摸脸，手上全是血。我当时叮嘱卫兵，不要告诉其他人，因为我假如下去治疗就没人指挥了。于是在伤口上涂了点云南白药，经过简单包扎又继续战斗。

抗战胜利后，上级给我们两个月的时间整休，然后就开往湖南桑植，去攻打共产党的部队，他们只有两千多人。我当时不明白，共产党昨天还和我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共同抗战，今天就变成“匪”，要剿灭。我就去找罗广文，他已经是军长了，我和罗广文家是世交，又是忠县老乡，在外面我喊他军长，在他家里喊广文哥。我就跟他说，抗战八年都在一个战壕打日本，今天怎么让我去剿灭共产党？我想不通。后来我给罗广文打电话，就说“我辞职了”！他问为什么？我就说

我不想干了，他说“不干不行”，我说：“我打了8年仗，打累了，打疲倦了。”我给师长写个辞职信就走了。

在家待了大半年，我父亲说，你30岁的人了，总在家也不是个办法，让我回部队去，我就到重庆找陈诚。他以前是我们军长现在是军政部长，认得我，我就跟他说，我还想回部队干，他说：“好！”我又回了部队。当时罗广文在南京任职，我在南京国防部当上校，罗广文跟我说还是到他的部队当团长，我跟他说，我还当团长，我当了几年团长了啊，后来就让我当副师长兼团长，陈诚当时想让我去台湾筹建国防部工作，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已经不行了，后来罗广文回成都，我家家眷多，就跟着回到了四川。

1949年，人民解放军二野进军川东很迅速，一下就逼近重庆了。当时罗广文的部队在成都，我是罗广文兵团下属108军241师代师长。军长李维勋想把部队再往西带，我和其余两个师长都反对，部队再拖就垮了，没有人还想继续打仗。我的兵大多是四川兵，打日军都很凶，但打内战不行！我当时收拢溃散的部队约三四千人，12月初解放军已经抵近成都了，我们驻扎在郫县，当时手下还有4000多人，我们跟邓锡侯联系了，刘文辉、邓锡侯12月7日通电起义。蒋介石闻讯后命令罗广文去打刘文辉、邓锡侯，并奖励1000两黄金。我们都不干，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12月22日我们起义了。1950年1月1日，罗广文特别任命我为联络官，代表兵团去成都，向解放军贺龙司令员报到。贺龙在会议室开会，里面人很多，在这些人里我忽然看见了我五弟马识途，他已经是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他也看到了我，惊喜地和我打招呼。自1941年忠县一别已有8年，我们兄弟就这样意外重逢了。

他带我和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见面。我简要地陈述来意。第二天，我随同罗广文来到司令部，贺龙接见了他。中午，解放军18兵团司令员周士第设宴，马识途作陪，招待罗广文和我。周士第委任我为解放军18兵团成都联络处处长，专门负责联络事宜。第三天，30多名解放军参谋人员到安德接收起义部队，进行整编，我仍为241师师长。按照规定，给离开部队的起义人员发放遣散费，遣散费本应该由解放军发放，但罗广文说我部有一笔钱可以作为遣散费。因为起义前蒋介石为鼓励罗广文作战，发给黄金1000两，没有动用。起义后，罗广文建议这笔钱作为遣散费，得到贺龙的批准。

1950年1月4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周士第兼任市长。1月15日，成都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周士第从马识途那里知道我在大学是学经济的，在成都供职和生活时间较长，认识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于是调我到成都军管会工商处，担任商会军代表助理。军代表由工商处副处长金力声兼任。同时还派来一位姓姜的助理员，我们一同搬到商会办公。我从此脱下战袍，和商人打交道。一直工作到1950年9月，工商联成立，后来我工作了21年后退休。

二、我同事亲历的南京大屠杀

我自己没有目睹南京大屠杀，但我的一个同事亲身经历了。

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寇展开5天激战，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打垮。国民党88师、87师两个师，还有一些部队被打散后退入南京城。退入城内的士兵约有16万，纷纷换装便衣，分散杂处在居民家，有的进入难民收容所。

我的同事王鹤标，是88师264团少校政训员，部队被打散后换成便装，随难民进入南京基督教会设立的鼓楼街华侨招待所难民收容所，得到收容所的管理员的帮助，有幸从南京逃了出来，他后来去了台湾。1995年，王鹤标回到大陆探亲访友时，将他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

据王鹤标回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日本兵看俘虏右手的食指有没有凹坑（拉枪栓磨的茧坑），被屠杀的有茧坑的十多万士兵，大多数是国民党第88师、87师溃散后入城的。王鹤标就是88师的，为什么他逃脱了呢？因为他是少校军官，右手食指上没有茧坑。当时日本兵查验了他的右手食指，一看没有茧坑，就让他走了。他就扮成难民进入鼓楼街的难民收容所。收容所里有管理人员是山东人，王鹤标也是山东人，他就跟日本人说，这个是我们收容所里的职工，就这样逃脱了。他跑出来以后，看到日寇在采石矶杀人，

将中国人一排一排地捆着，一排有30多人，然后用机关枪扫射，扫完以后，就将尸体推入长江，长江水都染红了。夫子庙附近的秦淮河被尸体填满了，一层一层的尸体叠压，时间长了都发臭了。日寇押着中国兵下去把死尸装到尸袋里，扔到长江中去。南京总统府有2万多的教导队，当时也没有走，就被日本人捆成一排排的，在中山路上用机枪扫射。在中山路附近有一座孙中山铜像，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的脑袋都把中山像给堆满了。

2014年12月16日采访马士弘先生（右二），采访者谭继和（右一）、苏东来（左一）

两岸解禁后，王鹤标到成都拜访朋友，跟我讲了这段经历，我于是写了一篇文章并寄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对他们说，虽然没有图片，但事情真实，他们很重视这个信息。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7周年，习近平主席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参观，前几天，我一个同学被邀请参加了公祭仪式，他给我打电话说，你写的那封信放在纪念馆最显著的位置，习主席都驻足看了很久，一直摆头，神情非常难过。牢记历史，不忘过去，这两句话很重要。

三、殊途同归兄弟情

我和马识途是亲兄弟，我们走上了不同的救国道路，最后殊途同归。我们俩的友谊不仅是兄弟亲情，更是血与火铸成的。

新中国成立前，马识途在重庆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1941年年初，中共鄂西特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马识途妻子刘惠馨和刚出生的女儿被捕，他不得不紧急撤离，逃到了重庆。在他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听从父亲的叮嘱，冒险犯难，前往重庆，几经周折找到了马识途，将他护送回忠县老家暂避。在父亲的保护下，马识途才安全渡过了难关。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何功伟也被捕，我到重庆监狱去看过他一次，他很坚强，后来被杀害了，我感觉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者。那时候何功伟的妻子还藏在我家，后来通过秘密渠道把她送到延安，解放后她担任大连市委书记。还有一次，马识途被特务追捕，跑到我家中，因为我在卫戍部队，特务一看我牌子是18军，是卫戍部队，就没敢抓他，我把他藏在家中。

解放初，我在成都工商联工作，负责全市商业、税收等。由于我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我的房子被没收了，那个时候只要你是国民党，什么政治运动你都跑不掉。1950年，和我一起起义的一个同事回到老家去，回去后被区长枪毙了。1950年6月，老家坪山坝农会派三个武装农民来成都，要抓我回去受审。其时我在工商联军管办公室工作，按理不能直接逮捕。他们去成都市委联系，被拒绝了，市委批评他们不按政策办事。军管会知道后也斥责他们，因为当时马识途在军管会当组织部长，就把我给保护下来了，没有抓回老家挨斗。在解放初期，农会可以随便抓人，乡镇可以随便判刑杀头，不管起义不起义，只要你是国民党军政人员，抓起来就判刑，或关或杀。如果我不是在大城市或没有参加工作，要是没有马识途的保护，真的被抓回去，那时一个乡长就有生杀予夺之权，我还能活命吗？

如今我和马识途都百余岁了，我们俩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历经世纪风雨，一路互相搀扶，见证了中国百余年的风云沧桑，可谓殊途同归！■

（万本根：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谭继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张彦：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所长；苏东来：省社科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杜明明）

布罗茨基的坎坷人生

○ 龙 飞

1987年诺奖得主

1987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为美籍俄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位诗人有两点非常引人注目：他年仅47岁，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个被自己国家驱逐出境、历尽沧桑的流亡者。

布罗茨基1940年出生在列宁格勒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父亲原是海军军官，由于犹太血统不得不被迫退役，从此靠母亲挣钱维持全家生活。布罗茨基不忍心让母亲如此辛苦，也不满意学校的刻板教育，愿追求自由的生活，15岁那年毅然离开学校，外出打工。他先后当过车工、司炉、水手、医院太平间的杂工，还曾随地质勘探队到各地探矿，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他白天干活儿，晚上坚持勤奋读书，钻研俄罗斯文坛巨匠的作品，广泛阅读欧美作家的名著。当时波兰的文化氛围比较开放，翻译出版了许多在苏联看不到的西方文学作品，为此他自学了英文和波兰文。

这个自幼酷爱诗歌的男孩在书海中畅游，情之所至，自己也开始写诗、译诗。然而完成的作品无处发表，便由“地下出版社”刊登，并通过朗诵和手抄本等形式广为流传。他的诗歌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有些作品甚至被传到了国外，赫然刊登在正式刊物上，这些往往连他自己也浑然不知。

布罗茨基热衷于长期被苏联官方斥之为“颓废派”的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他在电车上读这些诗歌，又给别人传阅，有时印出来散发给朋友们。这些就成了后来指控他的十六条罪状之一。1963年他被捕，内务部为让犯人明白自己的罪行，将档案材料给他过目，他才知道的。

阿赫玛托娃对他的预言

在布罗茨基未满20岁那年，诗友莱因带他到列宁格勒近郊科马罗沃作家村，拜访了他心中的偶像、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这是他所热爱的当代俄罗斯诗人中唯一的健在者，其余几位早已死于非命。从大师那里他获得很大裨益。此后，布罗茨基经常来求教。

阿赫玛托娃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处境有了好转：恢复名誉，作品解禁，参加苏联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分到作家村的别墅。最令她欣慰的是，她的独生子列夫·古米廖夫于1956年重获自由，母子团聚。阿赫玛托娃的前夫是大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1921年蒙冤被处以极刑。列夫仅因“阶级敌人之子”这一罪名，从30年代大清洗开始3次入狱，在铁窗内度过青春年华。她对儿子的爱是巨大的。当亲友们责备列夫脾气古怪时，她总为他辩护：“他从9岁就成为一个人民公敌的儿子，哪个图书馆也不让他借书。”尽管她百般呵护儿子，母子俩仍难以相处。勉强维持了两年，列夫还是从家里搬走。

列夫离开后，阿赫玛托娃并不孤单。在她的别墅里，每天聚集着一群爱好诗歌的年轻崇拜者，其中就有布罗茨基。他们送上自己的作品请她指点。布罗茨基的才华在这群年轻诗人中显得闪闪发光，令阿赫玛托娃惊喜不已。

1965年春天，阿赫玛托娃赴伦敦接受牛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同挚友伯林畅谈俄罗斯诗歌。说起如今受苏联官方赏识的某些著名青年诗人她有些不屑。她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对青年诗人毒害太深。马雅可夫斯基声嘶力竭的呐喊完全出于他的天性。他是情不自禁的。而他

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

的模仿者都是些小混混，践踏自己的天赋，利用公众趣味投机取巧。

她又说俄罗斯当今有许多颇具天赋的年轻诗人，其中最杰出的要数布罗茨基。这是个被埋没的天才，他身上具有伟大诗人的一切特质。眼前他和他的伙伴们深受羁绊，但迟早会挣脱绳索，让她与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一代诗人黯然失色，让世界为之震惊。说到这里，她语气坚定，充满信心，尽管当时布罗茨基还在服苦役。

阿赫玛托娃的预言果真得到实现。

荒诞的“寄生虫”罪

从1962年起，布罗茨基就成为列宁格勒公安部门监视的对象。他经常受到骚扰，两次被关进监狱里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最恐怖的是给他强行注射一种可怕的镇静剂，到了半夜又被粗暴地叫醒，拉他去冲冷水浴，冲完后用一块湿浴巾把他全身紧紧包住，然后将他推到暖气旁烤干浴巾。他全身的皮肤都受到了伤害……

遭受过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出狱后他再也不敢住在家里，而是到处流浪，今天寄宿在这个朋友家，明天又到另一处过夜。但仍然没能逃脱警方的追逐。

1964年1月18日，列宁格勒法院开庭审判布罗茨基，指控其罪名为“利用黄色诗歌和反苏作品毒害青年”，并指责他是个“没有做过任何对社会有益工作的懒汉和寄生虫”。所谓“寄生虫”，指的是他一直没有稳定职业。自1955年至1963年期间，他共换了13种工作。

针对这样的污蔑，布罗茨基答辩道：“我是个诗人和翻译家。”

法官们听了哄堂大笑，问道：“你是作家协会会员吗？”

那些人认为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就不能算是作家。

“是谁把你引入诗坛的？”他被追问。

“没有谁。是谁把我引入人类的呢？”他这样回答。

最后，布罗茨基被判服苦役5年。

整个审判过程进行得野蛮粗暴，司法人员显得十分愚昧无知。

诗人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白海一带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的劳改农场当伐木工。过重的体力活儿使他无法承受，常常晕倒在地。那里的警察局局长很同情他，让他去邻村找个适合自己体力的工作。他来到附近一个仅有14名居民的小村，这是个牧区，劳动力匮乏。他在那里每天起牛粪、刷洗牲口棚、装运肥料，还要挖出一块块石头——这样做仅仅为了增加一点耕地面积。到了播种季节和收获季节，还要下地干活儿。总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同牲口没有两样。到了晚上，他潜心读书，写作。这一时期他的最大收获是研读了英国当代著名诗人奥登（1907—1973）的作品。

阿赫玛托娃对布罗茨基牵肠挂肚，经常安排年轻诗友们带着由她出钱购买的物品去看望他。

在布罗茨基服苦役期间，他的第一部诗集《韵文与诗》1965年于美国出版，获得高度评价。这对苏联当局是个莫大讽刺。

被剥夺国籍，逐出苏联

布罗茨基一案引起国内外的强烈抗议。在阿赫玛托娃、肖斯塔科维奇和叶甫图申科等文艺界名流以及西方作家的呼吁下，当局不得不缩短布罗茨基的刑期，提前将他释放。

1965年9月布罗茨基获得自由，但始终没有得到平反，阿赫玛托娃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布罗茨基回到列宁格勒刚刚半年，对他关怀备至、预

离开苏联一周后的布罗茨基,1972年

言他能震惊世界的女诗人便溘然长逝。布罗茨基和他的同伴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为导师抬棺送葬。

18个月的苦役生涯让年轻诗人精神上有了很大成长。最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许多东西,能够区分善与恶,而且变得更坚强,不再惧怕残酷的现实了。写作和阅读陪伴他度过无数寒冷的长夜,来自文学的慰藉帮他确立了为之献身的信念。写作,因此成了他对自己的安慰和纪念,成了他在寒冷中温暖自己的一种方式:“我在寒冷中长大,把手指缠上/钢笔的四周,以温暖手掌。”

诗人沉浸在创作的欢乐里。艺术上他始终贴近两位前辈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奥登,追求形式的创新和音韵的和谐。

布罗茨基的作品陆续在美国、法国、西德和英国出版,主要诗集有《山丘和其他》(1966)、《诗集》(1966)、《悼约翰·邓及其他》(1967)、《荒野中的停留》(1970)等。尤其《荒野中的停留》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这又惹恼了苏联政府,不知应如何对付这个让人头疼的犹太人。1972年6月,布罗茨基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

诗人被告知,当局“欢迎”他离开苏联,接着便不由分说地将他塞进一架飞机。原先要把他发配到犹太人祖先居住的以色列,但布罗茨基坚持要求去维也纳,因为他心中的另一位偶像奥登在那里。离开祖国前,他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写信:“跟国家相比,语言是一种更加源远流长的东西。我属于俄语。虽然我失去了苏联国籍,但我仍是一名苏联诗人。我相信我会归来,诗人们永远会归来,不是他本人归来,就是他的作品归来。”

布罗茨基从此背井离乡,成为真正的流亡诗人。抵达维也纳,布罗茨基找到崇拜多年的奥登。两人虽初次见面,却彼此神交已久。20世纪60年代,英国企鹅出版社要出版布罗茨基诗集的英译本时,译者问他要不要请人写个序?布罗茨基反问道,有没有可能请奥登写。奥登读了布罗茨基一些英译诗稿,很是喜欢,便欣然允诺。现今看到布罗茨基遭受如此迫害,令老诗人愤慨。奥登满腔热情地接待他,将他推荐给多位著名作家,并要求美国诗人协会为布罗茨基提供一点经济援助,诗人协会立即拨出1000美元的资助。这笔钱诗人一直用到抵达美国密歇根大学任教。随后奥登同他一起去伦敦,安排他出席当年度的“国际诗歌节”。很快,布罗茨基受聘于密歇根大学,担任住校诗人。

以后布罗茨基到纽约的大学任访问学者。他醉心写作,也醉心教学,称教学是“一种非凡的心理学科”。他于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

由于远离祖国的生活与创作,乡愁成为布罗茨基的重要诗歌主题之一。他说:“一个作家不能用他的母语发表作品,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他在美国发表的作品,有些是用俄语写成后自己再译成英语。后来他直接用英语写,例如,1986年出版的著名散文集《小于一》就是用英语写成的。

布罗茨基来到西方后很快就进入了主流文化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落入了“同时属于两种文化的状态”。从此,他同时运用俄语和英语写作,发扬了俄罗斯诗歌的优秀传统,又注入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二者巧妙地构成了非常独特的风格。浓郁的抒情性、音乐性和强烈的视觉效果,使得他的诗歌丰富完美,深邃奥妙,受到极高评价,被誉为“世界诗人”。

荣誉接踵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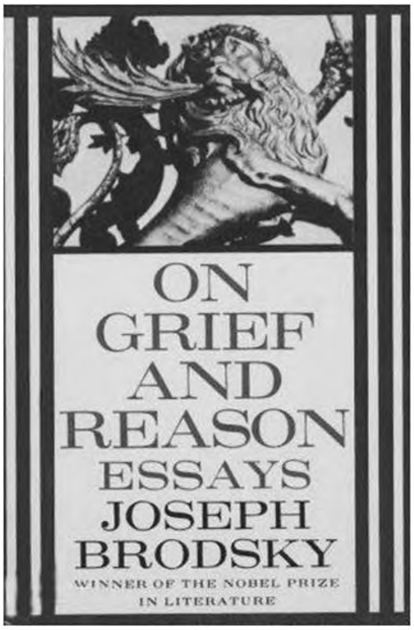
定居美国后,布罗茨基的创作大丰收,荣誉也接踵而至:1978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全国艺术与文学学会会员,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

1987年,由于布罗茨基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诺贝尔文学奖。

得知自己获诺奖时,布罗茨基正在伦敦一家

中国餐馆与著名的英国畅销书作家约翰·勒卡雷共进午餐。这一场景是很富于象征意义的。人们常常把布罗茨基的作品看作是“文化移位”的结晶。这种时刻，不同的文化因素似乎汇集到了一起。

在受奖演说中，布罗茨基谈到三位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以及另外两位对他有着同样特殊意义的欧美诗人奥登和弗罗斯特。他动情地说：“那些身影常使我不安。……在这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综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



布罗茨基作品书影

在受奖演说中，他强调：“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20世纪上半叶在俄国发生的一切，都发生在自动武器出现之前——为了一种政治学说的胜利，这种政治学说的荒谬性早已表露无遗，因为它的实现需要人类的牺牲。”

摘得诺奖后，记者采访他，问道：“您对苏联制度最憎恶的是什么？”

布罗茨基毫不犹豫地回答：“独党制。”

他表示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并非“持不同政见者”。不过他认为：“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政治家们应让文学宁静。如果国家不让文学宁静，作家就有权干涉国家事务。”

诗人在美国终于拥有渴望已久的宁静。得益于这种宝贵的宁静，他的才华大放异彩。诗歌集《诗选》（1973）、《言论之一部分》（1980）、《致乌拉尼亚》（1984）、《二十世纪历史》（1986），散文集《小于一》（1986）、《论悲伤与理智》（1996）等，相继问世。

圣彼得堡的“布罗茨基美国书房”

1996年1月28日，布罗茨基在纽约因心脏病突发于睡梦中离世，终年未满56岁。他一直被心脏病所困扰，曾做过两次手术。显然，这与他早年在苏联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直接关系。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哀悼这位美籍俄裔流亡诗人时，称他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叶利钦痛恨苏联当局将这位罕见的奇才驱出祖国，说这是俄罗斯永恒的耻辱；他也懊悔在自己执政后，又没能及时将诗人迎回祖国，成了俄罗斯永远的遗憾。

诗人逝世于纽约莫顿街44号住宅，这个新寓所是他在1993年携妻子和女儿迁入的。正是在此，这位诺奖得主勤奋工作，度过了生命最后的两年多时光。他给心爱的女儿写过一首长诗《发现》，作品一反他的贯有风格，运用的是明快的笔调。这部长诗已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

布罗茨基的遗孀玛丽亚·布罗茨卡娅将书房中的遗物——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两个装着书籍的书柜和三台打字机，全部捐赠给他的故乡圣彼得堡。书桌上摆着奥登、阿赫玛托娃等人的照片，打字机前有茨维塔耶娃的肖像……

如今“布罗茨基美国书房”陈列在圣彼得堡喷泉楼阿赫玛托娃故居博物馆内，意味着两位诗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位是20世纪俄罗斯的诗歌皇后，一位是俄罗斯诗歌传统的杰出继承人和创新者。他们都属于当代享誉全球的诗坛巨匠。

圣彼得堡市政府已将铸造大街24号诗人当年与父母居住的寓所，建成布罗茨基故居博物馆。但是在2004年以前，布罗茨基故居的5间房子，已分别被5个家庭所居住，其收购过程异常艰难。经过10年努力，才相继收购成功，修复工作也才得以开展。布罗茨基故居博物馆已于2015年5月24日诗人诞辰75周年前夕，向公众开放。

今年是布罗茨基诞辰75周年，明年为诗人逝世20周年。布罗茨基一生的传奇经历令人感叹，也发人深省。■

（作者为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杜明明）

读者来信摘登

我是一名中国远征军老兵，今年93岁，热爱《炎黄春秋》已有十几年的订阅历史，我完全赞成贵刊2015年第6期《不能忘却的精神堡垒》，作者庞国义先生所说“希望给抗战胜利纪功碑正名，恢复原来的名称，确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庞先生已说得清清楚楚，不必赘述。

我更支持重庆市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的提议以及广大网友的呼声，恢复抗战纪功碑原貌，能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尽快得到实现。

愚以为无论国家政党如何更替，无论是谁今天和过去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应该捐弃前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尊重历史，保护历史。历史是人类文明进行，社会科学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任何理由对历史进行阉割，裁剪或抹煞。

云南读者　**周巩越**

贵刊今年第7期刊登了施滨海、史义军署名的文章《〈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过程》，此文在涉及我父亲薛暮桥的部分有几处错误：

1. 第9页左栏倒数第10行“基本”应为“资本”；第10页右栏倒数第17行“据吴敬琏回忆，薛暮桥约他同往沈阳、长春考察期间”，此处的“薛暮桥”应为“马洪”；倒数第18行中：“马洪立即组织周叔莲、张卓元完成了初稿”，据张卓元回忆，参加初稿写作的还有刘增禄 。

2. 第13页右下角的照片说明应为：“1985年9月，薛暮桥、马洪、吴敬琏、李克穆在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巴山轮会议）时在长江边上的合影。”

3. 第14页左栏倒数第9、10行：“为此，薛暮桥再次给中央和国务院写信”；第11行：“薛暮桥告诉他”，此两处的“薛暮桥”均应为“马洪”。

薛小和

近读2015年第6期《炎黄春秋》所登《张仲翰与新疆开发》一文，提到由于粮油等食品的紧缺而出现了“二号病”，显然有误。所谓“二号病”即霍乱（含副霍乱）的代号，该病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依照当时我国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定为二类十八种，即甲类三种及乙类十五种，其中甲类排列为鼠疫、霍乱（副霍乱）、天花，霍乱（副霍乱）排列第二，故以“二号病”代称。规定一旦发生甲类烈性传染病，应立即逐级上报至国家卫生部（在城市不超过12小时，农村不超过次日须报告），并要求严格保密，疫情封锁，疫区封锁。且相关“二号病”的各种官方文件均冠有“机密”戳记，以求保密。

江苏海安退休医师　**蒋志铭**

作者更正

本刊第6期17页左栏第三段“当年6月30日至7月21日，钱端升院长赴科伦坡参加……”应为“当年6月上旬，钱端升院长赴科伦坡参加10日至17日在那里举行的……”右栏第6行“父与子”应为“母与子”。

王为民

更　正

2015年第6期第33页右栏倒数第15行“陈丕显（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有误；第7期第2页图片说明中“李方”应为“季方”；第38页图片说明中“发端于黑龙江省柳河县”，应为“黑龙江庆安县柳河镇”；第78页右栏第4、5行中“上海纺织工学院”应为“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第86页左栏第25行中“陈云已去世5年多”应为“15年”。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平生六记	曾彦修	35.00	6.00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	[美]格雷弗·弗著 马维先译	89.00	9.00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林立果“小舰队”兴亡始末	张聿温	68.00	9.00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光 李晓江译	88.00	10.00
一本书的历史 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金冲及	38.00	7.00
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	邓　野	38.00	7.00
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48.00	8.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9.00
潜规则	吴　思	28.00	7.00
我们忏悔	王克明　宋小明	48.00	8.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于光远	36.00	7.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38.00	7.00
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张　化	39.00	7.00
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	38.00	7.00
叶　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美　周锡瑞	58.00	8.00
一片冰心在玉壶 叶笃庄回忆录	叶笃庄	68.00	8.00
“四人帮”兴亡(全四卷)	叶永烈	198.00	20.00
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	李敦白口述 徐秀丽撰写	38.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苏采青	98.00	10.00
君主立宪之殇——梁启超与他的自改革	解玺璋	38.00	7.00
独裁者手册	[美]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阿拉斯泰尔·史密斯著	42.00	7.00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 禁书的审查与传播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斯特　英格里德·宗塔格 著	59.00	9.00
大元帅斯大林	[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	198.00	17.00
王明年谱	郭德宏	98.00	11.00
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68.00	9.00
古拉格群岛第一岛	伍宇星编译	39.80	7.00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吴庆彤	36.00	6.00
民国人物过眼录	杨奎松	58.00	9.00
改革都有红利吗	雪　珥	38.00	7.00
历史:何以至此	雷　颐	28.00	6.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杨银禄	46.00	7.00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杨　瀚	35.00	6.00
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陈徒手	32.00	6.00
勃列日涅夫时代	[俄]列·姆列钦	56.00	9.00
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冯筱才	38.00	7.00
思痛录	韦君宜	35.00	7.00
陈独秀全传	唐宝林	128.00	11.00
斯大林的战争	杰弗里·罗伯茨	69.00	10.00
国史札记(人物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晖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昨天的中国	袁伟时	42.00	7.00
回忆与研究(上下)	李维汉	75.00	12.00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十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314.00	43.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图书介绍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那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比沉重的灾难。从“开国领袖”到“个人崇拜”,从“集体迷狂”到“天下大乱”。一批批党政要员的荣辱沉浮,一位位风云人物的人生百态,一个个知识人群的命运磨难……读这段历史,能使读者清晰地了解“文革”前十年曲折复杂的历史及其经验,真正弄懂“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陈独秀全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在中国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因他转向托派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又被扣上: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主义、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十多项罪名。如果独立思考和以科学的态度对陈独秀一生的思想和活动重新考察,这些所谓的“罪名”均不成立,除了“汉奸”罪名是完全诬陷外,有的则属于权力掌握者的“理论解释权”(成王败寇)的产物,有的则是把革命阵营中的不同意见“妖魔化”的结果。在正义的立场上,此为中共党史上的最大冤假错案。

本书充分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详尽梳理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他与共产国际、中国托派、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复杂多变和纠结的历史关系,以全新的观点和视角对陈独秀有一个重新认识!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从战争、政变、暗杀、政争、学潮、工潮,什么事情都发生过。共和制、总统制、联邦制、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样样都试过,17年统治,13位总统,46届内阁,军阀混战,武夫治国,千年帝制难于转型。

《斯大林的战争》 在20世纪,约瑟夫·斯大林的残忍与有罪的名声,恐怕只有阿道夫·希特勒可与之相比。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20年,苏联对他的个人崇拜曾登峰造极,称他是这个苏维埃国家的伟大舵手,而且还是人民之父,当代的列宁。然而他去世的三年后即1956年,苏联新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就痛斥个人崇拜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歪曲,将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暴君:他处死自己的同志,大批杀害自己的军事指挥官。斯大林对自己数百万公民的死亡负有责任,在苏联农业强制集体化期间,农民被流放或饿死;在追查“人民的敌人”期间,党和国家的官员遭到清洗……

本书在揭露斯大林是一个冷酷、实行高压统治的独裁者的时候,也对他作为战争领袖的作用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但这不是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是通过有据可依的叙述使人们注意到他的历史作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人人出版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3000元，300页印刷100本4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000元，300页印刷100本6000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出版热线：010-58426176　57223540　57273435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录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五十本起定制出版文集、自传、回忆录，家史、家谱、纪念册

一、“历史见证、家风传承”作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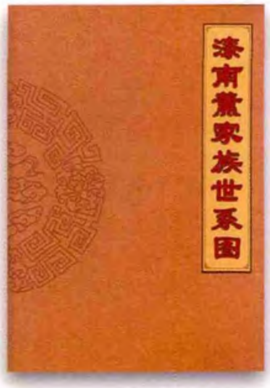
从多年来定制出版的五千多种样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个人自传、回忆录、家史、家谱、家训”分栏展示，参观者可以查谱寻根、摘抄家训，浏览家史、借鉴经验，翻阅传记、归纳要点，提出自己的考虑与打算，我们提供参考方案。

二、欢迎举办“出书分享会”：

每个定制出书的老人与家庭、家族都可以申请开办一次“出书纪念会、亲友座谈会、读者见面会”，我们免费提供场地与投影设备，提供摄影、录音服务。

三、诚聘家谱传记培训顾问：

每个老人都愿有自己的回忆录、每个家庭都愿有家族史，但好多没有编写经验的人劳神费力、经年累月也难以成篇。本机构诚聘有写作与教学经验者担任“写自传、编家史、续家谱”的培训老师，合作开办“家谱传记讲座、培训班”，让更多的人越过编写关，让平民百姓也能了却出书心愿！



010-6892 0114、6252 5116

地址： 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楼”

单位：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文化网》www.jzwhw.net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5年第8期

百岁老兵忆抗战

十三大报告酝酿中的二三事

中苏关系史的权威之作

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

我亲历的苏州武斗

我所知道的遇罗克

ISSN 1003-1170
08>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10.00 元